

八

烟、娼、赌、匪、帮会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n.com

鸦 片

伪满时期的饶河鸦片

杨朝晖 安林海

在旧中国饶河县的团山子（今饶河镇，当时是出入饶河县的交通要道），曾因种植鸦片而显赫一时。那一时期，鸦片种植虽在客观上促进了饶河县经济的“繁荣”，但给这里的人民带来的危害却是巨大的。

康德2年（1935年），由于日寇的入侵，鸦片种植面积下降到不足3万亩，比民国18年下降了一半还多。在日伪统治时期，尽管鸦片种植下降幅度大，但日寇仍能从鸦片种植中获税近20万元。据当时日伪资料记载，各区的人口、鸦片种植面积和收获量如424页表。

上表情况表明，饶河县第一区的鸦片种植，比其它各区都多。分析一区的情况，即可知道鸦片种植何以在饶河如此兴盛。第一，土质和气候条件适宜种植鸦片。一区各沟均属山区和半山区，是饶河县半山区地形的典型代表。这类地形的土质，种植鸦片产量高，色泽棕褐，味道醇香。由于鸦片的质量好，所以售价高，也容易出手。第二，取得土地容易。烟农在这里星

植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只要肯吃苦，连续垦植三年，就能收到较好的效益。第三，种植鸦片能得厚利。比较而言，种植鸦片的收入远高于种植农作物。饶河县种植的鸦片主要是白花大青筋和紫花大青筋等晚熟品种。因其播种季节在霜降，故又称“压霜烟”。压霜烟一般每把刀（4亩地为一把刀）可收烟土100到140两。按每把刀100两计算，亩收入也可达到50元（以哈大洋折核）。饶河种植的粮食作物有大豆、玉米、水稻。按同期价格比较，鸦片与各类农作物相比，鸦片产值约等于玉米的6倍、大豆的8倍多、水稻的2倍。由此可以看出，种植鸦片的产值远高于种植农作物，而且，种植鸦片还比种植农作物要省工得多。例如小北沟的吕维斯，连续三年垦荒，种植鸦片30亩，扣除一切费用得纯利近400元，等于96亩地农作物的总产值。

区 别	沟 别	人口数	鸦片种植 面积 (亩)	鸦片收获 量(两)	备 注
第一区		18 251	21 295	416 748	
	其中：大带河		1 775	35 500	
	小南河		8 212	164 260	
	关南嘴子		5 149	102 980	
	三人班		1 573	31 460	
	西南岔		548	9 864	
	小别拉炕		1 144	20 592	
	大别拉炕		1 205	21 690	
	七里沁		99	1 782	
	小北沟		1 590	28 620	
第二区	东 安 小佳河	6 349	2 139	42 780	
第三区	四合川 西风沟	1 760	2 810	61 890	
第四区	大和镇	1 274	3 010	57 960	

1934年日寇占领饶河后，日伪政权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仍允许农民种植鸦片。但饶河人民不堪忍受日寇的奴役和压迫，有些年轻力壮的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也有许多人返回了原籍，因而鸦片种植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逐步走向衰落。1937年冬日寇实行“匪民分离”政策，各沟百姓在日伪军警的刺刀威逼下，全部被归到集团部落里，饶河县几十年的鸦片种植史也因此而结束。

二

“黑金子”的巨大诱惑力，不但使越来越多的人在饶河安家落户，而且每年到了烟季，它的诱惑力又使大量的外地人进入饶河。这时，饶河的临时人口猛增到6万余人，是饶河常住人口的2倍。

每年的收割期，人们称之为“烟季”。烟季一到，许许多多的外地人不约而同地进入饶河。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临时参与鸦片生产的人，叫“割烟份的”。饶河的烟农，多数专门从事鸦片种植。在平时，烟农靠自己的劳动管理烟田，有的雇有长工。在播种和苗期管理季节，烟农雇用一些短工；到了收割季节，由于收割期短暂，因而，需要的劳力也多。所以，此期烟农必须雇用外地来割烟份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一年一度进入饶河割烟份赚烟土，被称为“赶烟季”。还有许许多多怀着“黑金子”占有欲的人，在烟季利用各种手段赚取鸦片，被人们称谓“混烟市”。一到烟季，那些来自各地的混烟市的男男女女，便络绎不绝地乘船来到饶河的团山子。在这些人中，有做买卖，以商品换取鸦片的行商；有开赌场，靠赌博赚烟土的赌徒；有装神弄鬼，以此骗取烟土的巫医神汉；有说书、唱地方戏、耍

戏法、演杂技的艺人；还有靠卖淫挣烟土的娼妓。这些人在团山子稍事休息，便搭伴结伙，陆续离开团山子，分赴各个沟里。

各沟大烟收割一结束，那些混烟市的人们又蜂拥般地从各沟返回团山子，争相乘船返里。但是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人们只能陆续地离开饶河，最晚离开饶河的外地人是在中秋节前后。这样，外地人全部离开饶河，得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数以万计的外地人口在饶河盘桓，使团山子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景象。当时的团山子镇内有旅店、客栈20余家，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全部忙于接待这些暂住团山子等客船的外地人。这些客栈为了赚钱，尽力收留旅客，即使这样也难以容纳这么多的人。有些人住不进客栈，只好花高价租用私房。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房屋租金每月至少要付1两到1.5两大烟土。

团山子内的各行各业也都活跃起来。镇内的两处戏院可容纳观众七八百人。这两处戏院昼夜各演两场，场场座无虚席。在市场上还有说大鼓的、讲评词的、唱落子的、耍戏法的、演杂技的，非常热闹。

各种赌局，如会局、宝局、牌九局、骰局，则是通宵达旦，喧闹异常。

挂着“清水香烟，开灯方便，设有女招待”招牌的烟馆，更是迎来送往，昼夜接待顾客。

镇内的七八十家妓女院，每天傍黑就明灯高悬，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妓女们，做出种种妖艳迷人的姿态，招揽嫖客。

还有20多家饭馆和理发馆，他们从清晨开业，一直到半夜才关门。

一年一度的烟市，使饶河像万花筒一样，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景象，因而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小哈尔滨”。

随着鸦片种植的发展和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饶河的商业发展起来。哈尔滨大东公司在饶河设立了分柜，专事收购鸦片。饶河的大小80余家商业店铺，不仅在交易中以商品换得鸦片，而且有的商号还以货币直接收购鸦片。

三

鸦片种植，使饶河的农业结构发生了畸型变化，粮食作物生产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自宣统元年（1909年）建县以来，饶河的历任县长均推行移民屯垦的政策，鼓励开荒，发展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到民国7年（1918年），全县人口已达到7000余人，粮食能够基本自给。但自鸦片种植输入饶河，粮食生产则受到冲击。饶河地处边塞，交通极为不便，生产的粮食运不出去，而且粮食的售价也很低，较鸦片收入相差甚大。因此，农民弃粮食生产转而种植鸦片，成为烟农。

鸦片种植，使饶河越来越多的人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在吸食鸦片的人中，不仅有各行各业和伪军政界的要员，而且烟农也渐染此种恶习。据康德5年（1938年）饶河县公署资料记载，全县成年人吸食鸦片的达到55%以上。在社会交往中，鸦片成了招待客人的必备品，如同现在用香烟、茶水待客一样。

由于大量吸食鸦片，使人的健康机体受到严重侵害。凡吸食鸦片成瘾的人，个个面黄肌瘦，体弱无力。烟瘾大的如不按时吸食，就会不断地打哈欠，流眼泪，淌鼻涕，浑身酸痛难忍。

鸦片成了吸食者时刻不能离开的“灵丹妙药”。那些家境贫困的烟鬼，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失去劳动能力，生活越来越困难，可还是要吸食鸦片。他们在这个泥潭里越陷越深，甚至流落街头沦为乞丐。尽管如此，他们宁肯不吃不喝，也得用乞讨得来的钱去抽大烟。为了省钱又能过瘾，有的人将大烟膏用

水溶化稀释后，直接注入静脉。这种方法用的鸦片数量少，过瘾极快，但对人的生命危害也极大。注射3个月后，人的下肢血管开始溃烂淌臭水，不过一年就会死掉。康德9年（1942年）以后，常见有这样的人死于街头。有的孕妇染上鸦片瘾，婴儿出生后不仅瘦弱不堪，而且患有先天性的鸦片瘾，常常哭闹不止。父母要按时给婴儿喷点鸦片烟，才能使他安静下来。吸食鸦片，通过遗传，祸及后人，危害极大。

吸食鸦片使许多人变得一贫如洗，终至堕落，干出丧失人性，伤风败俗的罪恶勾当。在团山子有一家姓董的，以300两烟土的聘金，把19岁的女儿嫁给一个50岁的老头了。这实际是变相的卖儿鬻女。还有一家姓姜的，为了抽大烟，将妻子儿女5口人卖了150两大烟土。有的人为烟瘾所缠，强制妻子去当女招待或行暗娼。有一姓解的以30两大烟土的价格，3年为期，将妻子租赁给他人。崔某，被烟瘾所累，强迫15岁的女儿卖淫为其赚钱。

在妇女中，有不少染上了鸦片瘾。有的女人为弄到钱抽大烟而沦为“野妓”，经常出没于旅店、澡塘子或大烟馆。有的女人因抽大烟造成家庭不睦，与丈夫“打八刀”，各奔东西，如此种种，举不胜举。

吸食鸦片败坏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也使人的精神变得空虚颓废。那时，不少青壮年哼唱《宋老三卖大烟》这样的低级小调。直到解放，饶河才彻底查禁了鸦片种植，结束了那段耻辱的历史。

（摘自《饶河文史资料》）

伪满隆化县禁烟政策的内幕

何凌洲

我生于清朝光绪年间成长于民国时代的沈阳。堕身于伪满的奉天省公署、热河省公署、国务院总务厅等机关。曾任股长、事务官等伪职。游历过沈阳的鸦片巢穴，接触过张学良等吸食鸦片的军阀，也会见过前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和臧式毅省长等身染烟毒的政客，更见过我的亲友被鸦片所害流落街头的惨状。特别是在伪满国务院时，参加过鸦片会议，兼任过禁烟总局检查官，并在隆化县长任内，直接执行过热河省隆化县的烟政。隆化县是一个主要产烟地区，每年向伪满政府交烟干量达30万—50万两，因此所受的毒害尤甚于别处。并且自己也曾受过鸦片的毒害。

禁烟政策的由来、目的、组织机构

“王道主义”是日本鬼子侵占东北唯一的招牌，禁烟政策就是在这个招牌下挂出来的自欺欺人的幌子。它是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星野植树（也就是伪满当时实际掌握大权的真皇帝，奉承关东军第四课，即驻满日本军总司令部内特设专管伪满行政事务的一个课，课长是少将以上的官级）的命令，在大同2年（1933年）奏请执政（溥仪）下诏，由国务院地方处和弘报处共同作成禁烟计划，就开始了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毒化政策。

其实这个政策并不是从伪满才开始的。远在日本维新以来，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政府即执行了毒杀中国人的恶毒

政策。他们利用旧中国军阀割据和军阀头脑昏庸，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制造和贩卖毒品的窟穴。如在大连有白面儿（海洛因之一种）制造厂，天津日租界上有海洛因制造厂，热河承德离宫里棱角洲北侧有鸦片提纯厂（假手热河督统汤玉麟主办）。沈阳南满车站一带的日本居民区，更是日本鬼子贩毒、制毒、运毒的场所。使中国成千上万的人受其毒害。上至军政头领，下至商贾农民，很多人堕入他们的毒网。当时连号称中国海陆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也都受他的日本顾问荒木的引诱，吸食了海洛因。因此可以说这是日本鬼子蓄谋已久的一项毒化政策，只是到了伪满时期推行得更加明目张胆和有组织有计划罢了。

伪满禁烟政策也叫“断烟”政策。口号是“推行仁政，挽救鸦片瘾者，在10年内把伪满洲国的瘾者，完全戒除净尽，保证3 000万人民的身体健康”。口号确也堂皇，可是实际上却是一个大阴谋。它有3种用意：一是把所有鸦片都收归国有，以便施展毒计。二是扩大毒化范围，加重鸦片毒素，以便灭绝伪满的中华种族，好完成大和魂（日本民族的总称）的殖民政策。三是为提取鸦片精华，制成军用麻醉药品，以完成“大东亚共荣圈”的军事策略。

开始，怕人言物议，管理鸦片的专门机构没有单独成立，只附在专卖系统之内。在新京（长春市）有专卖总署，在省为专卖署，在县为专卖分署（后均改为局）。一面控制生活必需品，如大米、白面、烟、白糖、火柴、酒类；一面专门管理鸦片买卖事务，并于伪满全国各地大小城镇设鸦片零卖所，大肆贩毒。

约在康德2年（1935年），特别是伪满第二个真皇帝武部六藏当权时，把这个机构加以强化，改归正式行政系统，在新京设置禁烟总局，成为国务院直属下的一个独立机构。在有关各省公署内设有烟政科，其它省则归实业科、经济科、农业科或

总务科管理。在各县公署内也有同样的设施。

禁烟政策的真面目

在禁烟初期，先对瘾者进行登记，发给登记证。凡持有登记证的人，都可以向管烟的机构领取大烟泡。这些大烟泡大多是纯质的熟烟膏，既好又贱，一般人都争先恐后地抢购，诱使瘾者竞相登记入网。因此毒化范围日益扩大，受害的人日益增多。

把中国人诱上了“贼船”之后，便开始了残杀政策。

鸦片固属毒品，但若吸食原浆本货，还是不能把人立时害死的，只能逐渐使人瘦弱，减短寿命和降低生育而已。日本鬼子感觉慢杀不解渴，在规定的“十年断禁鸦片政策”的时间内，不能遂行屠杀的任务，就别生毒计，把从民间收来的原浆大烟，送到新京南岭大陆科学院（专门制造药品和毒品吗啡、海洛因的工厂），抽取大烟精华，充作皇军御用麻药。而把剩下的渣滓，再掺进一些带有兴奋刺激性强的硫磺等毒品，作成大烟泡供给中国人吸食。这些大烟泡，每1小包称为1函，10小包装成1盒，称为1中函，10中函装成1盒，称为1大函。层层包裹，盒盒精致，令人见而珍惜。瘾者买到家一吸食，感觉刺激性很强，很过瘾，越吸越离不开它，以至非吸它不可，就是再吸原浆烟，不管吸多少，反而不过瘾了。这种烟是越吸量越大，中毒也越深，用不上一二年，就周身浮肿。病情是先由脚上肿起，肿到膝盖，皮肤即行溃烂，流脓淌血，不久即行死亡，毫无挽救办法。

在伪满热河等省，常常有横卧沟壑呻吟待毙的人，就是这类毒品毒害所致，这样的惨状我目睹多次。

一次，大约是康德四五年的时候，我走到承德桥畔，看见3名受害者躺在五裂河的西河沿上，1名已死，1名稍有气息，1

名尚能说话。询之，系承德中学学生，年仅二十几岁，中大烟毒才七八个月就弄到这个地步。似此情况，在当时可说是到处都有，不止热河一地如此。

究竟毒杀了多少人？虽然没有详细调查过，但是从人口的繁殖数字上也可以大致估计。伪满初期“国势调查”时，人口是3 000万，到光复时经过多年，仍未见多。其他走死逃亡固也减少人口，但鸦片的毒害，还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鸦片减少人口的原因之二：一种是直接杀人，一种是降低人的生殖能力。吸食鸦片之后，人的身体就变得瘦弱，这些人多数是子女稀少的。日本鬼子深知此情，所以就用鸦片来推行它的残杀中华民族阴毒的政策。

康生院是断治大烟者的医疗机构。它是伴随着禁烟政策的推行，而建立的伪善机构。大约是在伪康德八九年时，由于毒化政策的阴谋诡计日益为人民识破（八路军及其他革命志士就曾以传单多次揭露鸦片政策的阴谋），才迫使关东军授意武部六藏，挂出康生院这个招牌。大张旗鼓在全满洲各地收容鸦片瘾者，进行断禁治疗。又制造出一种名为“东光剂”的禁烟药，到处宣传他们的假仁假义。其实，康生院为瘾者禁烟，不过是一种骗局而已。

隆化县的康生院，最大收容量是六七十名，而且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当时全县的瘾者不下10万人（全县人口22万人，轻重瘾者约占半数以上）。如何能尽数治疗？不用说3年5年，就是30年、50年也是无济于事的。况且从治疗效果上看，更属自欺欺人。

隆化县康生院第一期收容30名，3个月後仅有8名似戒除，但回家后没过两个月又旧病复发，而且吸食得比以前更为厉害，这不是一场骗局是什么？

禁烟必须断种，断种必须查地，理由光明正大，内幕却卑鄙龌龊。不身临其境，是很难知道其中底细的。

勘查烟地，表面上是缩小鸦片的耕种面积，减少鸦片毒害，增加粮食谷物的耕种面积，充裕人民生活。其实在这美丽幕布的后面，真正演出的却是血泪交流的悲惨情景。

为限制耕种面积，每年春季都组织烟地勘查队。分别到各村种烟户实地丈量耕种烟地的面积，按照种烟任务，不许多种，也不许少种。并按土地等级分配烟干（晒出水分的纯烟）责任量。小苗出后再勘查一遍，将要割取烟浆（俗名大烟奶子）时，再勘查一遍，最后才确定交烟干的定额，即必须交给官家烟干数量。三勘定案，看来安排得精细合理，其实是另有文章。

勘查队一到乡村，立即和当地大户（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勾结起来。这些人家的明明种10亩大烟，却只报1亩、2亩。而小户人家，不但种一亩算一亩，还要提高土地产量等级。对于勘查人员的招待费，也是以大压小，按户分摊。还有的狡猾大户，往往花少报多，从中渔利。如果弱小烟户不服，就给加上阻挠烟政的罪名，唆使工作人员绳缚毒打，甚至看押。因此，一般弱小烟户不管怎样吃亏，也得含酸忍受，不敢作声。

每勘查一回，弱小烟户就被剥削一回，就欠下了秋天的债务。至于烟干的任务，地少量多，更是无法完成，势必得去哀求土豪劣绅代为设法解决。他们的办法是让弱小烟户到深山另辟烟田，豪绅不给申报，坐享收成的一半。或者给豪绅们包耕他们隐藏未报的烟地，到秋天按三七或二八分成。这自然是大户得利而小户空流血汗而已。对于不能出劳力的小户，就以高利贷的方法，贷给小户烟干，利息多半是大加一倍或翻几番，还得用房地产执照作抵押，甚至被迫卖儿卖女。在康德8年，隆化县孙家营村南10公里的一个小屯子，就有一家把16岁的女孩

卖给三十几岁的男子，才交了烟干。

由于营私舞弊，因而烟地面积是越勘查越多，有的小户到深山私自开荒地，有的大户隐藏不报准备放高利贷。地越多，毒品生产也就越多，人民受害的也就越多。反过来，粮谷的耕地面积就相对地缩小，人民也就越发受到饥寒交迫的痛苦。

隆化县老局子屯，我大约是在伪满康德8年时到过那里，见到许多青年男女没有衣服穿，只是腰中系一片破麻袋或布头。十六七岁的男女孩子，赤裸裸地蹲在屋地的树叶子下。这里的人家因为赤贫，都在住屋的地下、炕上铺上一尺多厚树叶子，借以御寒和遮羞。这真是人间地狱的生活，这全是日本鬼子推行毒化政策的结果，是日本鬼子无法开脱的严重罪行之一。

在大烟快收割完的时候，由县鸦片组合、兴农合作社和警察署等组成工作队，到各乡村催缴烟干。口称是把所有的烟干完全收尽，以免人民吸食，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实际上是别具毒心的，因为在收烟干时，不仅是收实报耕地产量，而且把春季勘查后，人民开闢的烟田和大户隐藏未报的烟田产量也一齐收尽，以增加全县产量，完成国家的收光计划。同时使瘾者除了买吸国家毒品烟泡之外，无从得到大烟来源，结果是贿赂风行，部分官吏大发横财。而普通的烟家在剥削欺诈之下，日益穷困以至倾家荡产。

鸦片组合是一个专门收购大烟的机构，也是豢养毒化政策走狗的地方。内有鉴定（检查大烟质量的）、收购、保管、会计庶务等股。上有主事、董事等日满负责官员。隆化县的鸦片组合，一般时是四五十人，多时达百人，外有缉私腿子若干人，差不多各村都有他们的爪牙。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鸦片瘾者，大多数是地痞流氓，全是些毫无人性的东西。

管鉴定的人，把烟农送来的大烟奶子（即没有晒出水分的

烟浆)，打抹化验（利用手抹、眼看、味觉等土法化验），扣除水分，分等级，定数量，这是一个烟农能否交上烟干完成任务的第一道主要关口。群众称之为“鬼门关”。不管交多少大烟，都得让他们先取一部分，名为“打样子”。其实用不多少，每回取来的样子都比实际用量多至几百倍，是一种发财的好手段。烟农谁也不敢违抗，稍一不顺心，立即为难重重，压等级、多扣水分，甚至硬说不合格，让你等候多天也交不上烟干。或者马上和一些狗腿子联系，故意到你家催逼烟干，轻则毒打，重即看押，弄得你俯首贴耳，任其宰割，方才算罢。

保管股负责过秤，向来是秤大多收，从中渔利。

晒烟股则上下欺骗和鉴定人员勾结在一起，明明是二成水分，硬说是五成水分；明明是一等烟干，硬说是二等。另外还掺杂使假，抵龙换凤，他们大发横财。身居上位的人员，对这种种黑幕，从来不闻不问。这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豢养爪牙的惯技罢了！

这种欺压所得，数目是非常大的。单单潮烟缸一项每次就能提出纯烟上百两，其他更可想而知了。这些取巧的收入，他们却认为是份内的应得，毫不避忌地共同分赃。

凡是在这个机构工作的人，不论是干什么，每当烟季都能大发横财，有烟瘾的自然越陷越深，没烟瘾的早晚染上。不过他们所吸的大烟都是原浆土货，比吸官烟泡的人能多活几年。

这些败类还同伪协和会特务机关勾结，收集民间各种情报，成为警察特务的外围，就更无恶不作了。

伪满的鸦片零卖所有两种：一种是富人窟，也叫花烟馆；一种是穷人窟，也叫土烟馆。花烟馆多设在大城市，土烟馆多设在乡村。

这些鸦片零卖所，散布在伪满各地。经过前后约10年左右

时间，除了贩毒杀人之外还负有特务的使命，按时向警察特务机关密送情报，害人无数。他是日本鬼子很得力的特务助手。

总之，伪满的断禁大烟政策，名曰禁烟而骨子里却是推行种烟、收烟、卖烟。所谓戒烟（康生院），实际上则是放毒。表面上是减少毒品，保证人民生活，口号是“日满共存共荣”。干的是你（满）死我（日）活的恶毒罪行。这个断禁政策10年，不知坑害了多少中国人的性命！

（摘自《锦州文史资料》）

日伪贩运毒品毒害海城人民纪实

——记鸦片零卖所

高作智

伪满时期我曾经在海城私人开设的云仙阁鸦片零卖所司帐，后来被伪县公署接管，改为官营后，又担任海城北关管烟所会计。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寇就侵占了我的家乡海城，除了残酷镇压广大人民外，还广泛利用毒品进行亡国灭种的残害活动。

1931年以前，中国政府禁种鸦片，只有几家日本浪人私运、贩卖海洛因、吗啡等毒品。日寇侵占海城后，就公开推行贩毒政策，1932年（伪满大同元年）农村允许种植大烟。我村附近冉家堡子地主冉级三在40余亩土地上大种鸦片，雇有割烟女工二三十名，发了一笔横财。这年我20岁，在海城中街吉成福百货商店当店员，为筹措婚事，向店里财东谢成方借了伪币100

元。我有4亩园地，和同乡赵大叔分种大烟，他出畜力我耕作，收割完毕，我分得晒干大烟土共55两。为了还债，我拿出50两大烟土，每两作价2元，还清债务。这年在烟土收割后，伪县农会向各村屯布告周知种烟犯法，国家禁止，但念及农民普遍种植，法不责众，须按亩数缴纳烟土税，以后不得再种云云。我缴出5两了事。这年全东北鸦片丰收，次年东北各省城镇允许私人开设鸦片零卖所，并发出期限2年的许可证。

毒窟内幕

海城街内，设有东关管烟所，主任田子臣（寅申），南关管烟所主任韩德生（荣宣，原经营小南门外小楼零卖所），西关管烟所主任曲俊川（原经营芙蓉阁零卖所），北关管烟所主任高新府（作民），站前春香楼零卖所经理赵子阳。另外东门里有日本浪人开设的“大东当”（小押）兼营福田吗啡馆，西门外还有久保田，以卖药兼营毒品。公园街还有几家，这些日本浪人心毒手黑，对吗啡、海洛因瘾者拿来抵押的物品，价值5元的，只给押价3角或5角，如限期内不能抽回，即以物抵债，比高利贷还要高出十倍至几十倍。当时东北毒品管理机构自新京（今长春市）专卖总署以下，各市设专卖署。奉天（今沈阳市）设鸦片制造厂，供给全省各零卖所。县设专卖局，掌管各零卖所一切业务。营口市专卖署管辖区有海城专卖局及各零售所。并设有鉴定官专司烟膏质量鉴定，营口专卖署内有一个叫陈大友的鉴定官。一次，他来到海城云仙阁零卖所，当天就抽了30块大烟膏，重六钱，烟瘾之大，可称头号烟鬼。海城云仙阁零卖所是第二批开设的。经理高新府（作民）是我的族兄。1937年春吉成福商店歇业，我失业回家。闲居至夏初，高新府找我去他的零卖所司帐。开业时间早8点至晚11点。零卖所租用民房上屋

5间，东西下屋各5间（司帐在东下屋中间），南北4间。东上屋西下屋都是吸烟室。西上屋为经理住宅。每天卖烟收款、记帐都由我一人担当。零卖所由海城专卖局领取大烟土，由经理亲自加工成大烟膏，专卖局发给专用包烟纸包装。烟膏每块重二分，包成“走”“吸”两种。“走”字每份2角5分，拿回家去抽；“吸”字每份2角，在零卖所抽。烟土包装有两种，零卖烟土每包半两，每两2元4角，是“福”字牌的小包装。大包装烟土，每包50两，共有6种，“松”、“竹”、“梅”称为东土，栽培区在吉林省的4个县。“福”、“禄”、“寿”称为西土，栽培区在热河全省。购买大烟膏必须持有警察署发给的“鸦片瘾者吸食证”，盖有警察署官印，没有定量。出卖鸦片的各零卖所，互相竞争。芙蓉阁零卖所在制造烟膏过淋时，将当时10支装的“粉刀王”牌纸烟揉碎，将烟丝加入烟膏中一起过淋，加工后不但烟泡色黄味香，而且烤出来的烟泡比一般的还大些。因此销量显著上升，轰动全城。为了竞争，有的零卖所添设女招待以广招徕，每天伺候不会烤烟的瘾者烤烟。

在零卖所管帐也很不好做，最怕有人借故闹事，从中敲诈。1937年秋的一天晚上，约摸10点钟，我正在整理帐目，伪县公署警务科卫生股长孔繁多（警佐）身穿便服，手持文明棍进入室内。这时北关兴隆区办事员孙某正在无证吸烟，孔当即向他要吸烟证，他支吾答不出来，孔大发雷霆，左右开弓打了孙某十几个嘴巴，气还不消，又找到我大声责问：“没有吸烟证，怎么卖给他大烟，他妈的！”不容分说抡起文明棍向我身上便打。住在上屋的“辽海公报”采访员梁某上前说情，孔更是大发脾气，打了梁几个耳光。这时高新府很快请来县里王科员出来讲情，才算了事。我不能受这样的气，第二天就向经理辞职，坚决不干。回家两月后，经理又一再让我回去，我因生活所迫，没

办法，只好又回零卖所。

自1938年1月1日起，敌伪公布所谓“鸦片十年断禁政策”，所有私人开设的零卖所一律收为官营，改为管烟所，将原有设备作价收买。每个烟管所设主任一名，会计一名，贩卖员一名，夫役（看灯的）五六人。原来经理在其零卖所划定为管烟所后，可以继任主任，或调转其他管烟所，或者免职。海城全县共设立管烟所16个。街内有东西南北关4个，乡村有南台、大屯、耿庄、牛庄、腾鳌、感王、大石桥、大高坎、高力房、马风、析木、岔沟等12个。云仙阁零卖所改为北关管烟所，主任高新府，我担任会计，另派来一名贩卖员刘聘之，5名夫役。伪县公署行政科内新设烟政管理所。所长由行政科长韩连昌兼任。下设主任一人，即日本人后藤，吏员（科员）3名，其中王成仁负责人事调动和翻译；关佩刚负责各管烟所业务统计和上报各种表报；雷益三负责烟土、烟膏、海洛因、吗啡的收发；雇员一人，名郭政宽，负责各管烟所领取备品、吸烟用具、办公用品等事务；夫役（通信员）一人，名顾春宜。还设有鸦片烟膏制造厂一所，日本人白田任所长，下有工人若干。男工制造烟膏，女工包装。

恶果累累

记得海城中街路东公园街附近，有个外号丁胖子的地主，是个“白面”大王，他经常光临东门里一家日本浪人福田开的“大东当”兼营咖啡馆，每次都成盒（盒装100克）购买“白面儿”。每逢过年，福田也给丁送礼，拉拢主顾。丁胖子烟瘾太重，又爱摆阔气，特雇两名佣人，日夜轮班侍候他抽白面儿。最后倾家荡产，一命呜呼。海城县当时共有11个警察署发放“瘾者吸食证”，辖区有海城、牛庄、腾鳌、耿庄、感王、大石桥、高

坎、大高力房、马风、柞木、岔沟等处。吸食证上贴瘾者本人一寸免冠照片。另有鸦片、海洛因和吗啡“购买通帐”，一年一换，当年有效。通帐封面上有编号并注明“吸”“走”字样，以区别在管烟所或者在家吸用，并盖有吸食定量，多者是一钱五分，就是六个二分五重的烟膏；少的是五分。海洛因吗啡定量是一克，带回去吸用。虽然规定对官员、教员、医生和35岁以下男女青年和学生禁止抽大烟，并不发给吸食证。但这些人中的瘾者也有办法买到毒品，可由他们的家属或老人托人情领吸烟证；或到私烟馆高价私买。经营私烟馆的人可以领到一份用量较大的吸食证，自己连抽带卖。当时日本人、朝鲜人中也有不少染上烟瘾，害人反害己。例如：海城北门外警察署保安系有一个日本警尉，染上大烟瘾。他每天上班前到北关管理所抽大烟。命夫役托有烟证的人给他代买，或向贩卖员强买。他自己不会烤烟，只好让夫役给他烤。他也怕被人发现，戴上眼镜和大口罩以掩饰他的真面目，他每天灰溜溜地来去。但凡染上烟瘾的人一天一次不解决问题的（不过瘾），他每次都要带回去少许烤熟的大烟泡，留在晚间口服。吸食鸦片的人，两眼无神，总是流着眼泪淌清鼻涕，不住地打哈欠，走路腿软、四肢无力，好像一只受了枪伤的鸟，那副丑态，实是笔墨难以形容。这种人的最后下场，手中无钱，无以过瘾，只有典当偷盗，穷途末路，卖儿鬻女，无家可归，沿街乞讨，死于街头巷尾。每年严冬，差不多天天都有“路倒”，至于死在荒郊野外，更无人收殓。记得有一次“大东当”兼咖啡馆经理福田问一个瘾者：“王的，今天怎么没来？”瘾者说：“老王戒烟啦。”福田讽刺地笑道：“他没死还得来。”意思是根本戒不了。我在零卖所管烟所时期，每天和瘾者打交道，特别是会计办公室和瘾者吸烟室相连，自然容易受到熏染。但我亲眼看到吸食毒品的恶果，再加生活困

难，因而身在毒窟而没有染上烟瘾，可说是万幸。所有管烟所主任、会计、贩卖员、夫役大多有烟瘾，即使原来没有瘾，也经常因“玩票”而由浅到深，不成烟鬼者几稀。据我估计，海城街内共有10大户：车兰田、魏寿山、韩辑宇、孙玉普、盛尧臣、李书麟、黄东阁、谢多三、王佐臣、孙云峰。地主、资本家这些人都有烟客，加上曲艺界演员、理发、浴池、妓院、旅馆、饭店服役人员、小贩等。烟民约占总人口5%。农村约占2%。当时小河沿村有480口人，人人皆知的鸦片瘾者有10名，如赵子卿、赵寿臣、赵庆儒、赵香海、赵东海、薛景茹、薛景云、薛罗氏、薛景海、薛醒等。海城县当时人口60万，按平均数计算，达2万人之多。吸大烟者之外，抽白面儿扎吗啡瘾者实难以统计。

烟毒危害足以亡国灭种，不仅本人受害而且遗传后世。北关管烟所主任我的族兄高新府，他的结发妻子因病故去后又娶一后房。她染有鸦片烟瘾，婚后生一男孩，孩子面黄肌瘦，两眼不睁，呆头呆脑，反应迟钝。只有当他母亲向他鼻孔喷大烟时，才睁开眼，张嘴寻奶。因此按习惯喂奶时刻先向他喷大烟，孩子活了半年就死去了。

对于这一社会痼疾如何处理，海城县康生院当时也曾试验将瘾者集中起来，强制他们从事手工编织等劳动，戒烟后可以就业谋生。但也无济于事，旧社会的枷锁不打破，烟毒就难以根除。

——摘自《海城文史资料》

日本侵略者用毒品残害抚顺人民罪行考

方 觉 姚云鹏

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
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
一条破麻袋，能铺不能盖，
盖上前胸脯，露出两膝盖。
北风冒烟雪，无米又无柴。
天冷肚子饿，小鬼来逼债。
没钱鬼不饶，去把儿女卖，
卖掉儿和女，还不清阎王债。
冻死路边倒，阎王脚下踩，
一把尸骨扔关外，悔不该来千金寨。

这是当年流传在千金寨的一首民谣，它有力地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用毒品杀害我抚顺人民的罪行。受压迫、受剥削的抚顺矿工，除了遭受日本工头和把头的敲骨榨髓、层层盘剥之外，日本人还利用杀人不用刀的毒品，毒害他们。由于鸦片、海洛因、吗啡等毒品的毒害，不知杀害了我多少中国同胞！

千金寨采煤工人为了养家抚小，挣钱糊口，就得拼命加点，玩命干。真是“吃煤饭，拿命换，不累死，不算完，出事故，就完蛋。”由于一个人体力有限，长期超负荷劳动，营养又十分欠缺，病残者日益增加。有些矿工在体力难以支持的时候，不得不寻找一种办法，用刺激来麻醉自己，以图一时的安逸和舒服。这种办法和刺激，就是抽白面儿（海洛因）打吗啡。日本人和

把头勾结朝鲜浪人，大量贩卖白面儿（海洛因）、吗啡来毒害和麻醉中国工人。当时吸食海洛因极为方便，随时都能买到。但吸的日子一长就成瘾。扎吗啡也是一样，一成瘾就难以自拔。最后不是中毒身亡，便是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以致冻饿而死。

抚顺千金寨比较驰名的大烟馆（即吸食鸦片烟的专业馆所）有“别有天”、“雅聚轩”、“新桃园”、“登仙阁”、“小瀛洲”等。而在新站（今抚顺南站）欢乐园一带则有“广发成”（今绣品工艺厂）、“永感楼”等址。

在日本当局的支持下，由朝鲜浪人在老千金寨市街开设之吗啡馆，比比皆是，大多数开设于抚顺千金寨铁道南一带，同河沟沿西岸的艳春院，四十八间房的花花世界（妓女院），比邻相处。在铁道北部家坟评书馆附近，也有九处吗啡馆，为朝鲜浪人所开设。这些吗啡馆大都兼营贩卖“海洛因”。

1931年至1937年，仅仅6年的时间里，日伪当局利用吗啡、海洛因毒品杀人，如每天按最低数死5人估计，6年之中抚顺至少有1万余人死于吸毒。

臭水河的上游，称为杨柏河，下游称为大官河。在从西一条通向新抚顺走去的转湾处，在河上曾架起一座长约50米，宽不足10米的大官桥。在臭水河东岸，有长长的一排小平房。这里便是从老千金寨迁过来的，朝鲜浪人们出售海洛因的吗啡馆。从1937年至1945年日帝投降止，每年都有大批的被毒品毒害死的“瘾君子”。特别是在冬季里，冻死在这一带，多数又死在大官桥下，成为“大桥旅馆”的“不速之客”。当年对于“大桥旅馆”下冻死的死尸白骨的惨不忍睹之状，流传过这样的顺口溜：

“桥底为顶冰为地，两垛（南北）死尸当墙壁。大桥旅馆不要钱，能住进来出不去。”

垛垛尸体，新旧交替，统由警务部门指派抚顺监狱出犯人检装。惨死在街头桥下的“路倒”，一个接一个地抛到车上运去，送到乱坟岗子草草掩埋了事。由于掩埋过浅，头一天埋掉，当夜就被豺狼野狗分尸啃掉。

1937年至1945年，在整整的8年当中，日寇以毒品杀人，如果把抚顺炭矿管辖内的大山坑、东乡坑、老虎台、果子沟、新屯、万达屋、龙凤、搭连各矿井及街镇包括在内，每天被毒害致死的人数，仍按最低数5人计算，每年吸毒死者即1800人，8年则为14000余人。

1940年至1945年，由于伪满洲帝国政府颁布了所谓的《禁烟法》，伪抚顺市公署对全市鸦片瘾者进行了登记。经批准“允许”吸食鸦片者，则由市禁烟总署鸦片管理所发给“鸦片配给证”，按月按日定量配给鸦片烟。如发现无证吸食者，经保甲长向警察分驻所密报，立即予以抓捕。并送往禁烟总署设在新抚顺大马路六町目（六道街）之“康生院”，进行强行“禁戒”。这个名为“康生”院的禁烟馆，实质是一个边推销毒品，边折磨中毒者的特殊馆。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九辑）

哈尔滨的鸦片烟毒

卢宇信

鸦片烟是毒害人民身心健康的一种毒品，传入哈尔滨也有很久的历史。其间虽经禁止，但收效不大。

1927年黑龙江省借禁烟之名，实行了鸦片种植和烟馆官

营，因此鸦片的种植、贩卖、吸食之风蔓延；吉林省却禁止种植、贩卖、吸食。哈尔滨傅家甸（道外）属吉林管辖，鸦片的种植、吸食被禁止；而江北马家船口（现道外区）属黑龙江省管辖，则允许开设鸦片馆供人吸食。一个城市两种政令，傅家甸的一些商民大批涌到马家船口去吸食、贩卖鸦片，于是马家船口鸦片馆猛增到一百四五十家。在吉林省居住的人只要一踏进黑龙江管区，就可以随便出入烟馆吸食鸦片而不受限制。黑龙江省吸食鸦片的人进入吉林省就得禁烟。到1929年虽然整个东北三省都禁止鸦片烟毒，但是在边远地区仍然种植，乡村官员隐瞒不报。

1931年“九·一八”日军侵占东北，军警无暇顾及禁止鸦片，从海拉尔到昂昂溪，从黑龙江到松花江到处罍花开放。据伪满日人宾珠山生写的文章说：黑龙江省种植鸦片5万垧，每垧收获16到25斤，平均按15斤计算可收75万斤，每斤价按20元计算为1500万元。如果种植粮食，每垧地只收二石三斗，每石粮25元，每垧地价值57.5元左右，而种植鸦片价值300元，有大利可图，这是种植鸦片盛行的根本原因。

生产的大量鸦片烟土，主要运到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等地，其中有的经哈尔滨运往大连、天津、青岛、上海等地。哈尔滨专事贩卖鸦片的人也应运而生，据伪满康德10年哈市年鉴记载：康德4年，哈市民营鸦片零卖所77处，吸食鸦片者29196人，吗啡瘾者540人；康德6年，哈市民营鸦片零卖所76处，吸食鸦片者32394人。

伪满洲国时期鸦片实行统制，大同元年9月制定鸦片收买法：规定鸦片每两一角钱交售给伪公署，由伪公署按计划供给吸食人员。同时又成立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实施所谓鸦片“断禁”国策，在伪新京国务院设立禁烟总局，在哈伪市公署设

烟务，专门发放贩卖鸦片的许可，允许私人开设烟馆。私人烟馆最多到120余家。到伪满中期鸦片的买卖划为专卖局，伪市公署禁烟科将120家私人烟馆收为国有，并为77家，改为官营，负责发放“吸食鸦片通帐”，以通帐为凭配给鸦片。伪满末期哈市公署禁烟科改为戒烟所，将80家烟馆合并为20家，改为管烟所，增设了康生院和康生报国队，专门管理吸食鸦片的人员。管理所比较大的有：道外桃花巷的群英楼、道外三道街的大宾号、道外正阳七道街的会宾楼、道外景阳街的宝元楼、道外南十一道街的东兴楼、道外北十二道街的锦云天、道外南十六道街魁元阁、道外南小六道街的南勋楼、道外长春三道街的长春楼、道外大观园的大观楼、道外太古街的日升楼、道里新城大街的永安楼、道里中国四道街的芙蓉楼等都是大量贩卖鸦片的烟馆。此外哈尔滨还有一处制膏厂，专门生产鸦片烟，制出的烟膏分为福、禄、寿、松、竹、梅、特杉等7种。直至日本投降，制膏厂才停产。

1945年“八·一五”光复以后，地方秩序混乱，日伪时期所储存之鸦片烟膏，大都流入民间，一些烟商和伪官吏、地痞流氓乘机大肆倒卖，牟取暴利。此时由于无政府管理，鸦片的种植又兴盛起来，贩卖人员大量增多。从冀、热、辽、延吉等地大批鸦片烟土运到哈尔滨市，再由哈尔滨分销各地。

（摘自《哈尔滨文史资料》）

纵毒政策下的本溪

韩 愚

“九·一八”事变前，这小小本溪山城也和全国一样，烟毒蔓延，到处有私人开设的大小烟馆。其中较大的如老菜市的魁星楼、湖春里的一品香、河西红土岭胡同口的一品香分号、后石沟菜市场的恒记烟馆等。此外，河东、顺山、河沿也都有烟馆，几乎充斥县城的街头巷尾，可谓极一时之盛。那时，同行业之间相互竞争，为了拉主顾，抢生意，不惜重金聘名妓、美女来烟馆充当“烟花”，美其名曰：“女招待”。她们不仅为烟客吸烟服务，而且也从事色情勾当。因此，群众呼之为“花烟馆”。有的烟馆请名人题写楹联，以摆阔气。如顺山街一家烟馆门外的楹联是：“罨粟花下名士设榻骚士卧；芙蓉帐内美人陪伴雅人游。”以此手段不知勾引多少人步入罪恶深渊。

在大同元年至康德4年（1932—1937年）间，选凤城县为罨粟基地，让农民普遍种大烟。这给辽宁烟毒泛滥提供了物质基础。当时富翁、豪绅、地主、阔少、达官公吏等，也都以吸烟来夸豪富、摆阔气。官场应酬，贸易往来，结交亲友，以及日伪招降纳叛，也以“鸦片”为馈礼或诱饵。当年碱厂的孟凌云就曾以“鸦片”为馈礼劝说钟子忱、黄锡三投降日寇。

由于“鸦片”的泛滥，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当时的“道德会”、“在理公所”、“红卍字会”等社会团体，也曾倡导过戒烟、禁烟活动，但毫无效果。当年本溪师中学校教师朱光璧（今本溪冶专离休老教授）曾倡建一个“励行社”，并拟了

章程草案，宗旨是唤起教师和青年学生起来励精图强，倡导禁烟禁毒。可是没等付诸行动，他就以“思想犯”罪名被捕入狱。在历次审讯中，“励行社”的章程草案也成了一条反满抗日的罪状。社会上还流传一支民歌，叫《大烟叹》，调寄《苏武牧羊》：“大烟，坑人又费钱，犯瘾实在难，举步两腿酸，打哈欠，泪涟涟，美味不能解馋，晴天还好受，最怕连阴天……”笔者亲眼所见，在我家乡偏岭村，与我同宗族中有两家富户，就是因少辈中出了几个吸毒的，不到数年，就弄得家业败落，门庭皆非。同时代，与偏岭一水之隔的泥塔村（又叫泥岔村）原有温姓财主，也是由于少辈中出了几支“烟枪”，不过数年，房地产就变为高姓所有了。笔者至亲，上石桥子张某，殷实家业也败在父子三人吸毒上了。结局是父死，两个儿子破产后流落在本溪街头沿门乞讨，后冻死在后石沟石灰窑内。老母带个小子乞讨在外，至今不知下落。如张家这样家破人亡的吸毒者岂止万千？

日本侵略者推行纵毒政策是在伪装下进行的。如1932年9月，日伪当局成立了“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同年11月30日公布《鸦片法》。1933年成立了“鸦片专卖局”，进行独家经营。它限价强购、公开贩运，高价售与瘾者。为了掩人耳目，1937年又宣布了所谓的“鸦片十年断禁方针”。1940年伪满洲国政府又成立了“禁烟总局”，并在各省、市、县公署内设置烟政科（股）。本溪市公署在卫生保健科（科长是日人小西）内设置烟政股，股长车振先（山西人），配吏员、事务员补、雇员3人。同时把市区所有的私办大小烟馆全部取缔，代之以官办的管烟所。当时在河东、河西、河沿、官原（今平山地区）设4个管烟所，统揽全市烟毒瘾者的“大烟泡”分配供应。与此同时，本溪县公署内设有烟政科，下设石桥子、桥头、连山关、南坎（南芬）、草河口、赛马集、小市、清河城、碱厂、田师付等管

烟所。据当年曾在管烟所当管烟员的回忆，当时市、县有烟证的吸烟者不下2 000人，仅市内4个管烟所有证吸烟者也有800人。凡无证吸烟者和私自贩运买卖“大烟土”的，均为违法，这就成为警察、特务进行敲诈勒索的借口。为了掩人耳目，以贯彻落实《十年断禁方策纲要》为名，本溪市和本溪县联合在小市设立一处“康生院”为戒烟之所。凡贩毒及无证吸毒者，可依法逮捕，轻者处以罚款，重者投入监狱或送到小市“康生院”、彩电“辅导院”罚以劳役。但只要花上钱，就可以了事，或前门送进去，后门放出来，因而，“康生院”、“辅导院”、“警察署”却成了利用禁烟来受贿、取利、敛财的法宝了。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小市“康生院”院长小田部勇被本溪县人民押上了审判台，处以死刑。市、县的管烟所也在我军、政接收伪政权时封闭解散了。

（摘自《本溪文史资料》）

凌源人民深受鸦片之害

张崇熙 杨明宇

占用良田，强令大面积种植鸦片

凌源县1934年至1947年的辖境，是现凌源县境和喀左县大部。1937年至1940年与凌南县合并为建昌县。1940年改为喀喇沁左旗。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使中国人民吸毒丧志，慢性自杀，不战自亡，使用法西斯的毒辣手段，强迫凌源群众种植大烟，并不断扩大种烟面积，增加鸦片产量。从凌源县和

建昌县前后几年种烟情况的数据对比，足以证实这一点。

1933年，凌源县种烟面积为12 338亩，到1934年猛增到43 297亩。到1937年（这年凌源县与凌南县合并为建昌县）种烟面积为60 537亩。1940年后，种烟面积仍在大量增加。现凌源县小城子乡、万元店乡，仅1937年一年种烟面积就达3 700余亩（当时，两乡属于茶哈、修杖子、热水汤3个村）。四官营子村（现四官营子镇政府所在地），1945年前全村种烟面积为167.5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15%）。由于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水源较好的上等地都种上了大烟，所以粮谷作物逐年减少。

逼交烟干，凌源人民遭涂炭

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用鸦片残害中国人民，便强化统治机构。于1933年成立了鸦片专卖公署，下设分公署。分公署设在各个种烟的地方，俗称“大满号”，专门负责对鸦片的收购、缉私等事项。

当时，日本侵略者向种烟百姓每亩收税金5元，名曰“禁烟特税”。1940年，喀左旗禁烟款额达145 583元（地方附加捐不包括在内）。

凌源鸦片专卖署，设在凌源城内北街（现在的回民小学处），其“大满号”经理是李芳洲，李是青龙县人，伪满初期是凌源最有名的贩运鸦片的大奸商，是日本侵略者忠实走狗。专卖署人员伙同日伪警宪，借催收大烟之机，对老百姓百般刁难，敲诈勒索，中饱私囊，丧尽天良。每到收购大烟土旺季，专卖公署在全县各重要集镇设点收购，各点有专职鸦片鉴定人员，负责检质、验收，以质论价。当时规定的烟干等级共分六等，还有等外品。最高官价每两为21元（约合1.5斗小米），最低价格每两为0.8元。实际上低于黑市价格3—4倍。在检质验收时，

鉴定人员故意压等压价，刁难群众，以便从中渔利，中饱私囊。更惨绝人寰的是，日寇和汉奸施以许许多多的毒辣手段和酷刑，残害人民，逼交烟干。轻者搜查、罚款、辱骂、毒打，重者吊大挂、压滚杠、灌辣椒水、用热烙铁烙等。乌兰白乡有一家姓万的妇女，因没交够大烟干，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将她抓去，惨无人道地扒光了她的衣服，并将她赤身裸体地绑在树上。然后，用烧红的铁棍捅进她的阴道，致使她立即死亡。当时，因交不起烟干，或交不够烟干而被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折磨死的人，无计其数。

吸扎鸦片，老百姓家破人亡

日伪统治时期，凌源县有鸦片专卖署，各村镇设管烟所。烟民由管烟所统一发证，配售鸦片。管烟所下设鸦片零售店。1934年凌源街里零售店为20家。据1934年税捐部门的统计：全县烟灯捐纳税人数为468人，灯数为1059个（指有证的），实际吸烟人数远远超过此数。1941年全喀左旗设管烟所30个，属凌原县境的有凌源街里3个，此外刀尔登、三十家子、松岭子茶棚、热水汤、沟门子、小甸子、北炉等地也分别设立了管烟的。

鸦片是一种刺激性很强的兴奋型毒品。长期吸用，会使人骨瘦如柴，弱不经风，意志衰退，精神萎靡。吸毒成瘾者，轻者要倾家荡产，背井离乡；重者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时，凌源县群众深受毒害者甚多，仅以四官营子村为例：1945年以前，全村80户的359口人中，就有74家吸毒、扎毒的人。因吸、扎毒成瘾的达36人；因吸、扎毒致死的男性14人，女性6人；因吸、扎毒而倾家荡产、逃荒的18户，共54口人。再如：河坎子乡小河西村，全村11户中有5户吸、扎鸦片。其中张桂兴夫妇吸毒成瘾，两口子整天啥也不干，陆续将自家经营多年的70

亩良田卖净、扎光。生活无着，后来下了关东，一家4口人还是因饥寒交迫惨死在那里。再如：万元店乡老官营子北沟村，全村13户中竟有10户吸大烟。凌源镇北街的杨保，抽烟成瘾后，不但卖光了家产，而且还卖掉了结发多年的妻子，最后反被烟毒毒死。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日寇在清原贩卖毒品概况

张克明

日本侵略者远在清原未建县之前的1916年（民国5年），便将其侵略势力伸向了清原。当时隶属开原县，叫八家镇，日本利用在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在清原镇内设置了日本驻奉天（今沈阳）总领事馆海龙领事分馆清原（八家镇）出張所。群众称出張所为“领事馆”。这个领事馆即是日本设在清原的特务机关，享有治外法权，与地方平起平坐，约而言之，是地方官的“太上皇”。它专肆搜集清原各方面的情报，包揽承讼，袒护与日本人相勾结的地方豪绅，并设洋行，经营贩卖毒品（海洛因、鸦片、吗啡）及私运军火供应土匪和当地土豪恶霸，干尽了坏事。日本人仅在清原镇内便开设了3家洋行，其分支零卖所遍及全县20余个乡镇。清原镇内就有松坡洋行、植田洋行等。此外，日本人还利用韩侨在清原各村屯代售麻醉毒品，残害中国人民。开始贩毒时，日本人大肆宣传吗啡等毒品可以治病，采取每包海洛因奉送几支金枪牌纸烟，后又施以新花招，除香烟外还奉送几块“森永”牛奶糖做诱饵。当时全县人口11万，受害吸毒

者不下2万人，农村中几乎没有身强力壮者。吸毒者没有钱买毒品的，便偷窃财物古玩，挖掘坟墓，用盗来的物品去兑换毒品。如当时清原植田洋行(吗啡馆)，有一个以物品兑换吗啡的窗口，日用生活品、衣服、鞋帽、古玩应有尽有。1.5公斤紫铜茶壶换吗啡不值5角钱，而市场上要5元钱才可买到。这些日本洋行的赃物，地方官吏从不敢过问。那时清原农村30%的人染上了吸毒嗜好。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于同年11月，在大汉奸东边保安总司令的配合下，日军忽路守备队侵入清原县城，成立以日本人为主的伪清原县自治指导部和日本人任委员长的治安维持会。日本人为达到长期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目的，不择手段的大肆推行鸦片种植业，当时清原县城内的空地大都种植鸦片，到处可见罂粟。还大肆贩卖鸦片、海洛因、吗啡等毒品。日伪当局还一度奖励农民种植鸦片，因而鸦片烟馆、吗啡馆充斥县城和各区村。根据1935年《清原一般状况》记载，清原县登记吸毒者调查表明：清原县街警察署下辖鸦片零卖所5个，有证吸毒者255人；清原县兴隆台警察署下辖鸦片零卖所1个，吸毒者64人；清原县夏家堡警察署辖零卖所1个，有证吸毒者55人；清原县苍石警察署辖零卖所1个，有证吸毒者60人；清原县海阳警察署辖零卖所1个，有证吸毒者60人。全县已登记吸毒者计494人，统由日伪警察署发给准吸鸦片证，吸毒者凭证到官办鸦片零所购买鸦片。这些人能得到准吸证也非易事，要一定社会地位和财产做保证，并经警察署长的认可，才能取得吸毒证。取得吸毒证者，是日伪方承认的吸毒者，可置办烟枪、烟灯之类的吸烟工具。而全县吸食鸦片的人数远远超过日伪登记人数。除此之外，县城各区村还开设半官半民的吗啡馆。全县1935年的人口约13万，吸毒者达2.5万人。经营毒

品者均为日本人、韩侨。中国人是没有资格经营贩卖毒品权利的。当时的吗啡馆老板看到吸毒者和扎吗啡者有钱，便在吗啡中加大浓度，注射后立即死亡，谋财害命。1943年，有一名叫张玉海的厨师，有300多元钱，因牙痛去扎吗啡，被毒死了，身上的钱全被吗啡馆的人抢去，尸体被抛到了荒郊。

吸食毒品多数是农民，吸毒成瘾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日本殖民统治者侵占东北之后，推行了一手拿战刀，一手拿毒品（鸦片、海洛因、吗啡）的民族奴役政策，叫中国人不死在刺刀下就死在鸦片烟枪下。

（摘自《清原文史资料》）

双城大烟馆

王 璞

在双城的日本浪人久保，依仗“领事裁判权”作掩护同个别朝鲜族人狼狈为奸，在东二道街和西北二道街两处贩卖鸦片、吗啡毒害中国人民。

当时私人开设大烟馆是有利可图的，所以在伪满初期，双城的地主、豪绅、大贾纷纷申请开设烟馆。当时开馆的有：贾福清、蒋四、莫老三等人在南大街路西开设的益发楼，陈子新、张印清在西大街路南（今新华旅社）开设的登云阁，王丹霞（当时商工会长）在北大街路东开设的卧云阁，于一斋（大汉奸于舜徽之族兄）在北大街开设的乐贤楼。

每个烟馆里设有单间和大铺，单间中还有女招待伺候，烟具也非常讲究，如，太古灯、张洋轩子、寿州斗、万年蒿的烟

枪、银灯罩，都是各地名家出品。每逢假日和傍晚，大烟馆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吸大烟的“瘾君子”络绎不绝，商店老板和外埠老客（采买员），多以烟馆为交易场所。这仅仅是几家公开的烟馆，四隅和乡下的私烟馆更是数不胜数。

烟馆的鸦片由县鸦片专卖局供应。美其名曰“福寿膏”，烟膏分福、禄、寿、松、竹、梅6种。据有关部门统计，当时全县有大烟瘾者达5万多人，占总人口10%以上。每日需鸦片50多公斤。

1937年私人开设烟馆一律改为官办。县公署行政科内设烟务股，专门管理鸦片事宜。鸦片的领发则由司计室（等于今财政局）负责。原来的私人烟馆一律改称鸦片零卖所，农村警察署所在地也设立零卖所。要求烟瘾者持大夫之诊断书到规定的警察署登记，领取通帐。然后，持通帐方能到指定的“零卖所”购买通帐上规定的烟份。

城内的登云阁改为七十号，卧云阁改为一号，益发楼改为二号。有通帐的吸烟者称之抽官烟，无通帐吸烟者称之抽私烟。抽官烟的往往把剩余的烟份高价卖给抽私烟的，可从中赚钱。

当时，群众中流传这样的顺口溜：抽大烟有三快，穷得快、死得快、抬着死尸走得快（指抽烟而死的人皮包骨）。城北有一瘾君子因抽大烟，把老婆卖了。孩子问他妈妈到哪里去了，他一边抽大烟一边指着烟枪说：“你妈在这枪里呢。”

（摘自《双城文史资料》）

山城镇杀人不见血的咖啡馆

张忠贵 吴国华 周凤武整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秋，阴历八月间，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皇军”就来到了南山城。他们除了用“三光政策”残酷镇压中国人民之外，还用杀人不见血的毒品来毒害我国人民。

南山城地区，丘陵起伏，柳河贯穿全境，土地肥沃，是个产粮区。在旧社会此地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柳河、新宾两县部分地区的农副产品在这儿卖；开原、铁岭两县的老客在此地收购。当地商号很多，买卖兴隆。小商店不算数，仅大商店就有23家之多，大车店6处，饭馆6所。还有烧锅、当铺、澡塘子、妓院，服务行业几乎应有尽有。繁华之貌不亚于一个小城镇。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人见有利可图，于是便在这里开设了咖啡馆。

日本人到南山城的第二年——1933年，在南山城设立“江上洋行”、“山下洋行”、“田中洋行”、“山本洋行”。这些名为“洋行”的，实际就是咖啡馆。

咖啡馆经营两种毒品：一种是“海洛因”，这是吸的，一种是“吗啡”，这是扎的。这两种毒品的毒性极大，一经吸用，很快就会成瘾。重者不要三四个月就会中毒折磨致死，轻者也超过半年就得一命呜呼。想要戒掉是很难的了，只有死路一条。

沾染这种嗜好的人，多数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少数是一般平民百姓。

南山城东五里堡村有个叫王绍文的因扎吗啡无钱，家里没什么可卖的，把老婆卖给张振豪了。还有个叫朱庆章的也把老婆卖了。南山城街有个大姑娘扎吗啡，犯瘾没钱买就卖淫，卖一次给伪币一角钱就行。

南山城地区死于这两种毒品的有名有姓的有以下几个：

南山城康家街村乳名叫小连增子的二十几岁的青年扎吗啡死了；还有个姓范的扎吗啡没钱买，冬天上山打柴冻死在山下；黄明顺因打吗啡死在大街上。

老百姓在街上经常看见“路倒”，冬天更严重，死的更多。因抽“海洛因”、扎“吗啡”死去的人很多，无法统计。总之，有了这种嗜好，九死一生，能够活下去是寥寥无几的。

日本人开洋行（吗啡馆）又兼开“当铺”。扎吗啡的偷了东西去“当铺”典当，当了钱用来扎吗啡。丢东西的人知道后就去“当铺”要。日本人硬是不给，说这是别人在我这当的，钱他拿去买了“吗啡”，我用这东西抵押，你要东西拿赎金来。丢东西的人就得自认晦气。东西要不回，告状无门，只好受这个哑巴气。

（摘自《梅河口文史资料》）

日伪时期建平县凶残的“缴土”

宋凡

“缴土”，是日伪时期强迫百姓种鸦片，将收成后的大烟土上缴，叫缴土。

在热河省建平县，仅这一个小县份，就年种鸦片烟4万多

亩，每年每亩缴土10公斤，作为土地税。该县土地瘠薄，肥力不足，一般是达不到产量要求。因此，人们都对种鸦片感到头疼。但派定谁种多少，不许不种，也不许少种，只好从命。每年缴土时节便是百姓一次难过的“鬼门关”。

在伪建平县公署，专设立一个烟政股。对鸦片烟地进行勘查登记，把种烟农民的姓名及种烟地亩都详细登记入册。到了秋天按登记数字缴土。达不到数量的，就逮捕、打骂、灌凉水、坐牢等。当时，我在建平县公署行政科当临时办事员。有一次我同一个名叫马场奇静夫的烟政股长和一个名叫木田的警察署警长一起二十几人下乡去缴土。走遍了朱录科、奎德素、万林、黑水等地方，很多地方都歉收，达不到出荷量，但烟政股照册催交、逼交，交不上的就挨打挨骂、受刑挨押。这次缴土因没完成任务拘押了十多名，送交建平县警察署，他们受不住严刑拷打，无奈答应出钱买烟土上缴，送钱给警察署长，才能释放回家。这是每年一次必过的“鬼门关”，成了建平县人民的苦难。

4万多亩地的烟田，每年要缴土800万两，当时每两烟土价值8元就是6400万元。他们又在建平街设有烟膏制造所，在县外黑水等48个村镇设有管烟所（烟馆）。通过烟膏制造所，每两生土可出烟6钱，每钱成烟可分成烟炮5个，每个烟炮可卖1元，每两烟土可获利22元，40万公斤共获利1.67亿元。还设有慢性杀人的暗烟室，吸烟成瘾的人，进了屋子，还要掏出1元钱的油灯费。仅一个烟馆里，每年有吸烟的两千多次，在48个烟馆里，每年总共有吸烟的10万多次。不仅每年夺去建平人的亿万元巨额血汗，也毒害了成千上万人的身体健康。使大部分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此种现象何止建平一县，何止热河一省。

娼 馆

解放前长春妓院一瞥

聂景周

长春妓院的变迁梗概

从1979年到1986年对桃源路东西圈拆迁建楼以后，长春就再找不到妓院的罪恶痕迹了，然而在某些老人的头脑中，仍留有往日的残影。原因是长春的妓院由来已久，虽经变迁但给人们的印象太深了，怎会一下子去掉呢？据说清同治四年（1865年）长春建城以后，城内人烟日渐稠密，市面逐步繁华起来，依次从南关向北，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的居民越来越集中，店铺也较多，有人在塘子胡同（长春第一家澡塘，在西三道街至二道街中间）与轱辘把胡同（从西三道街弯曲斜向全安广场）这两条胡同里，先后开设了许多妓院。民国初年在我童年时曾随大人去过一次，只见那一带道路两旁，尽是一些低矮的土平房，并排有很多小门，每间房内都有一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每天都有很多男人去那里游逛，从各屋出出进进。看起来室内外都非常简陋，听人说这就是长春最早最次的土窑子，长春有史以来的妓院了。

到1906年长春开辟商埠地以后，这时繁华市街逐渐向北移，北门外一天天热闹起来，城内相对逊色。据说开埠局为了振兴活跃商埠地，于1912年秋，在北门外，今大马路长春大街

以北的一条通往三马路的平康里胡同中（今大马路副食商店北侧），建起了一些新的平房，开设游乐场所、妓馆约有十几处，还有少数散户妓女。这些馆所的规模、设施及妓女的穿着似乎比南面那两处强了些，从胡同走过去，能听到唱京剧或窑调的声音。这就是长春的三等妓院，以后又在三马路老市场内与四马路新市场内也分别出现一些类似这样的妓院。因为市场内比较繁华，游人也多，生意更为兴旺。

在这同时，头道沟的日本租界地也相应繁华起来，因接近火车站，往来客商日增，有些人就从车站往南开办了一些旅馆、饭店、粮栈和其他各种商店，因而买卖兴隆人烟辐凑，远远胜过旧市街和南埠地，有人趁机在南广场东侧，今南京大街上岗一带盖起了一些新式楼房（二、三层）开设了许多较高级的妓院。如：莲香班、艳春院、四喜堂……等，这些新建的属一、二等的上等妓院，其规模之大，设备之全，都超过市内以前的其他妓院，妓女也比较年轻漂亮，穿戴艳丽，有的妓女能歌善舞，能书会画。到这里来的嫖客，则多为高官财阀，以及地主纨绔子弟。因为嫖资昂贵，普通人是不能去游逛的，不过也确有为宿娼而倾家荡产，或传染性病而貽害终身的人。想当年头道沟窑子街一带是吃、喝、嫖、赌、抽样样俱全的地方，每当夜幕降临，则华灯齐亮，游人麇集，寻欢做乐。

伪满初期，康德2年（1935年）日人藤井，在今桃源路北侧，东至今十四中，西至来安街，北至新风胡同，建东西圈妓院共60栋，有956个房间，大院四周围有高墙，东院称东圈，西院称西圈，大院内又分若干方形小院，房屋低矮，设施简陋，宛如一排排鸟笼鸡舍，实为人间地狱。当时把三、四马路，新、旧市场内的妓馆迁入西圈定为三等；塘子胡同和轱辘把胡同的妓院迁入东圈，定为四等，共有29家，200余妓女，后来发展到

100 余家，妓女上千人，人称“新天地”和“欢乐地”，每天游人络绎不绝。

妓女的来历与社会背景

妓院的出现和妓女受压迫的悲惨历史在中国总有两千多年。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开明的帝王和进步人士想禁绝这一畸形事物，但都未能做到，原因是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意识和腐败社会风气，始终未能改正。旧中国也曾提出反封建、男女平等，保障人权……等口号，但实际上广大妇女在经济生活上还是不能独立，更谈不上人身自由。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把女人看成附属品，男人的玩物，随意买卖、遗弃或被抵债、奴役、打骂……受到非人的虐待。旧社会不知有多少青年妇女被拐骗，卖到妓院老板之手，被迫卖淫，为人渔利。那时以拐骗人口为生的人贩子经常长途贩运青少年妇女往来于全国各地，这就是长春妓女的主要来源了。当然也有因天灾人祸，饥寒交迫，走投无路，或受家庭虐待而被迫成为娼妓的，但这还是为数不多的。至于良家妇女甘心堕落，牺牲宝贵青春而做娼妓的，几乎是没有的。

到了伪满时期，日伪残酷统治，对中国妇女的压迫与历届统治者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由于多种原因长春各个角落，如：旅馆、饭店、大烟馆、娱乐等场所，到处都出现了女招待，她们实则是暗娼、野鸡，或变为妓院散户妓女，因而那时明的暗的娼妓究竟有多少，谁也不知道确切的数字。

妓女的斑斑血泪史

从古至今妓女一生的遭遇最为痛苦，所受的压榨最为深重，据我考察了解，归纳起来概述如下：

第一，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子被强制离开父母等亲人，到

举目无亲的异地他乡，再圈进囚笼式的妓院，受到精神上乃至肉体上摧残，那种痛苦是无法形容的，这是妓女的第一难关。

第二，每日要受到鸨母、老板的欺凌虐待，各种刑罚是难以忍受的。据说不受打骂的妓女是没有的，往往因怠慢嫖客，以及违反妓院的有关清规戒律，都要受到毒打的。常常打得遍体鳞伤，甚至被毒打致死。

第三，因为成天被迫接客，肉体上的摧残，加上精神痛苦，有些身体本来很健康的人也折磨成病，尤以性病为甚（所谓花柳病），不容易治好，并易传染他人。因为妓女有病，也不给治疗，所以妓女十之八九都有性病，再有她们神经过度受到刺激，得精神病的人也不少。得了病，没人管，往往被遗弃而死亡。

第四，遭受高利贷盘剥。所谓印子钱，就是如果妓女挣的钱很少，不够生活上各种花销，就要向老板借债，这个债是日利，今日的利还不上就要变成明日的本，这种利滚利，使妓女债台高筑，往往到死也还不清。因此，虽然是活期典押的妓女也变成无期了。这是套在妓女身上的沉重经济枷锁。

第五，有些比较红的妓女，只因老板逼迫接客过多，过度疲劳，常常由于精神不支而吸食鸦片成瘾后，身体衰弱，加速死亡。

第六，有些妓女由于年龄稍大或身体衰弱，妓院往往把她们转卖给下一等妓馆去，或由嫖客赎身，或由家属领回，但也有被嫖客再次转卖的，其痛苦是无穷的。

第七，一个如何坚强的妓女，经上述种种折磨痛苦，往往痛不欲生，自寻短见是时有所闻的。在旧社会的城市小报上，几乎天天登载所谓“花讯”，如：某某妓院出了什么事，某某妓女逃跑或服毒自杀……长春市自戕的妓女不可胜数。至于谁是杀人凶手？依法处理过谁呢？却是从来未见过。

第八，妓女如果怀孕，窑头就采取各种野蛮手段强制堕胎，让其继续接客，妓女因之致病或死亡的也大有人在。

第九，至于妓院老板对妓女入院，随意奸污更是家常便饭，为所欲为，灭绝人性。对少年少女也不放过。

第十，窑头平时对妓女看管森严，恐怕妓女逃跑、自杀，除规定严格制度外，常雇用经官协助看管，对外逃妓女捉回来，定要严刑拷打的。

以上只是我知道的一些，当然它们的剥削压迫的方式方法很多，难能尽述了，不过总可想像窑头的罪恶行为与妓女的生活是如何悲惨了。

妓女的两个生活出路

“赎身”——有的妓女侥幸地遇到知心、认为可靠的嫖客，能不惜千金，为妓女还清身价费、生活费……取得妓院老板同意，就可以赎身脱离妓院，这是唯一出路，但很难办到。因为比较红的妓女，窑头是不愿割舍的，即使答应，也要索价高昂，一般人是出不起钱的，所以得到赎身的很少。

“从良”，那时国家只有一条保护妓女的法律，妓女能投奔到济良所时，妓院就不许再追究了。济良所可为妓女介绍对象或找工作。妓女要给济良所一定报酬，不过妓院看管森严妓女也很难跑掉。旧中国济良所在西二道街城隍庙隔壁，我小时候曾去过一次，见到确有一些年轻姑娘，在那里喜笑颜开，似乎在庆贺她们出了苦海。

（摘自长春市《南关文史》第一辑）

昔日吉林市八方亭—东关圈楼

林乃祥

八方亭，地处吉林城东二里许，商埠界内（今东市场内成都街路南，长沙街北，开封街东侧）。建于民国13年（1924年），亭有八角，近似圆形。位省城东，俗称“东关圈楼”。这里曾一度畸形“繁荣”，大批妓院、赌场、烟馆云集于此，成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是社会一大弊害。

1905年清政府被迫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了《东三省事宜条约》，规定：将吉林城大东门外以东九平方里地区划为日本商埠地，称吉林东关商埠。1911年清政府设“开埠局”。这里的土地一律用低价收买，迫使当地农民流离失所。商埠地日商林立，日货充斥市场，日本银行资本几乎垄断了吉林的金融界。民国8年（1919年）开埠局用昂贵的价格放地号。这时一些有权势的军阀、资本家，为了在这里发一笔横财，趁机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修建东关商埠。当时有商人安英伯等，主张为使商埠“繁荣”，在此设市场，修店铺，开妓院，立烟馆，并上书吉林警察厅：“秦楼楚馆，为四民（仕、农、工、商）趋走之场，舞榭歌台，百艺杂陈之地，故通商埠于此地，特加提倡……而东关商埠荒凉无异昔日，游客难以流连，商贾无所消畅，如能将各妓馆迁移其间，则商埠发达指日可待。徒以黄莺紫燕乔木之可迁，剧孟伶官缺甄甄而难舞，故而观望未前，因之荒凉至此，商等有见于此，拟即组织公司招募股款，在东关商埠地请贵厅指定地点建筑房屋120间，迁彼莺花，实此空谷，为公私两益之谋，作

振兴商埠之计”。

民国13年（1924年）由纯锡堂、富益堂和赵师准（军阀团长）在商埠区合资建造的“八方亭”（即圈楼），亭高两层，上小下大，六丈见方，形如塔，木制结构，红柱，绿色薄铁瓦盖。地身（是）三尺，东、南、西、北各开一门。亭内周围有通道，中央设“乐子馆”，北面有小型演台，仿京津乐子馆设计建造，以便招收歌妓演唱。八个亭角为妓馆。楼上设跳舞厅，楼下备小吃部。八角亭与圈楼之间有养鱼池，栽植各种花草。楼外铺设汽车跑道。附近有“青云阁”、“庆丰祥”、“聚仙村”等烟馆（鸦片）。圈楼南门通怡春里（今长沙街）各种店铺较多，有东富友等包办酒席的馆子；西通大马路（今重庆街）有军阀团长赵师准开设的新华舞台；东门可通兴亚池；北门外多为妓馆。一些用各种手段谋生的人，也都聚集到这里。有抽贴的、算卦的、卖药的、拉洋片的、打把式卖艺的，敲锣卖大块糖的……一片嘈杂叫卖声。

以圈楼为中心的东关商埠地，是日本帝国主义从经济上、政治上企图灭亡中国的突破口。自1905年吉林开商埠地起，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止，日本人在吉林商埠地经营的主要行业有70余家（其中：金融机关3家、工矿企业22家、洋行29家、当铺4家、医院3家、旅馆5家、饭馆4家，其他7家）。几乎垄断了吉林的经济命脉。一些利欲熏心的汉奸和资本家，在商埠地中心修建这座圈楼，迎合了帝国主义者的需要，加快了侵占吉林的步伐，实属给吉林修建了一所人间地狱。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吉林后，将圈楼中心的乐子馆处，设“日满会馆”。楼上为舞厅，八角仍为妓馆。即“升平”、“绯红”、“巨福”、“三福”、“巨顺”、“迎仙”、“天宝”、“桂华”。周围有枪房子十七八家，称为二圈楼。

这里成为汉奸、警察、宪兵、特务、资本家吃喝玩乐聚集的场所，也是他们的逍遥世界。从市场南门进入，经饭馆四海春往东拐，是二等妓院“三柜班”，过了“宝华”就是一等妓院“升平”。门口挂着“升平韦玉”的扁格子。楼的上下共有21间，妓女十七八名，掌班的王俊丰，鸭子桂云，熙洽是她的“叉杆”，是桂云的靠山。这里残害了许多良家妇女，她们却大发横财。

圈楼，是一些汉奸、特务、资本家的乐园。每天都要闹腾到深夜两三点钟。这些人，对外出卖民族利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剥削劳苦群众，榨取人民血汗。来到这里，真是“挥金如土”，有各种各样的开销：抽大烟、吃水果、吃局饭……据当时有人推算，这里一夜之间要挥霍数万元之多。相当于几万名苦力一天的工钱（每人一天只挣八九角钱）。

妓院是一座人间地狱，有多少穷家的女儿被逼、被骗、被卖到这可怕的地方。她们受尽了种种侮辱和摧残。“双顺楼”老鸭子米恨新，恶毒地虐待一个叫翠宝的妓女。因她有病不能给赚钱，就罚她洗衣板，并逼两手伸平放两碗水，头上还顶一碗水，洒了就打。一个叫金昌源的老板和他的老婆李金氏（鸭子），用绳子蘸凉水抽打妓女银子，把她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不给医治，伤口溃烂活活地被烂死。有许多妓女为了求条活路要逃出这人间的魔窟，老鸭子怕妓女逃跑，将住处的窗上钉上铁丝网。有时出门“大茶壶”在身后紧紧跟随。有些妓女终身也难跳出这个“火坑”。

在当时的社会里，有一种人以贩卖人口为生，不知有多少穷家女儿被人贩子骗买到手，又转手卖给妓院。有一名姓于的妓女，是江苏省无锡人，因家境贫寒从小卖给张家做童养媳，后被张家以400元哈大洋卖给妓院。旧社会把人当成商品，妓女可按年龄、容貌定出身价，可任意买卖。还有一种人，专门依靠

“吃人”为生，当时称为“领人的”。用少量的钱，买进一些小女孩养着，待她们长大后推入娼门为其赚钱。鴉子李金氏，从两户贫苦家买进两名七八岁小女孩，取名“金子”和“银子”。当长到十五六岁时就迫不及待地逼着她们进入妓院，称为雏妓。“北金乐堂”妓馆老板倪金科从天津买来两名小女孩，待长大后为其赚钱。所庆幸的是，吉林解放时这两个小女孩年龄尚小，免遭其害。可见，东关圈楼是人卖人，人吃人的罪恶社会的产物。

修建圈楼的林某某，在吉林、奉天（沈阳）、锦州有三处家，四个老婆。吉林这个家，他的小老婆王瑶萱就是圈楼“升平”内的妓女。林某虽68岁高龄，但又娶一个22岁的小老婆。家中有6口人，却雇用10人伺候她们。除每人身旁有1名佣人外，还有专门养花的花把式1人，厨师2人，看门守院的1人。他家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1935年，江东荒山嘴子住着一户贫苦农民，他叫程广义，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到秋后打的粮食去掉交“出荷粮”所剩无几，左盘右算还不够交地租。程的老婆有病在身又无钱医治，她一急之下死去。程广义就此“挑灶”了，为了活下去，领着两个孩子到吉林市要饭，流浪着，挣扎着，最后他冻死在这花天酒地的圈楼门外。

（摘自吉林市《昌邑文史资料》第一辑）

残害中国人民的妓女院

——日本皇军大佐在北票创办“新德里”的罪恶

史实文

闹市一角

在1933年至1945年的日伪统治时期，北票街的闹市中心有一棵皮破枝秃的大柳树。它的西南角，有个自成一体、“子午”交叉的十字柳巷。东西南北的巷口处高筑青砖拱门，门楣上书“新德里”三个大字。里内各巷，由各个堂院连接而成，共有砖石结构的平房300余间，并有一处设有二楼包厢的戏院子。新德里约占闹市区四分之一，东至窑街，西至小木桥，南至铁路家属胡同，北至朝北大马路，面积达18 000多平方米。妓院、花烟馆、照相馆、酒馆、糕点铺、鲜货香烟卖店、客栈均分布在各巷之中。其中主要行业是妓院。当时里内的妓院有双顺堂、凤翔堂、宝乐堂、月红堂、天顺堂、芙蓉堂等二十几家，妓女达200余名。它是市中心的闹巷。每当夜幕降临时，各院红灯高挑（各妓院门前都是一个敬神大灯笼），形态各异的游人摩肩接踵而至：有身穿和服、脚卡木屐的日本“太君”；有穿短袄肥裤的朝鲜富商；有扛肩牌、持洋刀的警察“老爷”；有穿西服革履的翻译官；有头顶协和帽、身穿褶子服的敌伪要员；也有穿工人服、歪带战斗帽、腰间掖一条白毛巾搭在臀部上，手拎鹰嘴头的“老虎爪子”（炭矿劳务系的人）、催头、查头；还有身着长袍马褂的富商、老财和一些富家放荡子弟与当地的地痞

恶棍。他们出入于新德里，有的是观察政治动向，有的是包房议事谈生意的；有发泄肉欲的；也有的是想看蹭戏、溜茶根、在窑姐身上找便宜的。总之，出入妓院的嫖客，多属军阀、官僚、豪绅、巨贾、状师讼棍、捐商和日本军政要员。这些人除在新德里花天酒地，纵情声色、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外，也利用这些地方探行情，搭路线，进行军事和政治的投机活动。各堂院的娼鸨们出出进进地送旧迎新，不时叫着妓女们的芳名。见客，妓女们应声而出，拿姿作态，相争拉客。喧闹一时，各得其所。继之，各巷堂院里淫词秽调四起，猜拳、狎艺、猴耍、调笑声溢出巷外。对此，群众说“它是一口翻滚的汤锅”。然而，日本人和一些洋奴们却说：“新德里院內是重仁义、尚礼让”、“无苦无忧”，是新满洲的“新天地”。

后台大佐

“新德里”內的妓院各有后台（花界会称后台为“叉杆”）。后台中有警察、特务、官僚、豪绅和富商。这些软硬不一的“叉杆”，为她们支撑着堂门，保护她们专营卖淫之业。这些“叉杆”又有一个总后台，就是日本皇军的一位大佐，花界会背后叫他“叉杆大佐”。哪个妓院遇有麻烦事，只要将大佐的名片一亮，一切乱子事就迎刃而解了，没人敢碰。这是因为大佐是奉日本关东军的旨意当新德里妓院总后台的。

1933年2月22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北票，而后立即派出日军镇压抗日反满铁血军和广大爱国志士。同时，派出一名大佐，介入地方“靖安肃政”，人们又叫他“靖安大佐”。他和旗长沁布多尔济密谋之后，在大柳树北街兴办起一个“靖安公司”，作为活动据点。随后，他施展了各种奴化中国人民思想、摧残人民身心健康的毒辣手段，并建立了机构设施。其中有专

卖鸦片的小卖所，对吸毒者和贪小便宜的人发证，按时定量廉价供应毒品。同时，他们利用协和会、警察署出面，先找到“新德里”的房主姜尚华，然后又招集分散在北票城内各妓院的娼鸨（俗称龟公、龟婆、老板），组建起北票花界会，并选出了会长高文清。事后由他牵头，把分散在岳家沟、大烟筒后15间房的妓女全部集中到“新德里”，建立了由日军大佐筹划的“靖安妓院”。该妓院建成后，“靖安大佐”倍加欣赏。大佐亲自召集花界会全体人员“讲道”，他大讲什么：“大日本帝国讲的是德孝一体，无条件地效忠天皇是至高无尚的道德标准”。会后，他又留下警察署长、协和会长、花界会长，指令他们一定要把花界会及其他行业办好，办成效忠天皇的榜样，并要把“新德里”院内办成新满洲新天地的模式。对集中到一起的分散妓女，经过一番强制训导，“靖安妓院”鼓乐开张。“靖安大佐”为实施他的构想，又在“新德里”的东门外，建立一所照和木广儿（即旅社的意思。中国人称“照和乱七八糟”）。这样，又给“新德里”增加了新的概念。此外，“靖安大佐”还迫使妓女们参加新的活动。一是强迫妓女定期到炭矿去“慰安”。即用肉体去奉侍那些效忠天皇表现突出的催头、查头及一些矿工中的败类；二是每个妓女都得在固定的时间内，肩斜挎白底黑字的标语带，头系标语箍，上书着日本文字，献肉的意思；手捧油漆藤钵；见人行90度鞠躬礼，同时口中反复赞述：“请您接纳，支援圣战早日完遂。”此外，还要为警察设赌场，去义务陪伴富商、老财、恶棍。

由于“新德里”的无耻行业都按靖安大佐的构想办事，所以里内日益繁杂，房主收到了高额的房租，妓院的老板、龟头们的箱柜里装满了伪币。然而，在“无苦无忧”的背后，却流淌着妓女们的血泪。

在妓女中，除极少数自爱其行的“婊子”（龟头的女儿）而外，绝大多数都出生于良家。她们因生活所迫而逼入娼门。其中有的是因天灾、兵燹、地主的残酷剥削而家破人亡后，受人贩子所骗，被转卖到妓院的；有的因亲人吸毒，被债主所逼而抵押到妓院的；还有的是从半私明（即半掩门）的妓女中挑选来的。这部分人光押不赎，有的自赎其身，反而再遭抵押，使之终身落水。另有少数为富不仁的龟头，把自己妻亲卖淫作为发家之道，他们有的自办堂院，有的到妓院包房批账。

良家女子被逼入妓院后，先交给掌班的（老鸨）强训。最常用的办法是打。老鸨有对妓女打死无论的特权。使用的工具有皮鞭、竹板、藤条、碗碴等。其手段首先要妓女们知道，她们是老板赚钱的工具；为了赚钱，要绝对服从靖安大佐的训导；要无条件地效忠天皇；不准有任何不利于日满亲善的言行。随后教她们学行语、春词，教做各种无耻动作，并学唱密调《满洲姑娘》、《十八摸》、《送情郎》、《摘黄瓜》等；以及接待嫖客的各种礼节和“灌迷汤”的伎俩，还训导哭、笑、献媚与其它一些基本功。妓女被驯服以后，才送进堂院接客。妓雏（16岁以下，妓院叫“青果”）第一次接客，他们称做“青信”，嫖客要付彩礼做服装被褥，治席收礼。当然，处女要遭受野兽的摧残、凌辱和痛苦的折磨。

妓院年年有新人落水，也有年华已老、失去姿色的妓女被淘汰。其中有少数人身体较好，老板就在她们身上榨取最后一笔身价费卖掉，美其名曰：许以“从良”（即被人买去成家）。多数妓女身体已被摧残垮了，有的患有性病，有的吸毒成瘾，她们难以“从良”。对这些人，老板叫她们去“抗刀”，（即占房充数），而后再叫她们充当杂役，只供粗膳、估衣，不医疾病。有人害性病迎春而发，被关进禁闭室，让其先烂掉牙龈、鼻翼，随

之失明，最后脑壳裂缝而死。有人患“歇斯底里”被折磨得非人非鬼，最后气息奄奄地结束了一生。有人身患崩漏，在污血潭中喘完最后一口气。她们死后，老板找来花子乞丐当夜抬出堂院，抛之“义地”，葬于狗腹。这就是日军靖安大佐经营的“无苦无忧”“新天地”的神圣境地！

狗苟蝇营

“新德里”的章程由靖安大佐定，实施者却是一些中国人中为富不仁之徒。他们为了钱，干尽了人间的丑事。妓女们骂他（她）们是“衣冠禽兽”。当时，在新德里各妓院的主要老板（含老板娘）有徐马弁、于老奇、刘殿魁、高文清、丁顺、大白鞋、王云清、张景良等二十多个，这些人在社会上称爷报号，表面装得文明和善，心里却一个比一个奸诈肮脏。

张景良，自办一所妓院，年仅40岁就自报“张爷”。他经常像狼狗一样窜到北街卖人市上寻来寻去。有一次，他发现了一位年轻的寡妇，携一少女，横插谷草（旧社会从良而不从娼的卖身记号）。张景良见寡妇身条匀称，五官端正，少女眉眼俊俏、皮肤细嫩，便用套老乡、装同情的花招欺骗了这母女俩。寡妇向他简述了不幸的遭遇：她今年38岁，原籍山东，随夫逃荒来到北票谋生，不幸丈夫病故。为还借债，带养其女，才被迫卖身。经人撮合，双方共同立下字据。寡妇以200元现洋的身价，卖与张景良为妻并带养其女。如日后女方有亲朋找来口角，由女方一方承担责任。张景良把这母女买到家中不久，便现出了狰狞的面目，先奸污了养女，而后把她领进妓女堂院，起名“桂秋”从此占房接客，为他赚钱。此后，桂秋还得当众叫张景良爸爸。如果晚间接不到客时，她还得回家与其母同遭张的蹂躏，以满足他的兽欲。

高文清，以其妻与妻妹卖淫起家，人称“老鳖”。他的处事哲学是“金钱万能”，为了挣钱，他不惜采用任何卑劣手段。在靖安大佐的卵翼下，不但当上了花界会的会长，而且把他的堂院发展成为有八九个妓女的大院，大捞钱财。另外，在花界内部他还有进钱之道。比如：外地流动妓女来“搭灯”，首先得对他登门拜访，并给他一些实惠。否则，既不准她占房批账，更难以站住脚跟；平时，他经常偷偷地把暗妓冒充良家女子送进昭和旅社，以满足日本人或中国官吏的性欲。他却从中取得恩赐，并克扣暗妓的所得；更为可耻的是，他出卖灵魂，充当靖安大佐的鹰犬。在无耻行业中，谁要答对不好他，或稍有不轨之处，他就到靖安大佐那里奏上一本，谁就得身遭横祸。他横行于各个妓院之中，每天查看一次嫖客们的登记簿，发现可疑者立即禀报，有好多入惨遭逮捕刑讯。

人贩子槐子香，是个自爱其行的妓女。岁月更迭使她失去了姿色，出院后又干起了拐卖人口的罪恶勾当。解放后，在我治安人员审讯她的记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你在解放前贩卖过多少口。”

答：“没个准数，我没计算过。”

问：“没准数，顶多有200？”

答：“200可多，300也打不住！”

槐子香，不但活动于满洲国内，而且和山海关、唐山、天津一带有联系，并在各地设有好多据点。天津洪桥附近的据点就是其中一个。她在那里雇一名老娼母，强训4名少女，即：大姐、二姐、大丫、小丫。

大姐生在长城脚下一个小康之家，可谓一块碧玉。在1938年日本侵略军扫荡中，家被烧光，其父母死于日军的屠刀下，其祖母含恨自尽，抛下这个少女，举目无亲，衣食无靠。她只好

沿街乞讨，流落街头。1939年，她从山海关到天津，在法国桥北，被瑰子香发现。瑰子香见她虽然蓬头垢面，可是仍掩饰不住她那细腻的皮肤、标致的身条、清秀的面容和一双大眼睛。瑰子香心里一颤，心想：经过强训，将来可以送到二等妓院，挂出美人的牌子，那就是一棵撒不倒的摇钱树。于是，她以帮她找工作为名，将她骗到据点，交给了老鸨子。她对老鸨子暗授机宜，起名大姐，进行个别训练。除对她进行常规训练外，单独给她减食定量，并在腰间扣上有刻度的板带，以练身体的曲线美。还有捆绑住脚掌，不让膝盖长得凸出。在强训期间，稍不中媚鸨的意图，晚间便给她吃“犒劳”（即单独挨打之意）。

这个村姑无力挣脱束缚，只得面从心违，把仇恨憋在心中。久而成病，面黄肌瘦，脖子渐粗，长出了“气瘰”。瑰子香为培植这棵摇钱树，请了一位老中医，终于为她治好了疾病。大姐在就医中发现，这位医生心地善良，便暗中向他诉说了自身遭遇，并恳求他设法营救。这时，瑰子香已将其他3个少女，以每人600元现洋的身价，卖到奉天（沈阳）“平康里”妓院。大姐听说“平康里”内天天都有妓女被蹂躏致死，死后扔进厕所，被粪车拉走，她非常恐惧，因而下决心寻机逃走。在老中医的帮助下，她终于乘火车逃到山海山。瑰子香发觉后跟踪追寻，在山海关车站将她抓获，一怒之下将她送进妓院，并立下三七分成的合同。入院后，瑰子香让老板给她灌了“百毒汤”（抵御梅毒的中药，其中有乌蛇、金蝎、斑毛、红娘），而后给她盥洗开脸、定发型、着艳装，做了“青倌”，为期30天。瑰子香从中批账1050块银元。“青倌”期满后，又将她携至北票双顺堂。该堂院的老板娘是两个寡妇。经瑰子香与两个老板娘密谋，叫大姐又冒充‘青果’。寡妇老板在门前挂出：“从山海关新到‘青果’，貌压群芳碧玉无暇，请君一试”的招牌。于是，将北票一

名富商骗进堂院。富商嫖客是北票街内一位有名人物，因久婚不育，想在妓院选一名可心的处女为妾。其目的：一是为了生儿育女，连接坟头上的烟火；二是为了装潢门庭，显赫身份，便于交结权贵，发展自己的商业。所以，他初视这位山海关的“青果”，便一见钟情。于是，付了重金，大操大办，他又做了“新郎倌”。在洞房之夜，上床之前大妞主动向富商吐露了真情，述说了以往。这位富商听后，不但没因受骗而产生反感，反而同情这位贫家少女，并逐渐产生纯洁的爱情，最后富商答应赎她出院。“青倌”期满后，富商又以每日40块银元的高价，包房3个月，魂子香从中又得伪币2600多元（每元伪币折合一块银元）。期满后，大妞卸装拒客，心如铁石。老板强制她接客，她以死相拼。魂子香无奈，又将她以600元的身价卖给了那位富商。魂子香的手段卑劣已极，惨无人道。

罪恶累累

日伪时期的“新德里”，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可谓罪恶累累，罄竹难书。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无耻的行业，不但残害了无数良家女子，而且也潜移默化地残害了中国广大群众。使一些人在欢声笑语中忘掉祖国、忘掉民族、失去理想和前途，变成任人驱使的奴隶；有的人被掏空身体，榨干了血汗后，又在喷云吐雾中身躯干瘪，丧失了工作及劳动机能，最后痛苦地结束一生。此类人物城乡处处可见。“小墩实”就是其中的一个。

“小墩实”是河北人。“九·一八”前，随其姐夫从唐山来北票炭矿，投陈矿师谋生，临行时老母再三嘱咐，要他到矿上好好做工，挣了钱养家糊口，将来成个家，千万别走下道。他到北票后，姐夫做了陈矿师的厨师，他被分到冠山井口当了通风班的徒工。在陈矿师的帮助下，他钻研技术，立志将来做一

个井下通风的专业人员。所以，他干起活来注意观察，班后在独身寮里看书认字，琢磨井下通风的原理。由于他是矿师介绍来的，干活又很利落，平时爱说爱笑，上下混得很熟，工友们都很喜欢他，并据他身体特点，送给他一个绰号——“小墩实”。

日本侵略军入侵北票后，陈矿师带着他的姐夫离开了北票，使他失去了可以依赖的亲人。随这环境恶变，日本人称工人为苦力，并以棍棒相待。他心中恨透了日本侵略者。下班后他也不再在寮里看书了，便到处散游，寻找同情、散心，有一次，他想去看戏。在经过“新德里”妓院前时，被一个叫桂舫的妓女生给拉进了堂院；终于开了“盘”子。桂舫要求他明日再来，并答应为他留铺。他守信赴约，按时入院，从此他忘掉了仇恨，失去了理想，隐入殷情孽海之中。不到百日，他把所有的积蓄全部扔进妓院。最后，他把从山东背来的一套小行李也卖掉了，落得束空手脚，还被妓女掏空了身体，大伤了元气。井口把头见他出没无常，怕他招来灾祸，加之在他身上再没油水可捞了，于是就把他赶出了矿门。然而，妓院的老板并没放过他，以桂舫做诱饵，钓他到妓院充当杂役，只供吃喝，没有其它任何报酬。他因恋桂舫，便到妓院干起了低三下四的差使。妓女们称鸭子为娘，而他还得管妓女叫姨娘，凡是妓院里的人都有支配他的权力。他每天固定的任务是：扫堂院，倒污水，扔“垫纸”，送垃圾，此外，每当夜幕降临时，叫喊“墩实”的声音此起彼伏。买鲜货、打开水、倒垃圾……天天跑到深夜，累得精疲力尽。他所接触的人，都有吸毒的嗜好。有时她们也让他吮一口“提神”，有时还给他点“烟灰”喝。久而久之，使他染上了毒瘾。后来，妓院也怕他闹事，就把他逐出了堂院。

“小墩实”流落街头后，才认清了老板的黑心肝、桂舫的真

面目。于是，他就到处揭她（他）们的丑闻，翻妓院的老底。他的言论受到“小花子”们的欢迎，于是“小花子”一致推举他为首领。他领着这群“小花子”捉弄妓院的老板，发泄胸中之恨。堂院有鸿鸾之喜（有嫖青楼的），他代表一个团体去上礼做客，兼管燃放“铁炮”（礼炮），走时讨要重赏。每当过传统节日，他挨家给老板送。礼物是两包点心，两瓶贴有商标的“好酒”。酒瓶是从饭店拣来的，酒是用水兑的或纯白水。送到礼物，当面对赏给少了他说不够分，还得回回手添几元。堂院死了妓女，或摊上路倒，他主动上门包抬。报酬要超过用大车拉的两倍。他还要求为死者做全套寿衣，否则他就把全体花子集中起来，向老板查问致死的原因，并唱“莲花落”，编“顺口溜”揭露老板为富不仁的罪恶。后来，“墩实”触怒了高文清，他以花界会的名义，向靖安大佐作了禀报，说：“墩实”集中花子闹事，破坏靖安。大佐一个电话，警察出动把小“墩实”抓去暴打一顿，但未加治罪。放出不久，他便惨死于街头。

还有一位“少先生”。他生在农村一个老中医的家庭里，是“老小子”。这位老中医，平时不分贫富，有请必到，年年给方圆百里的婴儿种痘，他主张穷人治病，富人出钱，他一生深孚众望，济世于人。少先生在老中医的影响下，自幼发奋苦读医书，立志继承父业——在农村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好医生。他16岁以前就读完了《四书》，继之读了《四百味》、《汤头歌》、《脉学》，又开始学习《御纂医宗金鉴》。17岁时，老先生给他成了家，娶一农村姑娘，乳名“巧姐”，比他大两岁。巧姐过门后，知情达理，孝敬老人。老先生每次出门往诊，她总是同少先生备好毛驴，驮上药箱，牵到门外。并嘱咐求医者注意老人的安全。而后，目送老先生远离村口。老先生回来，只要小俩口听到驴叫声，就迎出门外，随之侍与茶饭。老先生见儿子学习刻

苦，办事听话。巧姐也很懂事，又很孝顺，就把祖传秘方以及全部资金积累交给了少先生。此后，少先生在家专心经营药铺用秘方配制丸散膏丹，并在老先生的辅导下，开始诊病。乡亲们都为老先生有个好继承人而高兴。然而，这样一个美好家庭却被“新德里”所毁灭。

老先生配制成药的原料，全由他自己到北票选购。少先生19岁那年，才介入这项业务，少先生随同老先生第一次进城购药，住的药店是“新德里”的近邻。当晚，堂院的锣鼓声，不断传入少先生的耳内，好奇之心油然而生。但是，他在老先生身边不敢妄动，只好苦熬了半夜，不久，他自己带300元伪币重进北票，当晚以探亲为由离开了药店，步入了“新德时”堂院。妓院老板大白鞋发现少先生像个少爷，就向堂院红人水荷花暗授机宜，要缠住他，拴这个铁串子。老鸨一声见客，各室妓女出门献媚，弄得这位刚刚进入成年的少先生眼花缭乱，手足无措，结果被水荷花拉进室内，落下了窗帘。一顿迷魂荡灌得他失去了理智，午夜，大白鞋又大股勒，手捧烟俱走进堂屋，请少爷“扳个尖”解乏（即抽烟泡的上头）。大白鞋退出后，水荷花又和他放荡一番，弄得他忽忽悠悠地进入了梦乡。天明老鸨叩门迎客大喊：“7点多了，改日再会吧”。至此，才结束了这出假凤虚凰的开场丑剧。少先生强打精神回到药店，取货回家。此后，少先生每月必到北票一次，每次二至三天。久之，因宿娼淫欲无度，回家还要应付巧姐的温存，再加上吸食鸦片成瘾，使他逐渐消瘦。老先生对此误认为小夫妻“房事”过多，造成气虚。于是，为他配制料药调治，同时提示他忌房，但毫不奏效。直至年终，北票药店派外柜来老先生家登门要账，老先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上千元的购药款，让少先生都送进了大白鞋的腰包。老先生借债还上药款，并写信致歉。事后，老先生对少

先生加以控制，再不准他走出家门。但是，此时已晚。少先生被烟瘾所逼，趁老先生往诊之际，干起了坑、蒙、拐、骗的罪恶勾当。严重地败坏了老先生的声誉。因此，老先生一气之下便将他赶出家门。少先生离家后，不但丝毫没有改悔，反而开始偷驴盗羊，成了鸡鸣狗盗之徒。老先生一再发誓，和儿子断绝父子关系，但心中总想着这位宠儿。老先生恨残害儿子的妓女，也恨当初自己教子不严。不久，郁闷成疾，寿终正寝。巧姐被娘家兄接回。少先生获悉后，到岳父家连哄带骗，将巧姐诓到北票，又以150元伪币作价，抵押到妓院。半年期满，巧姐用积攒的“小柜”自赎其身，找到少先生，劝他到“康生院”戒烟，而后返回原籍继承父业。此刻，少先生已变态，完全失去了人性，他暗地里又和老板立下契约，二次又把巧姐抵押到妓院，为期一年，身价为200元伪币，使巧姐终身落入风尘。少先生二次拿到巧姐的身价费后，很快就把巧姐送进了“大丫头”的花烟馆。康德7年（1940年），他躺倒在北票五工村的串窑内。因毒瘾的折磨加之饥寒交迫，在奄奄一息的弥留之际，被野狗先啃其肉，后分其尸。

这就是日伪统治时期靖安大佐创办“新德里”的“功绩”，也是他们“重仁义”、“尚礼让”、“无苦无忧”的真实情景。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我军接收了北票，老板们慑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威力，有些妓女已冲出牢笼，寻找归宿；有的在老板的控制下开起了“半掩门”（暗娼）。“新德里”的妓院大部分倒闭。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窑子胡同

魏长海

在旧社会，黑龙江省巴彦县城的关帝庙前后左右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场所，那里商店、饭馆、旅馆鳞次栉比，家家高挑幌子，招揽生意。市场广阔处，行商贩客叫卖唤买之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还有那打把式卖艺的、拉洋片的、卖药丸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人物汇聚于此，构成一副百业繁忙图。就在这繁华热闹的庙头的东南边，有一条胡同，家家都钉着板障院，门口倚着浓妆艳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向过往行人卖弄风情，勾引男人，这些女人就是专以卖淫为生的妓女。因此，人们把她们住的这条胡同叫“窑子胡同”。

窑子胡同内有三十来户妓馆，最大的妓馆有三四个妓女，最小的仅有一个妓女。这些妓女，大多数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一小部分是十三四岁的小姑娘，还有三四十岁的半老徐娘。别看她们表面浪声艳笑，扭怩作态，露出卖弄风骚的样子，但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本说不完、诉不尽的血泪帐啊！我曾访问了一位老人，她8岁被卖到窑子里，在那里混了11年。在那难熬的岁月里，她饱受了各种折磨，并亲眼看到同行姐妹的不幸遭遇。

我家原住在县城兴让街，一家3口，父亲在旧社会染上了抽大烟（鸦片）的恶习，抽得家徒四壁，全靠母亲要饭度日。我到8岁时，父亲抽不起大烟，也扎不起吗啡了，就改吃大烟灰。天长日久，大烟灰也吃不起了，就打起我的主意来，偷偷地与

老鸨韩金坊讲妥，以250元（伪国币）的身价卖给她作“义女”。一天，韩金坊和她男人到我家来领人，我抱着爹爹的大腿，哭喊着：“我不去，死也不去。”妈妈坐在炕沿已哭成个泪人。爹爹见我死缠着不去，抡起大巴掌狠狠地揍我，还威胁我说：“你不去，就卖你妈！”我一听这话吓呆了，妈妈被卖了，钱到爹手用不上多久花个净光，我还不是照样被卖吗！想到这里，我一横心，对爹爹说：“我去！”

我被推进火坑之后，失去了母爱，受尽了各种各样的折磨。我那时岁数小，不能接客，韩金坊哄骗我说：“我无儿无女，把你收养过来当亲姑娘看待，今后你管我叫妈好了。等你长大之后，给你寻个好人家的，妈下一辈子也有指望啦。”我毕竟是个单纯的小孩，不懂窑子里的规矩，凡是被老鸨娘买进的小姑娘，都管她叫妈。我心眼实，满以为这下遇到了好人，急忙伏在地上磕了几个头，认韩金坊为干妈。可是，后来通过一桩桩的事，我看清楚韩金坊不是个好东西！

韩金坊和她男人领着两个20岁上下的姑娘，一个花名叫小金花，另一个叫小来顺，在窑子胡同开设两间门面的妓馆。她们就把离妓馆七八百米远的3间大瓦房，扔给我一个人看着。到了夜深人静时，觉得很瘆人，风一吹窗户纸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像有恶人或妖鬼迎面扑来，吓得我蜷成一团缩在被窝里，大气不敢出又不敢往外看。每当这时，我就想起妈妈，她若在女儿身边，哪能让自己的亲骨肉吓成这样。一想到这儿，我就哭，哭累了就昏昏睡去，醒来再哭，就这样伴着泪水熬过一个个漫长的黑夜。

一天，韩金坊的男人（我们管他叫“大茶壶”）对我说：“咱们这样人家是以身当地种，不能养白吃饱的。”我一听话音不对，轻声回答道：“干爹，我没有白吃饱呀，不是给你们看房

子吗。”他恶狠狠地说：“看房是嘛活计，养一条狗也能行。从今天起给我们做饭！”这个天津人说完一甩袖子走了。从此，为一家5口人做饭的活就落到我这个才8岁的小姑娘身上。

看房子、做饭这种活，虽然又累又苦，但比同行姐妹还算幸运，她们比我更惨。一天，韩金坊回来，一面摇头叹气，一面叨咕说：“真作孽呀！”我好奇地问是怎么回事，不知她是出于什么心理，讲出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原来，窑子胡同的东头，有一个姓张的开“三义茶社”，既卖茶水，又请艺人说大鼓书，还开妓馆。前一个月，有一个叫张中宾的庄稼人，还不起驴打滚的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挑着两个小姑娘来窑子胡同卖。大的13岁，小的11岁，大的被张老板买去。张老板为新买来的小姑娘起了花名叫“小凤”，让她给顾客斟茶倒水。没想到，一个姓黄的大财主看中了小凤，一定要这个“雏妓”接客，包一个月出价200元。张老板一看姓黄的出了大价钱，连小凤的身价都回来了，就满口答应下来。之后，张老板硬逼着小凤接待这个五六十岁的老家伙。小凤说啥也不肯，他们就动手把小凤的衣服扒光，用皮带抽，香火头烧，折磨得半死不活时，将小凤抱进内屋，姓黄的畜牲乘机大泄兽欲，糟蹋了这个13岁的幼女。韩金坊说完这段事情后，又对我慢声细语地说：“这也难怪张老板这么狠毒，谁家买个姑娘不图挣两个钱呀！我是过来人，知道姑娘家都愿意保持清白身子，可我们这个地方能答应吗？小凤现在哭哭闹闹，这回破了姑娘身，以后就会顺顺溜溜接客了。”她说完就走了。我猛地关上门，想着小凤的遭遇，想着韩金坊刚才那番话的弦外之音，又想起“卖大炕”的小红。小红是个有夫之妇，还有个孩子，因丈夫无营生可干，她只好出卖自己肉体，换取一家的生存。小红接来嫖客时，她丈夫就抱着孩子躲开，待事毕之后，他再回来，就这样人不人、鬼不鬼地混日

子。我想着这些人和事，心里一酸，嚎啕痛哭起来，哭她们的悲惨遭遇，也哭自己将来的命运。

随着自己年岁的增长，我渐渐明白了窑子的内幕。妓女接客有三种形式：开盘、拉铺、住局。开盘用天津话说叫“打茶围”，就是阔老阔少到妓馆来，嗑着瓜籽，喝着香茶，点名叫哪个妓女来伺候，供他们耍笑嬉闹开心。在伺候时，妓女要坐在嫖客的膝盖上，满脸堆笑地将瓜子瓢用舌头尖送到嫖客的嘴里，还不许有唾沫星。开盘是论钟点算钱，一个钟点收费1元，瓜籽和茶另算。拉铺是妓女白日里陪嫖客睡觉，限制一个钟点，收钱一元五角。拉铺得随来随接，有的妓女一天接四五个客。住局是待开盘、拉铺营生干完之后，妓女晚上12点钟又开始接待住下的嫖客。在未住下之前，嫖客得请妓女吃夜宵，闹腾到半夜一点钟左右才开始睡觉。一宿收费二元五角。第二天8点多钟，妓女梳洗打扮后，又重复昨天的营业。老鸨为了多赚钱，是不管妓女死活的，过了月经期3天，没等生理恢复正常就被逼着接客。这样，妓女大都得了病不能生育。由于妓女无休止的夜生活和性生活，严重摧残了身心和肉体，所以个个积劳成疾，面黄饥瘦，活到五六十岁就算是长命的人。上面说的小凤只活到20岁，还正处于生命旺盛时期，就被妓女生活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最为狠毒的是，这些没良心的老鸨娘，为了使妓女永远成为手中的摇钱树，设下重重圈套，其中惯用手法就是千方百计地使妓女负债累累，难逃火坑。我们这些从小被卖到窑子的姑娘，长大之后不管怎么替老鸨子赚钱也不算数，倘若有人赎你从良，除身价外，还得加这些年来的吃穿费用，一般是赎不起的。赎得起的人都是六七十岁的大财主，讨妓女去做小老婆，这也是活受罪，还不如死在这里。至于为生活所迫，半路到窑

子的年轻女子，更为可怜。当时虽然先讲好是对半分红，但到月终一结帐还欠老鸨子的钱。其中奥妙就是老鸨子千方百计勾引年轻女子抽大烟，一旦抽上了瘾，就得向老鸨子借钱买大烟，天长日久，债务越积越多，到死也还不清，有的妓女不抽大烟，老鸨会设法让她在生活上挥霍无度，使你的经济入不抵出，结果还是同样要负债。妓女在债务重压下，不得不顺从地为老鸨子卖命，想逃出火坑真比登天还难呀！

妓女在年轻能挣钱时，老鸨子视为“稀罕宝”，可是，妓女一旦到了年老珠黄不能接客时，老鸨子就会一脚踢开，转手卖给人贩子。伪满洲国后期，实行统一价格和配给制之后，弄得各行各业处于瘫痪状态，妓馆生意也日渐衰落，老鸨子韩金坊眼看生意做不下去了，她就将小金花以500元钱卖给鹤岗人贩子了。看着小金花的下场，联系到自己，感到很凄惨。

我们不但受老鸨子残酷剥削，而且还要受警察的敲诈勒索和污辱调戏。那时，我们这些妓女就是生活在人间地狱里，没有人身自由，受尽了侮辱、蹂躏，被“上等人”视为牛马不如的人。可是，我们也是人，也和其他人一样，盼望获得人身自由，过上几天好日子呀！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一个妓女的苦难

卢振国 王奉三

李雅芹是吉林省榆树县弓棚子人，幼年家境贫寒。12岁时恰值屯中闹“快道行”（瘟疫），父母相继去世。母亲临终前将

她托付给舅舅。舅母是续弦，为人阴险。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李雅芹已长成18岁的大姑娘了。当时，兵荒马乱，盗贼四起，舅母催促舅父早日将她嫁出。她舅父便将她许配给本屯财主张万财的远房侄子张成斌。张原是东北军的一个副班长，东北军开往关里时，他与同班的几个弟兄合伙携械开了小差，在辽阳一带，昼伏夜出，从事劫道、砸孤丁的勾当，成了腰缠万贯，拥有大量“袁大头”（银元）的富人。张成斌用20块银元做聘礼，把李雅芹娶过来。张比李大18岁。张喝大酒，要大钱，一不顺心，就对李雅芹拳打脚踢。李雅芹与他结婚的第六年，张成斌已落得家徒四壁，以至借贷无门。

有一天，张成斌对李雅芹说，到他舅舅家去借几个钱，做个小买卖，以维持生活。他一去十几天，回来后不仅带回很多钱，还给李雅芹买了件漂亮花旗袍和一些化妆品，说是做买卖赚钱买的，还说，过几天领她到舅舅家致谢。

一天，天晴日朗，张成斌领着李雅芹到五常县城串亲戚。她生长在农村，30年没离开家，一路上满眼风光，使她心旷神怡。到了县城，穿街走巷，来到了宝山胡同（窑子街）的“翠兰堂”。当她看到花枝招展的女人，同一些男人正在打情骂俏时，心里十分疑惑。就问丈夫：“舅父家怎么这么多人？”张成斌谎说：“这是在办喜事，别多言语，等会就知道了！”她只好默默不语。这时，迎面走来一个胖女人，看上去，一脸横肉，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笑着说：“哟，你们走累了，快进去歇歇！”进屋后张成斌借故上街买盒烟，就溜之大吉了。胖女人关上门对她说：“我是开窑子的，你丈夫把你以500块钱卖给了我，我是这屋的掌班的，往后，你就叫我‘妈妈’。”说完，掏出了卖身文契。李雅芹没念过书，只见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还有红

手印。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她要夺门而出，去找她的男人，却被老鸨推回，冷笑一声说：“好，你就等你男人来接你吧！”说完，反手锁上门便走开了。

李雅芹被锁在屋里，三天不吃不喝，大哭大闹，但根本无人理睬。一天晚上，老鸨带着一个手拎皮鞭的男人，走进屋里，老鸨手指李雅芹说：“都三天了，你男人为啥不来接你？明明是你们做下的扣，想骗我的钱，痛快给我换衣服接客！”李雅芹给老鸨跪下，哭着说：“我是良家女子，咋能干这种事呢，快放我出去，我借钱加倍还你，我变牛变马也会报答你的大恩。”老鸨子冷着脸说：“干我们这行的，不图报恩，就图赚钱。有一句俗话：‘良女进娼门，不干就丢魂’。”说完一使眼色，那男人手里的鞭子噼噼叭叭地抽在她身上，她倒在地上抱头翻滚。老鸨说：“臭女人，明天我听你回话！”

翌日，老鸨又来逼她，李雅芹仍不从，老鸨大怒，又令那男人将她绑上，用筷子夹手指，她痛得晕了过去，醒来后，她放声大哭，痛不欲生。过了一阵，室内只她一人，走进两个妓女，劝她吃点饭。还说：“要想开点，别太死心眼了，我们也是好人家的女儿，被拐骗到这里来的……”其中一个叫佩君的，年约40岁左右，言谈举止忠厚，朴实，她劝李雅芹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攒几个钱，遇到好心人，就赎身从良，跳出这个火坑。”“胳膊拧不过大腿，不要白受皮肉之苦，你听大姐的话，吃点东西，别饿坏了，有时间我再和你唠唠知心话。”她俩走后，李雅芹勉强咽下一点食物。

晚间，老鸨子又来了，这回跟她来的是个头戴大盖帽、腰悬洋刀，肩上一杠两花的警察。此人满脸大胡子，一进屋就说：“你丈夫已把你卖给翠兰堂，他把钱拿走了，你就是翠兰堂的人，这有你的卖身文书，私凭文书官凭印，要打官司到哪你也得输，

你要放聪明点，免受皮肉之苦……”说完扬长而去。他俩走后，佩君又来了，她是主动向老鸨要求劝李雅芹的。她还说了自身的经历：她是在事变那年被人贩子卖到妓院的，最初她死活不干，在他们软硬兼施的逼迫下，为了求生，只好答应下来，倚门卖笑，送旧迎新，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尽残酷的折磨。这种非人的生活，已有10年之久。佩君为她想出个好办法，让她向老鸨提出要求。一是，卖笑不卖身，只接客不留客；二是遇到合适的人，准许贱身从良；三是休息一星期，恢复健康后，方能接客。老鸨答应了她的条件。

翠兰堂新来一个妓女的消息，传遍宝山胡同，吸引了一些嫖客，络绎不绝地来到翠兰堂，想看看新来小妞啥样。7天很快就过去了，老鸨立刻叫她接客。给她起名叫“雁月”。经过同堂姐妹佩君等为她梳妆打扮，从1939年7月某日起，李雅芹的妓女生涯开始了。她想到，今后要和许多陌生男人接触，任人蹂躏，不禁黯然伤神。这时，猛听一声吆喝：“雁月见客！”她被佩君等姐妹簇拥出来，她看到眼前那么多男人，她眼冒金星，几乎昏倒。老鸨子为她放了一串鞭炮，好奇的嫖客，为一睹芳容，以两元的伪币进门嬉戏片刻。这一天，她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小官吏、富家子弟、地痞、流氓，还有扛大个的山东大汉，从这些人中，她没有发现可以和他从良的善良人，她十分懊丧。佩君劝她说：“想要找个从良的，需要看机缘，心急不行！”这一天她一句话也没说，引起嫖客的不满，有的出言不逊。多亏佩君给打圆场，说她刚来，还是一个雏，以后会伺候好的。事后佩君告诉她，这些人是三教九流，啥人都有，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我们得罪不起，挨打、受骂、遭受凌辱是常有的事。你得迁就应付，逢场作戏就是了。这一天，老鸨的收入约50余元，是平日收入的3倍。老鸨特备几样好菜送入雁月房中，老鸨和那个

大胡子警尉作陪，殷勤地劝酒、吃菜。她仅吃一口就放下筷子，老鸨和大胡子警尉感到无趣，遂快快而去。她把门关好，上床便昏昏沉沉睡去。

翌日，佩君不再陪她，老鸨要她独立接客。三三两两的嫖客接踵而来，但也只能打茶围（俗称开血），仍看不到她的笑脸。有的嫖客口出恶言：“臭窑姐子，还端架子！”由于多数嫖客都遭到冷遇，寻不到开心，渐渐地便门庭冷落，来人稀少。老鸨一看，情形不妙，就怒吼着：“雁月，你是窑姐，不是千斤小姐，人家花钱来买笑，谁愿看你寡妇脸，把客人都给我得罪了，以后再这样，看我不剥了你的皮才怪呢！”老鸨的威胁、恫吓，都没有改变她的意志，她对嫖客仍然不说不笑。于是，一个迫使雁月下水的恶毒陷阱，在老鸨心中形成了。

妓院照例在午夜时分，凡没有嫖客住局的，都给以简单夜宵小吃。这夜，送来的是小米水饭和几样可口的咸菜，她吃完不久，便感到头发昏，眼皮沉，便合衣而卧进入梦乡。醒来后，天已大亮，睁眼一看，身边是大胡子警尉。她忙披衣而起，竟发现自己已一丝不挂。气急之下，狠狠地给了这男人两个嘴巴，大胡子抽出皮带，劈头盖脸地向她打去。打骂声惊醒了各屋姐妹，众人对大胡子好言相劝，大胡子警尉才愤愤地离去。临走时说：“臭婊子，今后乖乖地接客好了！”这是1941年发生的事。

李雅芹历经两年的妓女生涯，那颗纯真的心就这样被罪恶的社会吞没了，她很透了这这个淫窟，更恨透了造就淫窟的社会。她规劝青年人，不要走下道，说明常进烟花巷，不仅会倾家荡产，还要染上花柳病，既毁坏了身体，而且还会断子绝孙……她不顾老鸨威逼，有时竟把青年嫖客打发走。

她接客时，凡是来寻欢作乐的人，都让他们开心而去；对那些单纯发泄性欲的人，就以身体不爽而推却；来此住局的人，

只能在此吃住，她不陪睡。有些嫖客一看达不到目的，便弃她而去，因此，她常遭老鸨谩骂，但也奈何不了她，因为她的收入仍超过一般妓女。可是那个大胡子警察又多次奸宿了她，这是她无法抗拒的。李雅芹身陷娼门，饱受风尘之苦，但人世沧桑，知己难遇，从良的希望破灭了。多年来，她没有多少积蓄，因为她不想诱惑、欺骗、勒索嫖客。想自赎身子是办不到了。

一天，一个青年走进她屋来，自称是五常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名叫孙××，他哥哥是哈尔滨第四军管区宪兵团的中尉宪兵，他哥哥送他来五常读书，住在会增东烧锅，因不堪寂寞，来此风月场走走。听说翠兰堂有位正直的的妓女，慕名而来。她破例将他留下，向他倾述了自己的苦难身世，继而诚挚地规劝这位青年人：“应当有志向，走正路，不该走下道，断送青春。何况我已徐娘半老，和你很不般配，只能把你当作小弟弟……”孙××听到这一席话颇受感动，他来的目的，确是好奇心驱使。看到雁月对他诚意规劝，感激之下，竟让雁月做他干姐姐。又说：“今后谁欺负你就找我，我家住在双城，我想办法替你出气……”然后，他把老鸨叫来说：“这间屋我已包下，不许让别人住局！”说着掏出一叠绵羊票伪币，交给老鸨。从此，李雅芹晚间便可清静地睡去。她十分感激这位萍水相逢的仗义青年。她与孙××视如姐弟，时常劝他努力学习，别辜负父母期望。孙××每隔六七天就来看望她。

有个星期天，孙××来看他干姐，两人坐在床上促膝谈心，雁月谈及她几年妓女生涯只积蓄了百十元钱，远不足赎身。孙××表示，回家后和父母商量，让哥哥出头办理赎身，但出来后到哪里呢？正在此刻，门开了，大胡子警察走了进来。孙××说：“这屋子我包下了，你给我出去！”大胡子眼一瞪说：“小兔崽子，你敢骂满州国的甲等委任官！”上前就拳打脚踢，把他

扯出门外。这夜，大胡子又宿在雁月屋里。

翌日，孙××坐早车去哈尔滨找他哥哥，兄弟二人当天乘车返回了五常，直奔翠兰堂。老鸨一见来了宪兵，知道情况不妙。孙××叫老鸨去把大胡子警察叫来。老鸨哪敢不从命，当即叫人去请。大胡子一进翠兰堂，便瞧见屋中正面坐着昨天被打的青年人和一个宪兵，知道大祸临头了。孙氏兄弟不容分说，大打出手。大胡子虽然膀大腰圆，在警察学校受过训，但在宪兵面前，哪里敢反抗，一杠两花的肩章被扯掉，大盖帽子也被踩扁，屋内东西碎的碎，坏的坏。其它屋嫖客早都溜之大吉了。老鸨怕事情闹大了，硬着头皮上前苦苦哀求孙家兄弟，大胡子警察也急忙陪礼道歉，请求宽恕。并答应打坏的东西由他赔偿，往后对雁月一定好好照顾。

翌日，大胡子在味美斋小楼设宴款待孙氏兄弟和雁月，警察署的孙股长作陪。至此，这场风波才算平息，当时，宪兵砸窑子这件事在一些人中间成了一件趣闻。

从此以后，老鸨对雁月再也不敢虐待，嫖客也不敢来闹事了。然而收入却日渐下降。除为了按数给老鸨交钱外，自己要有点积蓄，也只好破例接客。

一天，院里来了一位老实巴交的中年人，他指名找雁月。这人满脸憨厚，粗布衣裳，进门来肃立不语，吞吞吐吐地说：“我叫刘万海，是个剃头匠，本来不配来这个地方，可是听人说你是好人，我才来的，你同意吗？”雁月笑了，她说：“我是个妓女，有钱的大爷都可来。”他赶忙说：“我可不是有钱的大爷，我是特意看你的！”雁月见他是个老实人，不忍戏弄他，就拉他坐在床上问他身世。

刘万海是本县腰贡（今兴盛乡）人，自幼从师学理发，出徒后来五常做工，白天在城郊流动理发，晚间回城内王家小店

住宿。几年来，手中尚有点积蓄，听人说翠兰堂有位很正直的妓女，几次都望而怯步，这次终于壮着胆子走进青楼。两个同是天涯沦落人，便谈得很投缘。雁月好言劝他，这里不能常来，免得染上梅毒。这晚雁月主动留他住宿，并请他吃夜宵。以后，刘万海每隔三五天就来看雁月，但他不在这住宿，仅是促膝谈心。

似水流年，两人相识后，半年过去，雁月见他忠厚、淳朴、善良，便决心跟他从良。可是他手头仅有300多元钱，难以如愿。雁月说：“钱咱俩凑，我虽不如杜十娘那样富有，但多少也有点儿积蓄，去了赎身钱，也够咱俩安家用的……”他俩来到老鸨的屋里，雁月上前说：“这位刘爷要为我赎身。”老鸨笑着说：“从良是好事呀，你的赎身钱够吗？”刘万海掏出500元老头票放在桌上，并说：“我再给妈妈100元作喜事钱。”老鸨一听立刻沉下脸来：“500元就能赎身吗？”雁月说：“卖身契上明明写着500元，为什么不能赎呢？”老鸨冷笑说：“这些年来你吃喝穿戴都是我供养你，我那五百元钱本加息，息加利，恐怕不下1000元吧，看在你这几年对我孝顺的份上，1200元从良吧！”说完转身就走了。从此，赎身的事便成为泡影。

直到1946年，五常解放，人民政府将民愤极大的双铃堂掌班的老仇、素兰堂掌班的大素兰和妓女小玉处决，至此，五常县城的妓院完全解体。李雅芹和刘万海才组成家庭过上幸福生活。

（摘自《五常文史资料》第五辑）

妓女泪

程惠茵口述 晨星整理

我是宁安县沃粮河人。伪满时期，父亲吸大烟，母亲体弱多病，家有兄弟姊妹4个，日子过得挺苦，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17岁那年，父母为了减轻家庭生活重担，把我嫁给了牡丹江的一家姓周的。结婚时，我丈夫只有15岁，家里一切之事，全由公婆作主。我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还受公婆虐待，他们打骂我，经常不给饱饭吃。康德10年（1943年），我20岁，身板突然发育得丰满起来了，谁知这时公婆起了歹心，将我作价800元，卖给了牡丹江永春里窑子，从此就掉进了妓女生活的苦海。

伪满时期，牡丹江的妓馆不少，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国人开的，一部分是日本人和朝鲜人开的。中国人开的妓馆有四处：（1）吉安里（现在的石油化工局后院），各种“堂”、“楼”名称的妓馆60多家，妓女100余人。（2）永春里（现在的东方红照像馆后院，京剧院北侧）妓女达200余人。（3）安福里（现在的西长安街路南，先锋药店后院），妓女几十人。上面这三处妓馆是三等妓馆，妓女没有什么文化素养。（4）秦楼书馆（现在的紫云街路南，东二条路路东的一所楼），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二等妓馆，有妓女20人，都是年轻漂亮、有文化、能歌善舞的。当时在宁安、铁岭、兴隆、桦林、温春等地也有妓女。

日本人和朝鲜人经营的妓馆，集中在七星街、昌德街、园明街一带，妓女有200余人。日本窑子叫妓楼，还叫料理屋，艺

妓多为日本人。艺妓卖唱，陪客人喝酒；娼妓卖身。日本妓馆主要嫖客是日本人。

旧社会的妓女是下九流中的一流，不仅是窑子老鸨的摇钱树，也是衙门官吏剥削压榨的对象，受虐待、欺凌、剥削最深。我一进永春时，就受到了老鸨的皮鞭之苦。我刚一到，老鸨满脸堆笑，张罗给我做新衣服，买金银首饰，领我去烫发，把我打扮得花枝招展。紧接着，叫我接客。我没有答应，她立刻变了脸，连骂带打，硬是逼我服从。我还是不服，她就用皮鞭子抽，抽得我身上青一条紫一块的，把我头也撞出了血。同院的姐妹们看不过眼，都急忙上前拉开，我才没有被打死。一位姐姐偷偷对我说：“康德6年，永春里某某堂的女掌班，外号王剥皮，拷打妓女用的是铁门栓和好几股电线拧成的鞭子，往死里下手，几天就活活打死两名姐妹，其中一名是在怀孕中遭毒打，从楼梯摔下死的。唉，胳膊扭不过大腿，你就答应了吧！”在老板的威胁和劝说下，我想，我父母是庄稼人，没钱没势，谁也救不了我了，死逼无奈就下水啦。

嫖客到妓馆，鸨母叫姐妹们出来站队，各人报自己的花名，嫖客看中了哪个，就到哪个房里坐下，由妓女接待。接客分三种方式：一种叫开盘。嫖客来了，先摆上盛有瓜子、花生、糖果、香烟的盘子招待。嫖客让妓女唱黄色歌曲，说下流话调情，但不能性交。开盘一次一小时，到时间鸨母喊送客，嫖客付国币一块钱便走。第二种是拉铺，即白昼宣淫，一次国币两块。第三种是住局，即住宿。住宿有夜饭，四个菜二两酒，外加水饺或包子，饭钱由嫖客出。夜饭由饭馆跑堂用提盒送来，要给跑堂小费。嫖客住局，一宿要付10块钱国币。如果妓女是黄花姑娘，第一次接客，嫖客得拿出高于平常几倍的钱，这叫开苞。老鸨只顾挣钱，不顾妓女的死活，有时我们妓女来了月经，还要

我们照样拉客住宿，名叫守垫子。我们明的受嫖客蹂躏，暗中受老板和鸨母虐待，还要受军、警、宪、特的敲诈勒索以至肉体摧残，有泪只能往肚子里流。

妓馆老板为了营业顺利，必须找个靠山撑腰，叫叉杆。多数找的叉杆是宪兵、警察或特务。开妓院，如果没有叉杆，那妓院常常被流氓无赖给砸了，名叫砸窑子。几个暴徒，手持棍棒，见什么砸什么，窑馆里的桌椅、茶具、镜子、玻璃窗，统统被砸得粉碎。砸窑子的目的是打妓馆老板或大茶壶（妓院杂役），但有时砸红了眼，见人便打，有的小贩子也难免遭打。如果有了叉杆，碰到砸窑子时，马上有警察来制止，把暴徒带走拘留。没有叉杆那就白白挨砸啦。1941年以后，有些伪国兵在星期天伙同三五人，专门去砸受宪兵支持的妓馆，砸完就跑，警察管不着，宪兵一两个人也不敢管。当时我们欢迎伪国兵砸窑子，认为这是给妓女出气，所以妓女对国兵来妓馆拉铺都很客气。

旧社会当娼妓，没有不得性病的，甚至第一次接客性交之后，如果这个嫖客患有梅毒，马上就被传染。染上梅毒的人，皮肤苍白，形容枯槁，经过几个月，毒漫全身，各处溃烂，以至头发、鼻骨脱落。梅毒攻至头项，生一巨穴，称之为通天炮。得了梅毒如不治疗，往往不到一年，便要丧失生命。如果侥幸治疗痊愈，大多数不能生育，或生有子女，也是残缺不全，很难成活。所以，每个星期六，我们必须到市立医院检查身体。如发现性病，医官不给开健康证明，下周便停止营业。停业治病，挣不来钱，老板生气，轻则打骂，重则不给饭吃。所以，为了能营业挣钱，我们还得给医官打进步，给他送烟酒糖果之类的礼物，求他开个健康证明。得了性病，是可以治的，当时用“六〇六”、“九一四”等药物治花柳病很有效果，但窑子老板只

图省钱、赚钱，对妓女的病不放在心上，有的听其自然发展，因而死于性病，就成了娼妓固定的命运。

我听过书，看过戏，特别是“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戏剧对我影响很大。我知道自己久落风尘不是长久之计，必须选择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跟他从良。来妓馆的嫖客中有个小冯，是个剃头的，比我大六七岁，长相虽是一般，但心眼儿好。我们在来来往往中产生了爱情，他发誓非我不娶，我答应非他不嫁。可是要跳出火坑，需要拿出一笔钱来，一个以理发为生的工人，一个月能收入几个钱，每月只能来我这里几次。他来了，我有时不要钱，这叫倒贴。过了三年，我提出跟他从良，可他拿不出一千块钱来，只能当个露水夫妻（指嫖客住局）。

1945年8月14日，苏联红军解放了牡丹江，我们妓女也得到解放。后来，我和小冯结了婚，从此过上了自由幸福的生活。

（摘自《牡丹江文史资料》第四辑）

抚顺永安里——妓女院

姚云鹏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这凄婉、辛酸的诗句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中对沦落天涯的长安娼女不幸遭遇的真实写照。唐代娼女如此，昔日旧中国“欢乐园”妓院中的妓女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她们的生活充满着屈辱、辛酸和斑斑血泪。

抚顺色情行当的兴起，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1905年千金寨煤矿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后，他们在疯狂掠夺煤炭资源的同时，为了在矿工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消磨矿工的意志，便与贪婪的封建把头、警宪、特务相互勾结，在千金寨开设了众多的妓女院。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40年代初，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恶势力的统治下，千金寨的妓女生涯足足持续了30年。这30年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屈辱与血泪的历史。据有关材料记载，千金寨当时仅有几万人口，从事妓女生涯的就有1600多人。千金寨的东西平康里第一商场北门外，千金寨铁道南，都是妓女院云集的“繁华”区。如果从铁道南“艳春院”、“四十八间房”，往南市场走去，一直走到“西天边儿”，“半掩门儿”（暗娼）一家挨一家，数不胜数。

1924年至1928年，由于“露天掘开采计划纲要”的发表，居住于千金寨经营商业之日本人首先向小官屯（新站）搬迁。以南站为中心，把站前南北马路称中央通，中央通以东，一条通至五条通（即今东一路到东五路）为日本商业区，东六条通至东八条通（即今东六路至八路），为日本人的文化中心，中央通以西，多数为日本人的中小企业和住宅，仅有少数“高等华人”如康品卿、郑辅臣、张方良等汉奸把头居住。西三番町以西，西三条通至西十条通，满铁抚顺炭矿将此地带定为“游乐园”，而居于此地的中国人俗称为“欢乐园”。千金寨的妓女院便也迁往“欢乐园”。刚搬迁时，妓院的经营曾一度萧条。1931年前后，开始兴旺，而妓女云集的“欢乐园”中，色情业最繁盛的地区，是位于“欢乐园”北侧的永安里。据《满洲都市的新貌》（满日丛书第八辑）中记载，“永安里中，艺妓（陪酒歌舞不出卖肉体的日本艺妓）186人；卖淫妇（日本、朝鲜人妓女）152人；女给（日本陪酒侍女）85人。”这数字也许不够精

确，但也足以说明当时妓女行业的猖獗。当时整个永安里东西南北，前前后后几条街，布满了大小各等妓院。走进永安里南侧东面西开门儿，是日本人小山盐谷开设的四家一等妓院，即日天书馆、日东书馆、日满书馆、日荣书馆，由日本人当老板，委托中国人经营，当时称为“料理屋”。再往西走去，内圈三层，外圈二层，南侧两幢红楼，是永安里非常出名的南北红楼，是当时“欢乐园”的吉庆班王文林（绰号王聋子）等人各开设15家妓院。永安里西侧横街，有南北双宝班，由胥立诚开设。西侧胡同内外，有西双宝班，由胥立斋开设。永安里东北侧的南北穿堂院中有15家妓院，由马儒芳、牛庆田等人开设。此外还有名为“穷八家”（由八户贫穷人家姑娘充当妓女的妓院），其老板有马××（绰号马瞎子）、范子恒。还有“富八家”，老板是朱子余（朱子恒）、吴振翔等人。由穿堂院向北走，西三条通北侧，前后共有3个洋式小院儿，其中一家是日本妓院，另两家是朝鲜妓院。永安里中还有吉顺班、吉庆班、艳铃班、玉盛班等几十家各等妓院。每逢黄昏过后，华灯初上，永安里便灯红酒绿，琴弦高鸣，狂歌乱舞，淫荡笑声，通宵达旦。据《满洲都市新貌》（满日丛书第八辑）所载：“在中国人的永安里可使强烈肉感，沸腾燃烧般的性欲，得到发泄……”

在这各等各色妓院中，美貌女子争妍斗艳，容颜风骚。曾有年轻俊俏、红极一时的10名姑娘，夙有“十宝”之称，如云宝（王×敏）、富宝（刘×清）、红宝（×××）兰宝（×××）等。妓女的红与紫（妓女的等级），主要从年龄、容貌上区分。妓院中的妓女从十五六岁的妙龄少女，到三四十岁的半老徐娘都是按等论价。如“日”字等妓院：日天书馆、日东书馆、日满书馆的拾姑娘云宝，日荣书馆的赵海茹等妓女多是年轻貌美的，因此价钱最高，稍差一些的，有二等班子，三等班子穷

八家之类的妓院价钱则最便宜。可怜的妓女们，忍辱受屈，强颜作笑，每天被迫出卖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受尽百般凌辱，损害与摧残，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很多嫖客声称：“老爷有钱买你的肉，喜欢哪块割哪块。”掌柜的和鸨儿执掌生杀大权，更是凶狠残忍，妓女们接待稍有怠慢或服侍不周，便遭毒打，若惹恼了有身份的嫖客连妓院都给砸了，俗话称之为“砸窑子”。这样一来，鸨儿就更轻饶不了妓女们。

妓女中，有为艰难生计所迫沦为妓女的；有被恶势力胁迫而为之的；有被拐骗卖给妓院的，这些“自己孩子”没有任何行动自由；也有被押主强制押给妓院的，称之为“押年期”者；还有一种为自混的，从嫖客手中赚来了钱，和鸨儿对半平分。总之，绝大多数都是被旧社会的苦难所迫。

欢乐园中妓院行业猖獗，导致了性病的滋生、蔓延。无数的妇女同胞遭受苦难，无数嫖客及无辜家人，甚至几代人惨遭毒害。“花柳淋病”、“鱼口便毒”、“杨梅大疮”等等性病泛滥成灾。当时日伪抚顺市公署、抚顺炭矿病院，也曾专为妓女设立了“检疫官”，限令妓女在指定时间内去病院检查性病，发现有性病的妓女，勒令停业治疗。据《抚顺要览》所载：1931年“九·一八”前后，是抚顺妓女行业猖獗时期，中国妓女总数约3000余人，性病患者占5%，每天有200余人被强制治疗。另据《满洲年鉴》（1933年——昭和8年版）所载：“抚顺医院六百张病床中，传染病105张病床，性病24张病床。”足以说明性病泛滥的程度。当时病院专设有花柳科。花柳科医生则采用“九一四”、“六〇六”、“新胆巴尔散”等德国进口特效针剂。市内各个公私医院都设置“专治性病：‘六〇六、九一四’非常特效”的宣传招牌，全市各个公共厕所，几乎张贴满了“专治‘花柳淋病、鱼口便毒’形形色色的广告传单。“欢乐园”聚乐舞台京剧

院名丑角张春山先生，在他登台演唱《劝嫖》快板小段里说：“……不让你嫖，你偏要嫖，杨梅大疮长上了，一走道，一哎哟，东扎针，西吃药，祖传秘方尽毒药，蝎子蜈蚣好几百条，吃了药不见效，杨梅升天把鼻子烂掉。越怕人瞧，人家越瞧，越怕人笑，人家越笑……”性病传染外加遗传，延续几代人遭受其害，重者烂掉五官，轻者失去生育机能，性病危害之深，令人休目惊心。

性病的泛滥成灾，妓女院的被迫停业，给妓院老板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为减少或避免经济损失，妓院老板便打通关系，请料理组合（妓院联合会）出面，用美女、金钱等手段贿赂“检疫官”，保证大多数妓女照常营业。这样一来，大多数患有性病的妓女并没有得到治疗，因而性病也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当年的永安里已为今日的轻工市场所替代，永安里这个名词已成为抚顺市历史地名之一，并将在煤城人民的记忆中逐渐消逝。

附录一：

抚顺欢乐园永安里共有中国人开设的中国妓院50家，详录如下

妓院名称	掌班姓名	开设地址
群仙书馆	李光灿	永安里
福乐班	朱李氏	永安里
第8号	王文林	永安里
同乐书馆	吴振祥	永安里
四玉班	赵福卿	永安里
玉红班	朱俊山	永安里
兰亭班	王振铎	永安里

玉宝班
群英书馆
怡红院
吉顺班
玉盛班
三凤班
三红班
雅卿班
金铃班
会仙阁
鑫发班
第5号
宝升班
春荣班
宝华班
新发班
玉卿班
双合班
鸿升书馆
鑫华班
桃园书馆
艳乐班
喜铃班
第7号
月卿班
玉乐班
连升班
第9号

杜玉芝
张子良
王汉卿
许树林
郭祥霖
金凤鸣
任艺林
杜坤山
鲁茂林
刘全盛
刘佐鑫
张星恒
许贵春
田秀亭
陈仁伍
张瑞国
李辑五
张德元
赵连茹
于顶远
杨苏氏
魏殿存
张庆田
杜向阳
曲月卿
马儒芳
焦文德
周国良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永安里

四喜班	黄宝金	永安里
第2号	王刘氏	永安里
第4号	周德荣	永安里
金红书馆	马玉甫	永安里
桂英班	高凤岐	永安里
美乐书馆	张美璧	永安里
凤喜班	王凤岐	永安里
第3号	李国宝	永安里
喜红宝	王高氏	永安里
共乐班	孟子云	永安里
金仙班	徐王氏	永安里
双红书馆	王寿山	永安里
美玉班	周鼎臣	永安里
第1号	刘景泉	永安里

位于永安里北侧（西三条通今西三路）新杨町（今新杨街），尚有五家朝鲜妓院（接朝鲜嫖客），详录如下：

妓院名称	掌班姓名	开设地址
明月	金天福	新杨町36号
文之家	福島良一	新杨町29号
日新亭	山口夕二	新杨町30号
葛之家	渡边光二	新杨町38号
一力	柴用ヤス	新杨町31号

（掌班有朝鲜族，也有入了日本籍的朝鲜人。）

在新杨町内有日本人开设的日本妓院（接待日本嫖客，拒接中国人，对日语精通的“满人”冒充日本人者例外）计8家：

妓院名称	掌班姓名	开设地址
锦 水	渡边りき	新杨町40号
青 柳	楠井三サ才	新杨町32号
四海波	伊藤藤太郎	新杨町32号
玉 川	九冈文治郎	新杨町34号
滨美屋	板本吉三郎	新杨町41号
松 龙	蛭古工斗	新杨町35号
富喜楼	森田千ヨ	新杨町26号
扇 屋	河端山太郎	新杨町37号

在欢乐园永安里内，还有日本人开设的中国妓院14家。多为一等妓院，接待的嫖客，亦多为“高等华人”（即日伪官吏、豪绅之类）。亦有实属中国开设而利用日本当后台，以支撑门面的，如胥立斋、胥立诚开设之“双宝书馆”三家即是。

妓院名称	掌班姓名	开设地址
日满书馆	小山英太郎	永安里
双宝书馆	古贺初一	永安里
日东书馆	佐佐木九右卫门	永安里
新王园	渡边政九郎	永安里
日天书馆	中村信太郎	永安里
升泉书馆	中村信太郎	永安里
日荣书馆	铃木正吉	永安里
乐满书馆	松岗达夫	永安里
游仙阁	材才吾	永安里
日满书馆	盐谷德三	永安里
田光书馆	泷善二	永安里
红玉班	官原诚治	永安里
笑福班	深川千力	永安里

满仙班

椎场又斗

永安里

（资料来源：《抚顺工商名录》康德5年12月版。）

那时被拐骗卖与妓院之妇女同胞，所受之非人摧残，令人发指，跳出火坑潜逃者有之，从良嫁人者少数，不堪虐待而自杀者更为有之。有关情况的报道如下：

《妓女自杀死因不明》

“〔抚顺〕站前永安里鑫华班搭住妓女（年岁不详）于昨13日夜，忽吞服消毒水及鸦片等自杀……除报告派出所，并延医生灌救，气息奄奄，生命甚为危险……闻说原因……有说因受虐待致死者……”（《盛京时报》康德2年7月17日）

《碧落黄泉无限恨狂风摧残落潮花》

金乐班妓女死的不明

“〔抚顺〕站前永安里金乐班搭住妓女筱顺，芳龄二八……该校书（妓女）以遇人不熟，坠落泥濘，乃每日郁郁寡欢，若有所思者……于月之九日早七时，该班伙友因打水开门，竟发现伊仰毙床上，状极可怜（因未留宿客，遂单卧床上）……”

《盛京时报》康德2年6月11日（十一）版

附录之一：

《妓院忙碌》

“……新站永安里妓馆，因春节为各界休息日……作各种消遣，而涉足寻花问柳者，亦不在少数，故各妓女等皆华装丽服，浓抹脂粉……迎张送李，颇形忙碌，大有应接不暇之慨……”

《盛京时报》康德3年2月7日（二十）版

附录之二（译稿）：

《煤都之夜的世界》

煤都之夜犹如大海，它所占据的一角，有灯红酒绿的一条小巷（永安里），接待顾客的妇女人群总数：

艺妓（陪酒歌舞不出卖肉体的日本艺妓）186人

卖淫妇52人（日本、朝鲜人妓女）

女 给85人（日本陪酒侍女）

俳 优500人（中国妓院的娼妓）

上列所说数字显然不够精确，而出于写作的方便。抚顺永安里的广大妓女常说：“我想很快嫁给你哟”等等口头话像是真诚，而很少纯真感情。这里是出卖人肉的市场，堕落的深渊。妓女们从那大黑眼睛里流着眼泪，甜言蜜语拉扯着喝醉了酒的嫖客说：“别忘了给钱，给一角钱就行啊！”说这种话的妓女，都是失去风韵的女人。

在中国人的永安里，可使强烈肉感，沸腾燃烧般的性欲，得到发泄……

原载《满日丛书第八辑》，括号内的文字为译者所加。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

恶霸龟头任理堂残害妓女的罪行

崔柏光 于永俊 整理

娼窑又名妓馆或妓院，是旧社会达官贵客荡子游民玩弄妇女、寻欢作乐、发泄兽欲的地方。经营妓馆的业主俗名叫龟头。

管教妓女的妇女，多半是凶悍的老妓女，人称为老鸨子。管理妓馆业的组织叫花界会。妓女大部分是穷苦出身的良家女子，因生活困难被卖到这里的。也有被奸人拐骗来的，一旦被卖身妓馆，就像沉入苦海，很难有出头之日。妓馆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残害妇女的地方，是旧社会剥削制度的产物。

妓馆分头等、二等、三等、四等，头二等属高级妓馆，供官绅富商上层人物寻花问柳游乐的场所。

妓馆里的陈规陋习甚多。嫖客初入妓馆，因无相熟之妓女，老鸨子便打帘子高呼：“见客”！这时，妓女排队，鱼贯而入，依次和嫖客见面，嫣然一笑，返身而走，老鸨子则一一喊名，“红宝、绿珠、碧玉等。然后问嫖客相中哪个姑娘，就领客到其寝室，喝茶、嗑瓜子、说说笑笑，摩摩挲挲，肆意狎侮，这叫做“开盘子”、或“打茶围”。有的高官富贾设宴招待贵客，常常把著名妓女叫到公馆捧壶陪酒，猜拳行令，或吟诗唱曲，这叫做“出条子”，必须由老鸨子陪同，以防止妓女逃跑。至于三四等妓馆的娼规则简单一些，妓女搽胭抹粉，依门卖笑，勾引过往行人，嫖客进屋交钱就可上床睡觉，名曰“拉铺”。总之，不论几等妓馆，其残害妇女，危害社会的罪恶则是相同的。

“崔知府，白知县，任里堂，阎罗殿”。这是旧社会四平市流传的一首反映妓馆业主罪行的民谣。“崔”名叫崔延令，是吉升院的龟头。“白”的名字叫白宝珍，是悦乐堂的龟头。“任”名任里堂，是宝顺书院、顺玉班的龟头，都经常严刑拷打妓女。他们勾结官府，欺压百姓，而任里堂更属天字第一号。据过去花界会会长王义和熟悉四平花界旧事的老年人说，任里堂原是河北省新安县店头村的船夫。无赖成性，惹出事来逃到东北，在铁路脚行里劳动。后来在开原逛妓馆，领出一名妓女，偕至四平，在道里北四马路开土窑子。逐渐发展，增加妓女，迁到道

里电影院路北过去的平康里，开设“宝顺书馆”、“顺玉班”等，最后扩充达十余处。妓女多的一处就达30多人。平时雇用的管事人就十有十几个。任里堂所经营的妓馆都是头、二等的。室内陈设俨若富人的客厅，座钟、挂表、名人字画，应有尽有。他所收养的妓女都有几分姿色，强迫她们学习音乐歌曲和简单的诗词，并雇用师傅教唱戏剧。因此在同业中生意兴隆，妓馆门前车水马龙，嫖客络绎不绝。任里堂手眼通天，摧残、蹂躏和奸污妇女无所不用其极。妓女一到任的妓馆，犹如坠入万丈深渊，实难摆脱。原因有二：即淫威镇压和债台重压。妇女刚进入妓馆时，业主假献殷勤，吃好的穿好的，过一段时间就想威胁与之同寝破身。从者即令其接客。能用各种手段下客人钱的红者，一切优待；对于不愿作妓女的或有热客而厌弃其他嫖客的，先劝后施威力逼迫，吊打非刑，如脱光衣服用鞭子打，夹棍子或针刺阴户，用烧热的烙铁烫身，几至体无完肤。酷刑之后，推进黑屋里，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准出去，像蹲监狱一样。曾有一妓女，坚持不从，竟被任里堂在阴处横砍一刀。妓女因不受凌辱，任就给以种种酷刑严惩，其手段恶毒到了极点，他的残暴是无人不怕的。妓女们因不堪其苦而服毒自杀者大有人在。妓女金红，曾红极一时，就是被任活活打死了。1935年5月，有一名叫红宝的，生前写信给四平市道里五马路道德会，并附伪币80元，声称她是受刑不过，服药身死的，她恳求道德会代为登报申冤。

任里堂不仅对妓女进行人身迫害，而且在经济上残酷地压榨剥削。妓女入妓馆时使押帐向他借钱，如果使用500元押身钱，每月就得打20到30元利钱，使妓女终生难以赎身，不能逃出苦海。嫖客愿替妓女赎身“从良”，在任里堂身上是行不通的。

伪满时期四平市道东南大庙开光，唱野台子戏。任的妓馆

中有两个青年妓女到场唱戏，唱红了，被一乡下秧子（即财主子弟）看中了，变成为两个妓女相好的热客，并提出愿为两人赎身从良。任初认为乡下秧子没有大钱，开口索价2千元，秧子慨然应允；任便改索3千元，秧子也认可；任又升到5千元，秧子咬咬牙也同意；最后任说非6千元不可，终于把秧子卡住了，从良之美梦化为泡影，结果，两个青年妓女双双自杀。另有伪满四平消防队朱国藩，欲娶任处某妓女为妻，因任百般阻挠，于7月7日男女两人穿着整齐的服装服毒药自杀。这样的悲剧层出不穷。任里堂为什么坚持不放妓女从良，成全她们的美满姻缘呢？原因很简单：凡是被赎身的妓女，都是年轻美貌的红姑娘，任龟头嗜财如命，怎肯把摇钱树放走了呢！所以，这里的妓女不到人老色衰的时候，是很难逃出他的牢笼的。有个叫大风秋的妓女，要跟商人赵希福从良，就是走不出来。风秋原是掌班的妓女，比一般的熟悉世故，就用甩客的办法来反抗任里堂。任迫不得已才答应准其从良，但又索取卖身费1500元，以为这些钱赵某拿不出来。风秋终于把钱凑足了。在出院时，钱也交足了，衣裳也扒光了，可是任竟狠狠地打了风秋几个耳光子，风秋向他质问，原来耳朵上还戴两个小耳坠子，逼着风秋摘下来交给他，才准离去。

任里堂依势压人，无法无天。“九·一八”事变前，奉军骑兵团长于桐轩夜间来到四平蔽任的妓馆门，引起冲突，任喝令虾兵蟹将把于团长痛打一顿并唆使日警把于抓去扣押一日才放出。又有某营长的妻子，由沈阳搭去吉林的火车，因初次出门，不辨方向，从梅河口换车被奸人拐来四平，卖与任的妓馆为娼。某营长访有确讯，来到四平警察署过公文去要人，此人也如石沉大海，音影无迹。当时凡经拐骗而来的妇女，任里堂都收留，一旦落入他手，便永远不得脱身。

任里堂之所以敢于草菅人命，独霸一方，其基本原因就是财大通天。任依靠妓女卖淫和放印子钱发财致富。他除扩大妓馆业外又兼营其他营业。在四平开办有名的四平大旅社、金华池澡堂，置市房和农田无数。在北京有大旅馆，在天津有茶庄和大米庄。又被选为四平市花界会会长，在旧社会“有钱王八大三辈”。任里堂在“九·一八”事变前，投靠日本，是日本衙门里的红人。伪满时期，任又结交了军、警、宪、特等权贵，成为四平市的“风云人物”。日本大衙门他说上话，大衙门里的日本人多数来自旅大，他们为了熟悉四平地方情况到四平后先找任里堂，任的市房多，他特为日本巡捕预备个大院（在道里五马路），巡捕来了他供应吃、喝、住，因此任所作都是祸国殃民事，纯系汉奸，是民族的败类。

“多行不义必自毙”。任在晚年去天津充客人逛妓馆，妓女问他四平有个任里堂认识不？任说不认识，反问妓女打听任干什么？那个妓女说：“我有个妹妹就是死在任里堂手里的”，说着拿出一张任里堂和死去妓女的合影，咬牙切齿地说：“有朝一日，我必给我的妹妹报仇，决不轻饶这个万恶的龟头。”任看了照片，遭到妓女的谩骂，心慌意乱，起身便走，下楼时竟失脚滚了楼，回家便一命呜呼了。也算他恶贯满盈，罪有应得。但他免遭人民的审判，算便宜了他。

（摘自《四平文史资料》第二辑）

旧桦川县的娼妓

王志声

旧桦川县妓院概况

旧桦川县属吉林省。1910年，吉林省在佳木斯镇设治局（相当县政府），1912年迁至悦来镇，改设县公署。到1925年，在保留悦来镇的县公署的同时，又在佳木斯镇设立行署，县长则两地办公，各居其半。因此，当时的桦川县的妓女概况是以佳木斯镇为主，兼有悦来镇、太平镇的妓院。

据桦川县保存的旧政权档案民国时期重要卷第八百五十八号卷记载，民国19年（1930年）11月，有87家“乐户”（妓院）联名请求豁免补片税捐。可见当时的妓院已发展到87家以上，而且肯定还不包括暗娼、野妓和“花店”。这些妓院的名号一律落个“堂”字，什么“玉卿堂”、“桂兰堂”、“桂香堂”等等，恕不赘叙。由于名号流俗，相重者只好借用别字，同是“金玲堂”，后取的名号便叫“金令堂”；同是“凤仪堂”，后取的名号便叫“凤义堂”。至于妓女人数，前卷有一记载，内称：“前查佳镇计妓女142名……”可以认定，仅是佳木斯一镇，便有妓女142名。

伪满时期，佳木斯由镇改市，成为伪三江省会，人口骤增，妓院有增无减，从业妓女人数更是成倍增加。小的妓院由二三人增至五六人，大的妓院由五六人增到十余人。

这些妓院比较集中地设在北市场，而在西菜市、南市场、永安街等地，除中国妓院而外还杂有朝鲜“料理”（妓院）、日本

“料理”。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佳木斯市的妓院已达到一百余处，妓女人数增至500人左右。

妓院也分等级。根据妓女的容貌、年龄和妓院的卫生条件、设备条件，分为一、二、三等。根据不同的等级，妓院的各项营业（“出盘子”、“住局”、“拉铺”、“出条子”）分等论价。富商巨贾、汉奸特务、高级职员，多去一、二等妓院，小商人、小市民只能逛逛三等的。

与妓院并存的还有“花店”。这个“花”字，是取“烟花柳巷”之义。民国20年（1931年），在佳木斯镇40家旅店当中，就有6家是“花店”，即“一顺”、“同兴”、“六成”、“六增”、“鸿兴”、“福合”。这是公开的暗娼馆，招揽姿色不佳、手头钱少或不愿抛头露面的野妓、嫖客前来宿奸。

妓女类型及沦落原因

这里的妓女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自由身”、“半自由身”、“不自由身”。她们都是被迫为娼，而所处的条件和沦落的原因又有一些差异。

“自由身”，是所谓“自愿”为娼，并与“掌班”的老鸨订有“借地生财”的合同的妓女，这些人在妓院接客，遵守妓院规定，收取嫖客的费用，按合同规定的比例与妓院分红。她们不受掌班的多方拘管，并在合同期满时不必赎身便可择偶“从良”（嫁人），或者另选妓院去“借地生财”。这些妓女，大都是“混过事”（当过妓女）的，是在“从良”或赎身洗手之后，由于吸毒、死了丈夫、好逸恶劳而又不甘于清苦生活、不能自食其力等原因，才到妓院来重操旧业。

“半自由身”，是高利贷的抵押品。这些人，多因天灾人祸，父母或丈夫吸毒、好赌，家庭破产，借贷无门，走投无路，才

将她们押在妓院，由妓院借给高利贷。押人借贷的条件相当苛刻，被押者必须年轻；容貌差的，可将为娼收入抵作贷款的大部利息，所余部分利息还要另想其它办法偿还；容貌一般的，可将为娼收入全部扣在妓院，以娼抵息，不再另交，只要到期还本便可脱离苦海；容貌俊俏的，可将为娼收入的十分之八九抵作贷款利息，剩下十分之一二交给主家或逐步还本。抵押的期限和条件，要由妓院掌班与主家商定，被押的妓女无权干预。如果超期不能还本，妓院还要加罚利息，越积越重，只好终生为娼。有的被押的妓女，自感与父母、丈夫恩断义绝，出外没脸见人，或者自身习惯于那种生活，甚或吸毒成瘾，也就不再离开妓院，终身沦落。

“不自由身”，是被人卖给妓院的。这些人多系良家女子，有的是被人拐卖，有的是被人抵债，也有的是被恶霸霸占、被流氓玩弄之后又被卖入娼门。在这些妓女当中，幼女和少女居多，其余也都是青年女子，一入娼门便为掌班所有，生杀予夺全凭掌班的心意。

妓院威逼少女接客

被卖入妓院的幼女，自幼到老要经过4个阶段，即：“雏儿”阶段，“青信”阶段，“红信”阶段，人老珠黄阶段。被逼接客，是由“青信”到“红信”的转折点。

八九岁卖入娼门的幼女，首先要学着侍候掌班的老鸨，端茶送水、倒尿罐，侍候老鸨抽大烟。再大一点，还要给老鸨和“红姑娘”洗衬衣。这叫“雏儿”阶段。

长到12岁，就要“出盘子”。所谓“出盘子”，是侍候嫖客喝茶、聊天、寻开心。尚未成人的小女孩，必须任凭嫖客接吻、揉捏、摸摸索索。由于天天接触男性，这些小女孩个个早熟。这

是“青信”阶段。

当少女达到早熟的时候，掌班的便要寻个肯出大钱的嫖客给她“破身”。这是一道关口，妓院威逼少女接客，就是指的这件事。少女“破身”这一次便可以给掌班的挣一大笔钱，而后成了“红姑娘”，又可以连续挣钱，变成“摇钱树”。因此，掌班的便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进行威逼。有的少女在掌班的软硬兼施的威逼下含恨接客；有的耳濡目染，习以为常，逆来顺受；有的宁死不从，竟被捆绑起来或使用麻醉药物，施行强奸；有的不甘屈辱，而又无法逃脱，只好自杀。活下来的，便进入“红信”阶段。

女子总是青春易逝，况且在妓院遭受蹂躏的女子，到三十几岁便已进入人老珠黄阶段。这时候，能够廉价赎身，弃娼“从良”的，无论如何也算最好的下场。有的身患梅毒或吸毒成瘾，降低身价继续为娼，到头来不是死在娼院，便是流落街头，无人理睬，下场极为悲惨。

掌班的种种虐待

一切良家女子出卖肉体之初，无不施以打骂。妓女一日不从，掌班的一日虐待，鞭打锥刺，弄得遍体鳞伤，还要关禁闭、饿肚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实在熬不过去，只好依从老鸨。

妓女依从之后，还要接受老鸨的严格训练。训练的内容，从故作媚态勾留嫖客，百依百顺取悦嫖客，一直训练到淫秽技巧，要以能够拉到“回头客”为合格。训练时，遇有接受不快，演习不熟的，老鸨开口即骂，举手就打，连拍带拧，动不动还要抽鞭子。

妓院把一切嫖客都叫作“财神爷”。训练妓女，就是要拉住“财神爷”，不叫嫖客轻易走掉。哪个妓女如果放走嫖客，甚或

气走嫖客，那就必定要挨打受罚。相反，哪个妓女如果看中了某一嫖客，流露出真实感情，老鸨怕她私奔或过早“从良”，也要打骂处罚。这样，把妓女弄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能用虚情假意在嫖客面前演戏。不如此，便得在长年累月的打骂处罚的夹缝里过日子。

当然，掌班对妓女也使用一点笼络手段。接客多，挣钱多的妓女，不但少受折磨，而且可以得到少许的衣料和首饰。然而，这还是促使妓女多接客、为老鸨多挣钱的手段。而无休止的出卖肉体，这就是对妓女的严重摧残。有的妓院还定有类似奖惩条例的规矩：连续拉客满25天以上者，酌情奖励；中间歇一天者，扣减两天接客日数；连续接客不满15天者，酌情处罚。

最不人道的是不准妓女生孩子。那时还没有绝育手术，老鸨只能弄些含有毒性的汤药、药丸给妓女强行服用，或者弄点水银、麝香浸泡一根细绳给妓女扎在腰上。有的妓女用药无效，真的怀孕，便要强行堕胎，造成致命的创伤，甚至人身死亡。

妓女经期接客、带病接客

按妓院的规矩，妓女在行经期，只许在经血正旺的日子休息一天，其余时间要照常接客。而且，休息那天，也只是不接“住局”（陪宿）的嫖客，“出盘子”仍要照常。由于行经期接客，往往造成各种妇女病，出现腹痛、发烧等等，久治不愈，有的妓女还因此造成月经突停，甚至闭经。

带病接客更为残酷。妓女生病，各种慢性疾病自然不在话下，即便是重感冒发高烧，也要强打精神应酬嫖客。这对妓女来说，忍痛逢迎，“笑在脸上，哭在心里”，甚至要在昏迷状态中听任嫖客摆布，已是十分残酷。而加倍残酷的则是身带各种性病，还要坚持接客。

由于妓女频繁接客，差不多夜夜更换新嫖客，很容易染上梅毒、下疳、淋病等等。民国和伪满时期的统治者也指定花柳科医生按月为妓女进行检查，限定停业治疗。但那时的这类医生，一有“后台”，二要赚钱，总是不肯认真用药。医生拖得时间越长，自己赚钱越多，妓院损失越大。这样，老鸨就不得不忍痛花钱，向指定医生行贿，买得一张“准予营业”的许可证。医德较好的医生，还能认真用药，使之达到基本治愈；不讲医德的，推出门去了事，性病仍留在妓女身上。妓女带着性病接客，要比其它疾病加倍痛苦，而且绝对不能让嫖客有一丝一毫的觉察。有时有的嫖客有所怀疑，妓女便要装出格外的热情来哄骗过去。否则，一经声张，这个妓女就会成为无人问津的“臭货”。旧社会性病流行，妓院是最大的传染源。

妓女带病接客，总是精神不支，便要寻求毒品来调节精神，减轻痛苦。老鸨为了赚钱也不惜些许破费，给点小小的施舍；特别是对那些能挣大钱的“红姑娘”，还要主动给点大烟泡、大烟灰什么的。一来二去，日久成癖，不少妓女染上了吸食毒品的恶癖，抽大烟，扎吗啡，永无出头之日，这是妓女带病接客的“后遗症”。

妓院对妓女压榨勒索

妓院对妓女除了依照合同规定榨取卖淫所得之外，还有许多辅助办法，把妓女从嫖客手中哄到的一点“贴己钱”勒索出来。这套辅助办法，主要有“讲情钱”、“赔偿钱”、“孝敬钱”、“小红包”、“代管钱”。

旧社会有些久闯江湖的老嫖客（俗称“窑皮”），对妓女百般挑剔，随便找个借口，便要妓院退钱，故意拂袖而去。有些妓女受不了嫖客的凌辱，一时应酬不到，也给嫖客提供退钱的

借口。这时候，老鸨便要指责妓女赶走了“财神爷”，对妓女严加处罚。每当此时，“大茶壶”和有头有脸的“红姑娘”往往会出面“讲情”，使之免遭毒打或重罚。老鸨装作“给面子”，在把妓女臭骂一顿之后，说个“先记一顿打”，事情才算告一段落，但还并未了结。要想真正了结，记打的妓女必须给“大茶壶”和“红姑娘”“进贡”，然后转手送到老鸨手里。这个“进贡”的钱财、物品，就叫“讲情钱”。

有些特务、流氓，权势大于妓院依靠的帮会势力或其它后台的，一不如意，还会前来寻衅闹事（俗称“砸窑子”）。遇到这种事情，轻则砸烂家俱、器皿，打骂妓女，重则打到老鸨和“大茶壶”头上。这时候，老鸨斗不过嫖客，便把一肚子火气发泄在妓女身上，打骂之外，还要妓女赔偿损失，这就是“赔偿钱”。

老鸨过生日、认干亲、装病、逢年过节，妓女都要拿“贴己钱”“孝敬”老鸨。有些妓院干脆形成定例，一月两次，每逢初一、十五，就要妓女给老鸨送钱，这叫“孝敬钱”。

“大茶壶”表面上是侍候人的，其实则是妓女的顶头上司。他们直接充作老鸨的耳目，时时替老鸨监视妓女，在老鸨面前为妓女说好说坏，会影响以至决定妓女的处境和命运。有些“大茶壶”依仗老鸨撑腰，其权威更加炙手可热。为此，妓女都要按月给“大茶壶”送钱，以求得他们的欢心和庇护，这叫“小红包”。

妓女的“贴己钱”，不论是现金、衣料、首饰，都是为自己准备后路的私蓄，总是想方设法不被老鸨发现。而老鸨，则要使用诈问、盘查、搜寻等手段，尽力把它挖掘出来。一经发现，老鸨便要“代为保管”，东西随意取用，现金则转手放高利贷，由老鸨取利，这就是“代管钱”。

民国时期，桦川县的官府在社会舆论推动下，曾经设置过“济良所”，专为冒死跳出“火坑”、逃出“苦海”的妓女提供庇护和临时生活保障。官府明令规定，凡能逃进“济良所”的妓女，原欠妓院的身价和债务，一律作废；有人自愿领去为妻的，只要交出铺保、交齐妓女在所期间的临时生活费，便可领人。桦川县档案局保存的旧政权案卷第八百五十五卷记载：经县长唐纯礼亲批，于民国19年（1930年）11月1日，在悦来镇及佳木斯镇设立“济良所”各一处。然而，投奔这个庇护所而后“从良”的妓女，案卷记载的只有一例。第二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就连这样可怜的“济良所”也不复存在。

（摘自《佳木斯文史资料》第五辑）

赌 场

哈尔滨太平桥赌场的官方背景

王贤沛

1939年以后，日本殖民当局在伪满各主要城市和工矿区，陆续设立了赌博场。伪满洲国政府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推说是地方日本宪兵队干的，实际人们都知道这是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机关共同同意许可设立的，而且它们对赌场还加以特别保护。

伪政府何以聋作哑？因为赌场的设立，公开地说，是违反“治安法则”，是一般人反对的事情，因此上边装作不知道，下边随便乱搞，也可以推卸责任。但日本殖民当局打算在某一地

区设立赌场时，往往走走形式，征询一下当地汉奸官吏的意见，以免这些汉奸伪官吏乱说乱道，影响他们的计划。

我在1940年秋当了伪哈尔滨警察厅长。这时哈尔滨太平桥赌场已经正式开业了。

我问伪哈尔滨警察厅副厅长园田（日本人），为什么要开设赌场？

园田说：“厅长可以问问省长，是省长、市长、前任警察厅长同意而设立的。”

于是，我去问伪滨江省长于镜涛：“赌场是怎么个经过设立的？园田副厅长说你知道。”

于镜涛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也知道这个事不好。在你来以前，有一天，省警务厅长秋吉找我和赵市长、白厅长三个人。秋吉对我们说，日本宪兵队要在太平桥设立赌场，让他征询一下我们三位的意见。日本宪兵队谁惹得起，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敢说不可行。过后不几天太平桥赌场就开业了。”

有一天园田副厅长问我：“厅长对于赌场的问题，问过省长没有？”

我说：“问过了。”

园田说：“厅长要注意，太平桥赌场虽然是在警察厅管辖范围内，但省警务厅长有命令太平桥赌场的那个区域，由省警务厅直接负责，我们警察厅不能有取缔干涉的活动，一句话，那个区域暂时不归我们管。不过厅长去看看是可以的。”

我曾到太平桥赌场去了一次，太平桥赌场的建筑是临时性质，多半是木料建筑的，四面都是房屋，中间是院子，西面有一个大门道，在大门两旁有各种商业摊亭。在赌场内部开设有饭馆、茶馆、鸦片零卖、理发等铺子，还有女招待。在大门道右旁有金钱兑换处，因为赌博的人不用现金，必须兑换替现

金的牌子。里面设30多种赌博，有麻将、扑克、牌九、押宝、转盘、打球等等。赌博的人，有汉、朝鲜、日、俄等国籍的人。据说，每天约有两千到三五千人。

伪哈尔滨市，自从有了太平桥赌场以后，因赌博而倾家荡产的、为匪为盗的、自杀的，差不多每天都有。

因为我是从伪国务院总务厅参事官调转出去的，我没听说伪满政府公布实施过关于开设赌场的政策法令。因此我曾到伪中央去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许多政界要人都推说不知道。

我问伪警务司长谷口明三，他说他知道一点不大详细。

我说：“赌场带来的影响很不好，‘治安’也有问题，地方士绅也有意见。”

他说：“我调查了解一下。”

我问伪治安部次长涩谷，他说他知道。

我说赌场对于地方“治安”带来坏的结果，每天都有盗匪、死人的事件。

他说：“我没有听说有这样的情况，若是这样的话，那可太不好啦。”

我问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他说他不知道，他告诉他的秘书官松本益雄，“你打听打听这是怎么回事？”

我回到哈尔滨以后，园田副厅长问我，“厅长到‘新京’去，说过赌场的问题么？”

我说：“我说过这个问题。”

园田说：“特务机关长很生气，他说厅长来了几天，什么也不了解，到中央去乱说一气，太可恨了。”

我说：“我去见特务机关长去。”

园田说：“我给厅长先联络一下。”

我说：“好”。

园田走了约有十分钟的时间，回来告诉我说：“特务机关长没有时间，省警务厅长叫你去。”

这时伪省警务厅长秋吉威郎把我叫去，并对我说：“你到中央去说了很多关于赌场的问题，特务机关、宪兵队对你有意见。你才来，还不了解全部的情况，哈尔滨人称小上海，各国侨民都有，有国际都市之称，假借赌场吸引坏人，进行侦察活动，是很好的办法。既然你有意见，再有一个多月就到期了，到期后就停止，不再继续，你也不要再去中央去说了。你知道，赌场每月给保安局50元钱，也给宪兵队送一些。”

我表示不理解：“保安局是什么机关，为什么赌场给50元钱？”

秋吉说：“你不知道就算了。”

后来，我打听保安局是怎样一个机关，没有人知道。有人只是说秋吉威郎是日本有名的特务专家，他在伪警察组织机构以外，组织了一个保安局，是一个秘密的机关，可能是作特务间谍活动。我从秋吉所说的假借赌场吸引坏人，进行侦察活动的话推断，保安局是一个秘密的特务间谍机关。

从我和秋吉威郎见面谈话以后，我曾见过日本宪兵队长加藤，我提起了赌场问题。

加藤说：“那不算一回事，告诉他们停止了就完啦。”

太平桥赌场的经理人，是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嘱托张慕贤和李九鹏两个人开的。虽然赌场范围不归伪警察厅管辖，但我还是把张慕贤叫到伪警察厅，申斥了他一顿。他说：“宪兵队叫我干，我不能不干。”

到了当年的11月，太平桥赌场就停止了。

哈尔滨的赛马场

刘绍义 口述

程重聪 张勳 整理

“九·一八”事变前，我家就住在哈尔滨市南郊任家屯，离当时的赛马场很近。由于家庭生活贫困，在我14岁那年（1938年）就到赛马场当工友了，一直到解放，赛马场停办后才离开。

当时的赛马场，俗称“跑马圈”。它的位置就在现动力区绝缘街109号后面的一大片土地上，包括现在的跳伞塔和电工学院一带，占地面积约有45万平方米。单是赛马跑道（椭圆型）一圈就是两千米长。整个赛马场四周栏有铁蒺藜，正门在场地的西侧中间，正对着现在的和平路，即烈士陵园门前靠东一点。走进正门，南侧是一栋二层楼，东西长约30米，南北宽约15米。有二十多个房间，是办公楼。里面有售票房、办公室、仓库。北侧是预备场地，有骑手休息室和马厩，再向前走就是看台了。看台在场地西侧中段，面向赛马跑道，背向大门，是一座高约10米砖石水泥结构的阶梯式建筑，共50余阶，全长约100米，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看台很坚固，现在还基本保持原貌，只是底层已改建成绝缘材料厂一个下属厂的生产车间了。当年的办公楼，也改作职工家属住宅了。由预备场地到看台，有一条为骑手入场而准备的拱形地下通道，宽高各两米。地下通道的北侧，有一个暗门，经常锁着，据说通往“忠灵塔”。听当时的老人讲，这个赛马场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俄国人创建的，第二年就开始进行赛马活动了。每年春、夏、秋3季，每逢

周六、周日都开赛（雨天例外）。当时名称叫“北满赛马协会”。1922年日本人才加入该会，改成了“股份公司哈尔滨赛马场”。伪满时期又先后称“哈尔滨赛马株式会社”和“国立哈尔滨赛马场”。几经修整扩建范围越来越大，当我进场的时候，场外已经有一些食杂店和饭馆了。每当赛马日人山人海，相当热闹。1940年以后，又增设了“皇家”赛马活动，很是热闹。

我进赛马场，是由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刘祥介绍的，他当时是赛马场的事务员（现仍健在，已经九十来岁了，家住王岗三姓屯）。场长叫山本（全名不详），是日本北海道人，个子很小，约40岁左右，一撮小黑胡，说话声音很大，脾气暴躁，动不动就骂人。当时办公室设有总务、场务、医务3个部门，各有主任负责。会计、统计、人事都配有专人。固定职工共约20人，开赛时的售票员、摇彩员、场地清扫员都是临时雇佣的。赛马场不设专职骑手、马匹。参赛的骑手们，有的是马主（养赛马的人）雇的，有的是骑手本人有赛马直接参赛的，马厩是出租给马主的，马夫也由马主雇佣，赛马场只收马厩租金和伤病马医疗费。经常参赛的骑手约二十多名，全是外国人，其中白俄人多，日本人少。有几个马夫，全是中国人，共养五十多匹赛马。

我是长期杂工，尽干些杂活，像扫地啦（只收拾办公楼内和门前）、跑腿啦，虽不太累可总也闲不着，特别是在赛马前后，就更忙了。有时场长还让我在脖子上挂块招牌，到市内去做活动广告，预告赛马日期，宣传赛马得奖的事。我经常在弄虹桥一带走动，围着我的人也很多，现在虽已事隔五十多年，但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赛马场从形式上看，只是一个娱乐、体育活动场所，而实际上却是一所官办的大型赌博场。参加的人，大多数是白俄、日

本人中的上层人物，那些外国人多是些衣冠楚楚、打扮入时的中青年，有的还携带家属乘坐大轮马车赶来，坐小汽车的不多。中国人则多是来看热闹的，实际买彩票的极少。

赛马比赛的形式分两种，一种是马车赛，一种是骑马赛。参加车赛的车，是一种特制的双轮大马车，车斗上只有两人的座位，但参赛时只许一个驭手在车上。骑马赛又分两种形式，一是速度赛，一是障碍赛，各有各的跑道。障碍赛的障碍物，只有几处一米多高的竹障和两米宽的跳沟，比现在电视中看到的障碍赛简单多了。

参赛时，除经常参加比赛的固定骑手、驭手、马匹外，也允许外来骑手、驭手、马匹参加，但赛前必须经过严格考核，如对骑手、驭手、马匹进行体检、试跑等。然后将合格的骑、驭手和赛马，按实际人马的素质，分成甲、乙、丙、丁四组，各编上号码。骑手与驭手分别穿上不同颜色的号坎，一号红色、二号蓝色、三号黄色、四号茶色、五号绿色，以后号的颜色就记不住了。赛前还将这些骑手、赛马过去的竞赛结果的名次及比赛的场次用大幅广告牌公布于众，同时还向参加活动的人员分发赛马记录明细单，供购票者参考。

每次比赛前，为了使每组赛马负荷重量平均，还规定了人、马、鞍、车的标准重量，骑手、马鞍、驭手、马车一一过秤，不足标准量的要以铜片填补，务使均衡达标。

开始比赛时，起跑发令是摇旗，不用枪（怕马惊），起跑抢码要退回重跑，一般不取消比赛资格。在看台前，左右各设一监视台，发现某骑手犯规立即与裁判联系，即使跑了第一，也要取消资格，监视台设有电话。

买彩票中奖是这样的，赛前半小时骑手先在场内遛马，买彩票的人根据每组赛马的编号，参考公布的纪录，再结合自己

的实地观察，选择最佳的、获胜可能性最大的马，购买它的赛马票。票价一张为伪满币5元，购买张数不限。每场比赛30分钟，赛程短不足30分钟，也要等满30分钟再进行下一场。比赛的赛程不固定，有的2000米，有的3000米，也有1800米，这是按每组马匹素质来决定的。每组参赛的马匹数，要看售出票数来定，最多时每组达14匹，最少两匹，通常都是六七匹左右。比赛结果所取的名次，也根据参赛马数来决定。一般是4匹马参赛的取前1名，5至7匹的取前两名，7匹以上的取前3名，比赛结果，谁买的票与优胜马匹号码相同，就算中奖。中奖的奖金由所卖票数多少来决定，即每场比赛卖出的票钱除给赛马场一定比例外，都归获奖号分配。如某号获胜马卖出10张票，其他马共卖100张票（500元），那么500元再加上获胜号的50元，共为550元，假定给赛马场50元，余下的500元就由获奖的10张票均分，每张票可获奖金50元。因此，卖票额最多的获奖号，结果中奖所得不一定多；相反卖票少而获胜的号，却能得更多的奖金。如一组赛马共5匹，其中一匹优胜的只卖两张票，其它4匹共卖100张票，这100张票所卖的500元都要归获胜的两张票平分，每张票可得资金200多元。根据这一道理，有时买票者便与骑手暗中做交易，使卖票少的马，获得胜利，从而获得更多的奖金。有一次，我看到有个买马票的日本人与骑手井上（是个瘸子）捅捅咕咕，知道其中定有文章，我便跟在那个人的后边，看到他买的正是井上的票。结果井上骑的那匹叫“小鸟”的赛马，本没有跑第一的记录，但这次却跑了第一，而这匹“小鸟”只卖了4张票，资金2512元。得奖的日本人领了钱就走了。

原来骑手为了额外多赚钱，骑手之间也有时互相串通，与买票人内外勾结，暗地搞鬼，故意使售票少的马获胜，好多分

些外快。场方就是防止买票人与骑手接触，才让骑手通过地下道进入场地的。即或这样，有时他们也能钻空子。井上的侄子也是一名骑手，一次比赛后，被井上用马鞭子好一顿抽，就是因为没达到井上的要求，没取得第一名，失掉了一次赚钱的机会。

在赛马场上，除买马票赌输赢外，还有一种“摇彩”的形式。摇彩的方式，虽然与赌赛马不同，但两者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摇彩处于从属地位。摇彩随着赛马的场次进行，每赛完一场，就进行摇彩一次。在每场开赛之前，先卖彩票，票价每张伪满币1元。票面上标明彩票本身的号码，还附有本场参赛马匹的不同号码，每张彩票都有存根。待一场赛马结束后，就开始摇彩。将卖出彩票的全部存根做成小纸阄，装入一个球形周围带许多小孔的器物中，此器物有摇把，用手一摇，球即迅速转动，纸阄便由孔中甩出，甩出来的纸阄上的号码，就是中彩号码，但还须对上附带的获胜马的号码才能得奖。摇彩所得奖金，要比赛马少得多，虽中彩也占不了多大便宜。

总之，不论马票获胜也好，摇彩中奖也罢，赛马场从总收入的金額里抽出一定比例的提成，早涝保收，至于谁输谁赢他是不管的。

赛马场的赌博与其它赌博一样，总是输的人多，赢的人少。有的人一天之内连输几场，有的一连几次也没获胜。输客们在完场之后，垂头丧气钻进树林；那些赢客喜笑颜开，领着老婆孩子踱进饭店，喝得酩酊大醉……

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尽管赛马场是一个赌场，但比起太平桥乌烟瘴气的赌场，好像还文明一些，多少带点儿体育娱乐的气息。

日本投降后，时局动荡，日本人也无心娱乐，大都回国，赛

马场也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遂于1947年夏天倒闭了。

（摘自《哈尔滨文史资料》）

伪满时的锦州跑马场

武连勤

锦州跑马场又称赛马场，日本人称“竞马场”，是日寇在锦州所设的一个公开的合法化的大赌局。它以新奇古怪的形式，吸引着那些梦想发财的人受骗上当。日人在设场期间不知坑害了多少人。

马场的建立

日寇侵入锦州以后，便开始了经济上的渗透，挖空了心思，对人民进行盘剥和压榨。

当时锦州来了一个叫肖岛左一郎的日本“在乡军人”，他与锦州地方官府相勾结，遍查了锦州市周围的地形、地貌、地物，最后他确定了在锦州太和区营盘乡建起一座赛马场。他用少许伪币，实际上是硬占了金屯之西、牛屯之南、营盘之东、北大营之北一大片土地。他跑马圈地，形成了一个鸭蛋圆形的跑马赛圈。此圈北大南小，西圈线与去义阜铁道线相平行，长约800米，外界则长1000米。牛屯南的北线跑圈东西长500米，外界长900米。金屯西线从北大营至牛屯跑圈长700米，外界长900米。由北大营至西部铁道线的跑圈线长300米，外界长600米。全部场地大约45万平方米。此场是在伪康德7年（1940年）末，日寇勾结警察强迫农民将土地上的庄稼拉走，然后开始拉刺网、

铲土地、设围测量，于牛屯南面修缓坡，设“跑马障碍”。并于牛屯方面即西部建看台，看台面朝金屯方向。于现市种畜场附近的铁路线旁建赛马场门，设售票室及办公室。还在今市种畜场院内建马场日人职员家族宿舍百十间，室内修建日式“蟹拉搭”炉灶。并在其附近建起12棚马厩，每棚养马50至60匹。还设有草料场及马夫宿舍等。所赛之马，有的是从日本运来的纯种阿拉伯“大洋马”，有的是从蒙古买进的“鞑子马”，备有马鞍、替子、号衣、马号。马均由日人起名，诸如叫“紫金”、“朱雀”、“龙凤”、“苍走”……尽起一些名马之名。每棚有马夫三四个人，均为中国人充当，每日管理、训练和喂养马匹。有的生马从蒙古购入以后，野性不改，遇见人连咬带尥蹶子，非常凶，用一般的铁嚼子（即平杆嚼子）不能把它怎的，很难驯服，往往把人从马身上给扔下来。这样就要带“霸王嚼子”，人一拉嚼子，马嘴内嚼子上下立起，把马的上下部牙膛支开，使它闭不上嘴，这样才能把它驯服。在赛马过程中，对那些弱马、病马、跑不好的劣马，要卖给市内车夫去拴马车。有的好马，跑完“满趟子”（所谓满趟子，就是在赛马中连得三回第一的良马）不能再赛，要“退役”，一个是养起来，另一个可以运到外地赛马场去，如营口、大连、奉天（沈阳）等地，继续比赛，以免大家都来买此马马票。也有一些有头脑的赌徒，坐火车跟马跑，走哪儿跟哪儿。但是往往大多数是陌生人，不熟悉马的好坏，买错了马票。赛马场由于离市内较远，为使住在市内外的人都参与这项活动，日本人还修了专通赛马场的火车专线，车站设在营盘。在那时每个星期天前往那里买马票，或是参观赛马的人络绎不绝，平时亦不乏人，场内摇旗呐喊，响彻云际。

赛 马

参与观光或赛马的人，入门要到日人售票处买入场券，此券每张为伪币5角，入场后可以上台观光，也可到售马票处买马票。买完票后，可以到遛马场看某匹号马某个骑手，这时还有人介绍马的档案，何年出生、性别、特长、体重、身长等。看好以后可以买马票，每张5元多少不限，同号的有的可以买二三十张的。在赛马时，要从各棚中抽出同等的马，一等马要与一等马，二等马要与二等马，三等马要与三等马比赛。赛马的骑手多为中国人充用，一等马要驮100公斤重负物，骑手体重马鞍等附属物合在一起为90公斤，就要加上10公斤，体重轻的75公斤的就要再穿上25公斤的铅背心，或是穿带铅条兜的衣服，体重实在太轻的要加上铅饼子，务必达到负重相等，才能比赛。每次参与比赛的从7匹到10匹，这样要取一、二、三等得奖。如果5匹马参与比赛，这叫决赛。只跑第一名的马得奖。在比赛中，要比赛马的体力、技术、技巧、有跑爬坡、跳高低栏。高栏1.7米，低的1.05米，还有跑“8”字圈，“V”字圈，跑距为2000米。跑到终点后要由裁判判定一、二、三名，有时马差一鼻子判不好时，群众起哄。跑一、二、三名得法如下，先计算买马票数，先由场主抽出35%的提成，然后把余下的钱款按跑一、二、三等比例多少分摊得奖，如果都买了跑第一的好马，即使赢第一，也不能得回原本，那叫“大票”，要按比例换算谁得多少。得奖后骑手得奖，马主得奖，押人领钱的警察也得“乐和钱”。

赛马同时，赛马场主人还兼营彩票，输赢比赛马还快，播出崩豆，当场开奖，但不管谁得奖，出彩票的人要先提出35%。

组织和作用

赛马场全名叫“锦州竞马株式会社”，社长为肖岛佐一郎、佐藤。社址在锦州火车站之东木村土地、日本电影院“锦座”斜对门，即今日凌河区医院附近，建有两层日本小楼，有职员30余人专门计划赛马场的事宜。马票、彩票要在小楼内单独印制，不叫印刷厂或其它厂印制，以免伪造吃亏。会社还经常奖励赛马场人员，每次用信封装上纸币、封上封口，谁也不知谁得多少。那时卖出的马票、彩票很多，每场地上的废票铺上一层，连地面都露不出来。所以雇用的人员也多，有看门的、清扫的、监跑的、过秤的、骑马的、喂马的，合在一起约有200余人。但主要骨干均系日人，如酒井、佐藤、大峰、广岛、肖岛等均为骨干。

日寇搞此项赌博，起至伪康德7年直至伪满垮台前，它消耗了大量民财，坑害了许多人。据说有个日本青年妇女叫藤本淑枝，带个小孩，背着丈夫，来此买马票赌博输个精光，无脸再见丈夫，在牛屯树林自寻短见，幸被中国骑手发现救下，才免于难。其他受害的也不知凡几。至于此地农民，丧失土地以后到处流浪，生活更是痛苦万分，“八·一五”光复后，把土地退回土地原主。解放后，又把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这样人民才过上好日子。

（摘自《锦州文史资料》）

日伪统治时期抚顺赛马场见闻

姚云鹏 李凤侠

站在抚顺东岗车站三站台上俯瞰足下，约有十几万平方米的大片洼地，这是四十多年以前抚顺赛马场的遗址，故而东岗火车站往昔曾有跑马场火车站之称。

抚顺赛马场是日满统治抚顺时期官办的大赌场。日伪当局对赛马场不仅大力支持，而且多方鼓励，并给予法律保护。抚顺赛马场，最初建于抚顺炭矿东乡坑（俗称北大井）附近，因场地狭窄，跑道过短，而迁至东岗新赛马场。

抚顺赛马场的全盛时期，应属1936年（康德3年）至1943年（康德10年）间。东北各地赛马场，均隶属于伪满洲帝国司法部马政局，办事机关设于伪满首都新京（今长春）。抚顺赛马场则隶属于马政局管辖下的“财团法人”（日本所称财团法人，相当于我们的地方国营），抚顺赛马俱乐部（今东四路换房服务站）管理。当时“满洲”各大中城市，共开设9处赛马场，即鞍山、抚顺、吉林、营口、大连、新京、哈尔滨、锦州、奉天。其中最大赛马场为奉天（沈阳）国立赛马场（相当于今天的中央企业）。抚顺赛马场之建设规模，仅次于奉天、大连、哈尔滨，其它城市之赛马场与抚顺相比，略为次之。

抚顺赛马场举行赛马时间为每年春、秋两季，每季赛马两次，每次两周。每季28天，全年56天，每天赛12场。雨天停赛，概不顺延。因为赛马是在“满洲”各处赛马场巡回比赛，按已预定日期不准拖延与变更。赛马骑手中，日本人占五分之四，

中国人、朝鲜人占五分之一。骑手之级别，不仅有考究，而且大有学问。见习骑手级别最低，为骑手之弟子。见习骑手骑马练马都随便，上场赛马却没有资格。由见习骑手晋升为骑手，须经马场正式考试，合格后成为正式骑手，方有上场赛马资格。

由骑手再升级，可晋升为骑士，当时尊称骑士为“健满骑手”。骑手升骑士难度更大，不仅要求骑马术精通，而且必须具备赛马、驯马的一切知识。对中国人、朝鲜人骑手考骑士，另外多增加一科日语考试，普通日语（土话）说得再地道，也不合格。晋升骑士考试，由伪满司法部马政局负责把关，如果想考骑士，必须会说日本东京标准语，骑士考试合格，即可获得“健洪骑手”称号，除在国内赛马场参加比赛，还可出国。如去日本东京，去中国上海（汪精卫政权），去美国芝加哥（日美战争之前）……同时尚可担任赛场调教师。司法部马政局不取任何代价向赛马场调教师供给赛马马匹，令其驯养后参加赛马比赛。抚顺赛马场的调教师，每人平均养马60匹，每匹马每月由司法部马政局拨给伙食费伪满币90元，相当于抚顺机关职员3个月工资。抚顺赛马场共有调教师6名，总调教师为日本人吴山保吉，日本人调教师有原部、小田、大川。朝鲜人调教师为金在民和金福林。中国人骑手仅有两名，一名叫刘宝林，另一名为李树鹏。整个抚顺赛马场共有骑士8人，骑手20人，马匹总数约500匹（包括私人送养马匹在内），能上场正式参加比赛的马，尚不足200匹。针对马的具体情况对骑手的体重有严格要求，正负差数不得超过1.5公斤。下场比赛前后均须过秤，体重如超过此差数，赛马跑了第一，即使赢了也宣布无效。

资本主义国家经营马场，其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买马票都都想自己的马跑第一，以便发上一笔横财。事实上买马票越多，赛马场盈利额越高。所以赛马场无论对骑手、还是对马匹，根

本不讲人道。骑手人体超重，几天不准吃喝，至于参加比赛之马就更悲惨，临上场之前，给马扎吗啡、灌啤酒。赛跑时但见那马四蹄紧刨，连蹦带跳，像疯了一般。所以骑手骑马上场之后，一见开赛信号，便不顾一切地挥鞭策马、使马儿狂奔。骑手和比赛之马，只要跑上第一名，待遇就特殊，骑手多得钱，马给记大功。马的年龄限制在3岁口，一匹马到赛马场之后，累计比赛成绩共跑12次第一名，则可被评为一等功勋马，可以给马披红戴花，光荣退休，从此送离赛马场，把马无偿赠给日本宪兵队，或日本守备队，让士兵骑马闲逛，每月90元“伙食”费，直到养死为止。

人们都说赛马场的骑手，“吃的是阴间饭，挣的是卖命钱”。骑手只要两脚登上马蹬，从起点飞马进入跑道，骑手就已生死由天。尤其飞马跳障碍，一旦马失前蹄，骑手非伤即亡。“满洲”人骑手李树鹏，就是在马跑如飞的跑道上，落马摔死的。所以骑手面对“肉山酒海不为乐，金银成堆难知足”，成天花天酒地，吃喝嫖赌，有了今日，谁管明朝。凡骑手都盼望自己所骑之马，能跑上第一名。

骑手们最盼望全“满洲”赛马的大型比赛，如果这场比赛能争得第一名，可得到伪满司法部马政局代表“国家”所授予之大奖金杯，及现金伪满币3500元，相当于一个小职员十几年的工资收入。但大奖赛并非每年都赛，必须选择有纪念意义的适当时机，而且要选择大城市，还要选择好场地。像抚顺赛马场的场地，是没有资格参加大奖赛的。1941年（康德8年），于庆祝伪满“建国十周年”之际，各地赛马骑手，齐集哈尔滨赛马场，举行赛马大奖赛。抚顺赛马场骑手“满洲”人刘宝林，与哈尔滨赛马场白俄女骑手季米多娃，在赛马场上争夺第一名，双方势均力敌，一场激战，双方都筋疲力尽，结果哈尔滨白俄女

骑手季米多娃夺得了大奖赛第一名。

至于赌场之外，抢购马票者，争先恐后，输赢程度如何？输者多，赢者少。买马票下赌注最大者，跟踪到各地赛马场经常买马票者，以日本实业界人士居多，约占80%。“满洲”伪官吏、封建把头、巨贾大亨、商店经理、乐于此道者亦颇有之，约占买马票总人数五分之一。马票票面共分两种，一种单胜式，一种复胜式，票价均为伪币10元一张。单胜式马票，相当于中国推牌九的“压孤丁”，所买之单胜式马票只有跑第一才算赢，跑第二、第三均算输，输者一无所得。复胜式马票，只要跑到前三名者均为赢，三名以后则为输。买同一号码马票者越多，赢钱越少，买同一号马票者越少，赢钱越多。实际所谓“赢者”，都是赢的买马票输者的钱。抚顺赛马场这个“财团法人”，一本万利，买马票者，都是财迷心窍，自愿送钱上门。赛马场每天纯利润收入，平均伪币约2万元，如煤城抚顺最大的地主邵氏葆廉，买一座戈布大桥，日伪当局强行索价1万元，对比之下，天地之差。抚顺赛马场巨额暴利，盘剥程度惊人，可以想见。

进入抚顺赛马场，不管买马票、摇彩，还是参观赛马，必须先买门票一张，交伪币一角，否则不准入内。马场正门前方，并排摆着小桌，桌上摆着马票“预约”（预报）单，每张售价伪币3角。在马票“预约”上印有当日赛马12场次的清单，每次下多少匹马，包括马名、马的番号、骑手姓名、骑手番号。马票“预约”，很像中国算卦先生的两头堵，“预约”就是向买马票者预报那一场是哪个骑手，哪匹马能跑第一，以及马和骑手在外地赛马场所创纪录……“预约”是买马票者的参谋。无论在哪个赛马场，卖“预约”单的人都跟踪而去。一为积累数据资料，二为卖“预约”单。因此购买“预约”，多挑选数据可靠者。

抚顺赛马场，除卖马票之外，还有摇彩，卖彩票，俗称“抠豆”。摇彩地点在赛马场院内最南侧的一幢二层小楼，楼下卖彩票楼上设摇彩机，外墙高挂着木板，书写中彩号码。在这里集聚的是中国人，多系小市民、小商贩。每两小时摇彩一次，当场开彩，彩票每张一元。中头彩500元，二彩300元，三彩200元，四彩100元，五彩50元，末彩为1元。中国人愿意买彩票者居多，花一元买彩票，得头彩500元，立刻大发横财。买彩票者，实乃“见其利而不知其弊”，犹如鱼见饵而不见钩。大赌场是坑害人的魔窟，多少人为赌博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啊！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六辑）

伪满北安社会上的“官赌”

贾亚珍 李和 刘志国等口述

苗丰涛 整理

1942年，北安最大的官办赌场——宝局号，在北安东市场（现北安市东三道街的健康路）开张了。宝局号的总头目叫张喜善（老婆是日本人），仗着日本人的叉杆（势力）谁也不敢惹。他开张时的赌博方式主要是推牌九、枪局、球局、掷骰子、摇骰虎、押宝、花六地，后来又增加了会局。上述种种赌博方式，都是利用人们想发财的心理状态而设计的。无论是哪种赌博方式，到后来总的一算帐，还是输得多而赢得少。即或偶而赢了一次，被抽头的，贺彩的，三盘两剥也就所剩无几了。赢的瘾头更大，还想多赢。输的总想捞，越捞陷得越深，直到输得精光为止，甚至有因欠债而上吊自尽的，投河自杀的。可见，赌

博对人们危害之大。尤其是会局的押会活动，涉及面更广害性更大，就连“炕头王”也参加了押会。这种乌烟瘴气的赌博活动直到1945年8月才被苏联红军取缔。

会 局

北安会局是宝局号1943年旧历四五月份迁到北岗开张的，负责人叫赵新京。会局的规模很大，周围各村屯各县几十里、上百里的人都来押会。日本人还设两辆客车卖票，从东市场开往会局，将赌徒和看热闹的人拉到会局。由于当时北安人见到大客车是个稀罕物，有的人为了坐坐车开开眼，坐车当时并没有想去押会，也就稀里糊涂地给拉到会局去了。

北安的会局和周围各县的会局有所不同。各县押会的会门都是37门，唯独北安是40门。前37门与周围各县会局相同，北安会局为取得更大的利润，在原37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天皇、地皇、人皇3门。输赢比例仍按1:30，也就是说押1元钱如果押中了可得30元。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数字，所有参加押会的人都是在这种诱惑力下，受侥幸心理的支配来参加的。岂不知，会局每天只从这40门中出一门。这样，押会的人赢钱机遇只有四十分之一。并且会局在出会门的同时是一下子出3门，从3门中出1门，其他2门叫帮签，押中帮签是不能赢钱的。在点出3门会门时，出会的人每点一门就进行察颜观色（因为出会是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进行的，以示公平），如果高兴的人多，那么就不出这一门，如果悲观丧气的多，于是就在这一门上盖个章，这就是说，会门出定了，押中这一门的赢钱，其余全输。

北安会局的会门共有40门，每门用两个字来代表，包含有一种或几种事物或现象，通过牵强附会的理解，拐弯抹角的解释，甚至硬贴糊，也就把生活当中的所有事情都牵扯进去了。

音会：它是40门之首。梦见观世音老母、神佛鬼怪、死人、
脑袋都押它。

元吉：道士。

河海：和尚、河、海。

安寺：尼姑。

天龙：龙、蛇、下雨。

龙江：盗匪、江。

太平：车、灯笼。

占奎：寡妇。

根玉：男光棍、男性生殖器。

永生：接产婆、巫婆、老太太。

红春：娼妓。

合通：兔子。

汗云：王八（婊子的丈夫）、乌龟。

天申：打柴人。

火官：炮手、打猎的、枪、炮。

坤山：虎、猫。

只得：小偷。

必得：大贼、老鼠。

三怀：狗、兵、警察

至高：梯子。

上招：骑马的。

吉品：当大官的、大公鸡。

正顺：打鱼的。

井力：打井的、打水的、水井。

光明：发光的东西、灯、蜡烛、剃头的。

青云：姑娘。

板柜：木制家俱、棺材、箱、柜。

明珠：日、月亮、星星、夜明珠。

九官：戏子、唱戏。

茂林：算卦的、教书先生。

曰宝：小学生、小孩子。

青元：媳妇。

入山：瞎子。

福孙：牧童、放牧的人。

元桂：杀猪的人、屠夫。

有利：站栏柜的人、买卖人。

万金：财主、有钱人、金钱、元宝。

天皇：日本天皇。

地皇：伪满洲国皇帝。

人皇：所谓的大人物，当大官的。与“吉品”类似，梦见这可押“吉品”也可押“人皇”。

涉及会局押会，术语有许多，这里只简要列举其中的一部分：

出会：会局每天出一会，就是每天出一门会门，押中的赢钱，押不中的输钱。

跑封：就是帮助押会的人把要押的会门写好要押的钱数收好，然后代表押会的人到会局去押会，搞这种活动的人称之为“跑封”。伪满北安会局“跑封”的有两种，一种叫“主跑封”，一种叫“副跑封”。“主跑封”一般是会局雇用的，由会局按月或按押的金额（月汇总后的金额）付给一定的报酬。也有不是会局雇用的，但由于住地离会局近，可以天天去会局代替别人押会而与会局熟悉的。由于有的边远村屯离会局远，“主跑封”白天上会局去了，回来后就到晚上了，只有第二天才能去各家

各户动员押会，第三天才去进行第二次押会活动。这样就形成了隔一天才能押会。而押会人则不同，希望是连续押会，甚至有的会门要连押数天。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副跑封”就应运而生。从实质工作量来看，繁重的动员押会的工作是“副跑封”做的，但“副跑封”与会局并无直接联系，而是被“主跑封”雇用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雇佣关系。分工是这样的，“主跑封”负责天天上会局去押会，赢了钱之后，将款项带回来，交“副跑封”，送达押会人。“副跑封”每天从清早到傍晚都得挨门逐户地去动员押会活动，还得将前日赢的钱送达押会者。晚间将收集上来要押的会门和钱款整理清楚交给“主跑封”。并且需要对押会人负责，会门不能给写错，款项不能给丢失。而“主跑封”只对“副跑封”负责。从报酬来看，是极不合理的，“主跑封”拿大头，除会局给的钱之外，对赢者的抽头也全归“主跑封”。主、副“跑封”之间的报酬一般是按七三或六四分成。如：押会人押1元钱，需交代办费1角，而这1角钱中“副跑封”只能得3分或4分。

接二会：这是经常“跑封”的人干的。因为自己本钱小，办不起会局，但又看出这是一个来钱的买卖。因此他就将押会人押的钱自己留下来，而不交给会局。等到会局一出会，如果没有押中，这些钱他就都捞下了。如果其中真有的押中了，他也不敢隐瞒，就将收上的钱凑上（扣下自己的应得部分），装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给押会的人送去，以示守“信用”。

上封：押会人将要押的会门写好，用纸包上加封，将要押的钱如数交给会局收款员登记。会局工作人员将加封并交了款的会门包别在会局在厅里专门设计的绳子缝里，等待出会，谓之上封。

红封：押中的叫红封。

白封：押不中的叫白封。

臭封：虽然押中了，但因会门的字写错了或写了别字的叫臭封。这样的封会局是要赖不付钱的，往往得跑封人自己赔上。

妖封：押会人押的钱多，为了怕失密，不经过“跑封”人的手，而自己亲自去上封。对这样的押会人会局早就派人观察他了。会局称这样的封为妖封。

扒底沟：就是“跑封”的人将押大赌注的押会人押的会门偷着告诉会局的人，以求得到一定的“奖赏”，称之为扒底沟。

滤格子：会局的出会人将多日以来出的会门反复衡量、比较，确定第二天出哪门才能躲开“重门”，更多地赢钱，称之为滤格子。

其他赌博种种

北安宝局号中除会局之外，还设有牌九局、枪局、球局、掷骰子、摇骰虎、押宝、花六地等。赌博方式主要是：

枪局：用汽枪打香烟。将各式各样的成盒香烟垒成一定形状，相隔二三米远，用汽枪打。在打之前用一定的钱数买几个子弹（软木做的），开枪后打掉哪盒烟就得到那盒烟，如果打不中，什么也得不到。这种赌博方式带有游艺性质，玩的人不多。

球局：设一个大案子，约有两米见方，上面挖有若干小洞眼，小洞眼分别被涂成红、绿两种颜色。红、绿小洞眼分别错开，以求红、绿眼进球机会均等。设球3个，球的大小比洞眼略小一点。宝局人员先吆喝着或唱着动员赌博双方往红的或绿的上押钱。押完钱后，用一个专用的小耙子把3个球摆好，往前将球猛的一推，球立刻就进到案子上的小洞眼里去了。如果球进了绿眼2个，红眼进了1个，这样押绿的就赢了。如果相反押红的的就赢了。如果球进了3个红洞眼或3个绿洞眼，这样赢方只

能赢50%，其余全部份归宝局。因为是3个球，红、绿两种洞眼，只能产生这四种情况，至于球不进洞眼的情况，还没有遇到过，因为案子上的小洞眼非常多，球没有在洞眼外停留的余地。当然，宝局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押红、押绿全输。事实上在案板的设计上排除了这种可能，要不然赌钱的不来了。当3个球进到红绿洞眼之后，输赢立刻就分出来了。宝局人员第二次使用小耙子将输方的钱接了过来，然后按比例付给赢方。宝局人员在向赢主递钱的时候唱着喜歌或说着恭维的话，这样赢方就会拿出一定的钱给宝局人员，叫“赏钱”，这笔钱就成了宝局人员的私人外捞。

摇骰虎：这是宝局人员动手摇的，赌者来猜。宝局人员用两个小碗，里面放3个骰子，两碗相扣，摇动后停下来，让赌者猜骰子点的变化，猜中为赢，猜不中为输。三个骰子的变化定为六种，在案板上画1、2、3、4、5、6六个区，叫做六门，这六门都可以押。如果三个骰子出现1、2、3，那么押4、5、6的就输了。如果出现3、3、3，那么押1、2、4、5、6的就输了，押中了的可赢3份。但不管骰子怎么变化，宝局每次总能赢二到三份。

花六地：是用4个骰子进行的，所不同的是在这个赌场的工作人员全是女的。具体作法是用4个骰子摇，每两个骰子算一组会出现18种情况，如果押中这18种情况中的一种就赢。这18种情况都有名称，分为天牌、地牌、人牌、鹅牌、二板、长三、短牌、长牌、虎头、五、花六、三椎、六套、花七、七、花九、大倒九等等（其中短牌二种）。大体上和推牌九的叫法相同，不同点是用骰子进行和一人摇骰大家押。

赌博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

凡是参加赌博的人都想发财，妄图通过此种途径一朝而成为富翁。偶而赢得一次的，还想多赢，输了的，总想捞本。因而越赌越上瘾，越捞陷得越深。从上文叙述的赌博方式来看，真正得实惠的还是宝局号。而宝局号中的会局害人的面就更大了。一是它更能迎合人们的发财心理：40 门中押中一门就有 1:30 的收入，也就是说押 1 元钱如果押中了可得 30 元；二是它不用到赌场里去，坐在自家炕头上就可以进行赌博了，花少量的手续费就有“跑封”的为他代办；三是赌资金额不限，多有多押，少有少押，因而许多的家庭妇女也被卷入赌博的漩涡里了。

凡是参加押会的人都讲究迷信，因为这 40 门当中的事物包罗万象，胡乱押总觉得赢的希望不大，因而想尽办法取得会门的征兆。尽管押会人赢钱的机遇只有四十分之一，但是每天仍有押中的。且不考虑押中数额比率有多大，但押中人都兴高采烈地宣扬是如何如何讨的封，如何如何请的神，甚至是做了什么梦……因为人们想发财的心理是一致的，又受到 1:30 的诱惑，再看到每天确实有赢钱的，因而想尽一切办法来取得可能赢的会门，时间一长，就走到歪门斜道上去了。现在回忆起来，其做法真是令人发指，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

请看看这些使人啼笑皆非的事例：

一是深更半夜掏水缸。掏水缸人的屁股得冲着灶坑门，否则“不灵”。将水缸里的水一下一下地往外掏，泼在地上。时间长了，人就产生了幻觉，人的幻觉中悟出了什么，然后根据这个来找会门。

二是半夜三更用掏灰耙掏炕洞。将炕洞里的灰往外扒，扒到什么稀奇古怪的玩艺再往会门上硬拉。

三是扶乩。找一个不识字的小孩，给他一只毛笔拿着，面前放置一沙盘，把小孩子的眼睛蒙上，其余的人围在小孩子的周围胡言乱语，直叨咕到小孩子的手哆嗦起来，在沙盘上用毛笔胡划为止。然后根据小孩子在沙盘上胡划的道道来猜字，像会门上的什么字就押什么会门。

四是半夜去找孤女坟。用柳条子或什么棍子往坟头上乱敲，直到产生幻觉为止，在幻觉中猜会门。

五是捞大道。半夜拿把锄头到大道上乱捞，铲出什么东西再根据这个东西来猜会门押会。

六是请牌位。什么胡三太爷、胡、黄二仙、跳大神等。求所谓的神仙给指点会门。

七是半夜跑到坟圈子里去睡觉。强制自己做梦，梦见什么就牵强附会地押什么会门。

八是挖枯井。半夜跳到枯井里去乱挖，挖到什么东西再分析押什么会门。

九是掏裤裆。将四十个会门分别写好放进一个大家公认的有福气的姑娘的裤裆里，然后伸手进去掏，掏着哪门就押哪门。

知情人李和曾谈起两件事：“我参加过几次押会，虽然押的钱数不大，可我一次也没有押中。有天，会局的负责人赵新京上饭店吃饭，我把他招待得挺好，他很高兴，我趁他高兴就和他谈：‘我押会一次也没押中过。’意思是让他给透透风明天出什么会门。他没吱声。我又说：‘我婶长得真漂亮。’这次他说话了：‘他妈的，你琢磨上你婶子了。’以后，他就吃饭，再没说话。事后，我仔细回想，这不是给我会门了吗，婶子，是结了婚的妇女，结了婚的妇女就是媳妇，媳妇应当押‘青元’。第二天我就押了一块钱的‘青元’。结果真出‘青元’这一门，去掉‘跑封’的手续费我得了20多块钱。又过了两天，赵又来吃

饭，问我：‘怎么样，押中了没有？’我说：‘就押中了一块钱的。’他说：‘量你小子也不敢多押。’通过这件事，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是这天‘青元’是个冷门；二是会局的人和押会的某些人是串通一气的，可以有意识地让某人赢点，好给他做广告，真正吃亏上当的是大多数人。试想，出‘青元’那天，押别39门的人不是全输了吗。所以，从此往后我再也不去押会上当了。”

“第二件事是押会讨封的人把杨根晨逼疯了。杨根晨是振北春饭店（现北安市农机公司）案子上的伙计，人很老实、肯干、少言寡语，是人们公认的诚实的好小伙子。这些讨封的人就把他相中了，认为他不说瞎话。于是，有一个人就坐上火车上海北镇去偷来一个胡三太爷的牌位（说是偷的才好使）。把杨根晨找来，用布把杨蒙上，让他抱着牌位。讨封的人围着杨磕头，口里不住地说求胡三太爷给个会门。开始时杨不动，过了一会，可能是杨蒙着布难受，再加上人们的胡言乱语，就真的跑起来了。乱跑了一会，一窜就上了房顶（当时北安尽是些小草房，房檐矮），在房顶上跑起来。一边跑，一边乱喊：‘你们这些穷小子，还想发财，早晚都把你们杀了。杀！杀！杀！’然后杨就迷糊了。这些讨封的人就根据杨根晨的这句话来分析，‘杀，杀，杀，一定得用刀。’于是就从刀上来琢磨，杀猪的得用刀，应该押‘元桂’；剃头的得用刀，应该押‘光明’；打柴的也得用刀，还应该押‘天申’。于是，有的押‘元桂’，有的押‘光明’，有的押‘天申’，个别输急眼的三门全押上了。等到第二天中午一出会，真的出了‘元桂’。这下可了不得了，杨根晨这个人神了，这些押会的人总去折腾他，没几天，杨根晨就被折腾病了。杨的父母不让了，找到振北春饭店老板，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老板答应拿出钱来给杨治病，此事才算了结。”

那么赢钱的就安稳了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刘志国说：“我

当‘跑封’也就二十多天，河南（克东县村屯，北安乌裕尔河以南）的一个‘跑封’的，得了大红封（大赌注押中了），在返家的路上被杀了，钱也被抢走了。这个人被杀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会局派人将他杀了，钱抢了回去；还有的说是赌徒合伙干的，因为领钱当时众人看见了。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可能，为什么单单赢大钱才被杀呢？显然与他们有关。联想到我自己，也天天拿着钱跑，弄不好也得掉脑袋，于是我就洗手不干了。”

今天，我们将这些事情回忆起来，目的就是通过一个侧面来说明伪满北安保局号这颗毒瘤对人民的毒害，以达到揭露旧社会罪恶的目的。

（摘自《北安文史资料》）

吉林市的牛马行

常白山

牛马行的由来

凡到吉林市的人，大都到过牛马行。有些人没有到过吉林市，却听说过吉林市有一条虽然不大，但却非常繁华热闹的牛马行。

说起牛马行的历史，可算是悠久了。可以这样说，有吉林城就有牛马行。据历史文献记载：远在吉林市建城以前，吉林市就已具有封建时期城镇的雏形。清朝康熙十二年（1673年）在宁古塔副都统安珠瑚的监督下，始修吉林乌拉城池，南倚松花江，东、北、西三面竖以松木为墙。到17世纪末，吉林城已初

具规模了。吉林建城后，最早比较繁华的市街，据说有迎恩街、西大街、北大街、尚仪街、河南街、翠花胡同；嗣后由于人口日增，商业日繁，船营街、辘轳把街、草市街、牛马行、通天街、粮米行街等，相继发展起来。牛马行这条街的北头到城墙根附近，当时是一片空地，人们就在这片空地上进行牛、马、驴、骡等牲畜交易。由此，人们管这条街叫做牛马行。

牛马行这条街的名称虽然在解放后改为“青岛路”，但人们还是习惯地称这一带为牛马行。

清代、民国时期的牛马行

牛马行南起河南街西头，北至老城墙根（今之光华路），全长不到四华里。在建城之初，由于地势高低崎岖，街道曲折狭窄，胡同与街道间迂回相连，有桥多井多的特点，加之船厂又是木材的集散地，当时的木材又特别多，所以牛马行和其他街道一样，是用直径一尺五寸以上的原木排成的，道路两侧是泄水的阴沟，东侧阴沟是一箭队头胡同，经西大街、尚仪街转北流至牛马行中段（今解放路西口）通天街折向东经朝阳街一直流向莲化泡（今吉林大街广场西边山丘下）。当时这条水沟名叫通天河——实际是一条类似北京龙须沟的臭水沟。清宣统三年（1911年）农历四月初十下午，迎恩门（今临江门）里“霁城饭馆”失火，因房屋围墙，道路阴沟，均为木造且相互连接，当天又刮西南大风，火借风力，风助火燃，加上消防不力，大火越烧越旺，蔓延大半城市。从起火地点沿江沿、西大街、延烧至翠花胡同、北大街、后鱼行、城隍庙、牛马行、河南街、通天街、二监狱、巴尔虎门。那次大火整整烧了一天一宿方止，烧毁全城房屋的三分之二，是吉林市前所未有的大火。历史上的“火烧船厂”之说即由此而来。

在这场大火中，因为牛马行这条木头马路被焚烧殆尽。所以民国2年（1913年）吉林督军署责成市政有关部门备料重新准备修复牛马行。修复工程于民国3年（1914年）开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牛马行改成沙石路面，并在现在的农贸市场地址，修筑了一座长方形砖木结构的菜楼，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同时在茶楼的北门口，修起了一座砖结构的水塔，以备消防用水。

牛马行虽然在晚清时候就将牲畜市场移到了别的地方，但人们还是习惯地称这条街及其附近叫牛马行。

随着社会的发，到了清末民初，牛马行已发展成为吉林城内最繁华、最热闹的街道之一。牛马行的北头，即原来的牲畜交易市场，这时已改成一片菜地（当时人们称之为园子），它的南边是菜市，菜市的东边是七间房（今吉太胡同口），七间房的南面是三道花园胡同（今晨光胡同）、二道花园胡同（今东升胡同）、头道花园胡同（今旭光胡同）。这几条胡同是居民区，住的居民多是达官显贵及有钱的士绅，如吉林市的巨商牛子厚的长子就住在头道花园胡同。再南面是通天街（今解放路），在这条街上（指靠近牛马行街的）有中山浴池、有康乐戏院、民众教育馆、消防队、省警察厅、济良所、戒烟所和广济寺（俗称济公庙）以及消防队后院的清真寺（俗称东寺）。

在通天街南面是发市胡同、世兴当胡同（今青湖胡同）和三道胡同（今青江胡同）、二道胡同、三义胡同（今青川胡同）以及裤裆街（今通信胡同）。

在发市胡同、三道胡同以及头道胡同这一片地方是妓馆集中的地方，这里的妓馆都是下等的，妓女大部分卅岁以上的，比起东关圈楼里的一、二等和福兴里的三、四等差了许多。此外，这里还有一家日本窑子（名叫太吉馆），专为日本浪人而设。旧

社会的劳动人民被视为最下层，特别是妇女更不当人看。到这里来的妓女，不是拐来的就是骗来的，当然也有少数是被生活所迫卖身的。

通天街上的“济良所”是发妓女财的一个假慈善机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妓女冒着生命危险逃出火坑，跑到“济良所”，请求他们给以人道主义的待遇，可是有谁知道她们到这儿后，如同屎窝挪到尿窝，和过去一样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她们只能忍辱含垢默默地等待着好心人拿钱赎她们出去。路过“济良所”，人们可以看到它的门口墙上挂着她们的二寸照片，下面标着每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和价码以供人挑选。那时说被赎出的妓女是“从良”。

在世兴当胡同及其附近，都是些贩卖大烟（鸦片）、吗啡、白面（海洛因）的人家。在这里，无论白天黑夜，你会看到许多披着麻袋片的人在那里扎吗啡抽大烟、抽白面，他们白天仨一堆俩一伙的在一起，过足瘾后就在那里晒太阳或抓虱子，或者打哈哈，到了晚上就在附近阳沟板上挤在一起过夜（当时俗称蹲阳沟板）。夏天还好对付，到了冬天，在北风凛冽、大雪纷扬的季节，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每天经常有十个八个冻死在阳沟板上，当时称为“死倒”或“路倒”。

除此，牛马行附近还有几家公开营业（即官准）的大烟馆。当时大烟馆有花、清之分：“花烟馆”是有女招待的，女招待专给烟客烧烟、倒茶。没有女招待的谓之“清烟馆”。

当铺，在牛马行附近是很多的。当时最有名的有：中国人开的“源升当”、“世兴当”、“大兴当”、“永衡当”等；日本人开的有：“富山当”、“泰山当”等。日本人开的当铺较中国人开的高，死号期短，当钱多。因此，一般急需用钱的典当人多去日本人开的当铺去当号。日本人当铺主要是贩卖吗啡和海洛因，

吸毒者有了东西，便在菜楼北边公开出卖，卖不出去，便到日本人当铺来当（实际就是卖），得了钱便买毒品过瘾。日本人当铺还成趸大量将毒品卖给毒品贩子，危害甚烈。

炭市胡同的南头，清末民初都在这里设有“马巡队”，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他们白天、黑夜都骑着高头大马，游弋街头，名义上是巡逻，实际是向群众示威。

在牛马行东侧还有两件值得追记的。

一是这个时期，吉林著名的巨商牛子厚，每年秋冬在济公庙里舍粥饭给穷人。当时有这样的顺口溜曰：“船厂有个牛子厚，周济穷人好行善，冬舍棉、夏舍单，一到秋冬舍稀饭”。

二是现在的市塑料五厂址，是当时基督教办的“育婴堂”，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幼童和无人养育的私生子。

在牛马行西侧，从北到南是菜市胡同、宝宣胡同（现春光胡同）、安吉胡同、老晋隆胡同（曙光胡同）、估衣胡同（今烟台胡同）、源升胡同（今伊春胡同）、升平胡同、永德胡同（今健民胡同）、西市胡同（今久青胡同）、城隍庙胡同、后鱼行胡同直到北大街。

在牛马行的南头路北，有清朝修建的一座城隍庙，里面供奉城隍、土地和十殿阎君。这座城隍庙在吉林古建筑中是颇有名气的。可惜在60年代初期被拆毁，现只剩城隍庙的后殿三间，亦改做民宅。旧社会的城隍庙，香火很旺盛，清末每逢阴历三月初三和七月十五鬼节（又名盂兰会），城隍老爷都要出巡。当然城隍老爷的泥像不能抬出，但为了宣扬迷信，愚弄人民，统治当局又做了木制的城隍与城隍奶奶放在后殿，并陈设着城隍一家的生活用品等。每逢出巡之日，一大早，政府的大、小官员一行几百人，打着执事、伞盖、仪仗，身穿官服，来到城隍庙，跪请城隍老爷及城隍奶奶出巡。小官们抬着木制的城隍老

爷及城隍奶奶，后跟着道士、和尚，吹着笙管，敲锣打鼓，吟诵经文，列队出巡，经北大街、草市、江沿，出迎恩门、迎恩街到城隍行宫（今北山街道办事处对过稍东一点），将城隍夫妇放在行宫里，道士、和尚诵念经文超渡亡魂，晚上再请城隍回家。七月十五日晚上，由各界扎的荷花灯，在温德河子放，河灯顺松花江流下，群众在岸上观看。

清朝的将军府衙门，就设在城隍庙西，后搬到江沿现政府处，原将军府改作运动场，房舍做了民众教育馆。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统治吉林市时期，运动场改做了杂货市场，盖了一些低矮简陋的板房和为商铺门市，解放后全部扒掉，建了居民住宅楼。

在源升胡同（今伊春胡同）里有一家“明局”（赌场）。这个“明局”的局东据说是吉林省督军张作相的四哥开的。“明局”的门口有武装卫兵站岗，“明局”里设有“骰子”、宝局、牌九、麻将。在这个局里赌钱，赌客只准输，不准赢，局东也不让你赢了走。

在牛马行中段菜楼的西北角，有一条胡同叫估衣胡同（今烟台胡同），这条胡同的两侧全是做估衣生意的。每天一大早，就能听见：“这件夹袄实在好，又肥又大不瘦小，夏天拆了可做单，科天絮花当棉袄”的吆喝声，由此，人们管这条胡同叫估衣胡同。冬天来了，估衣胡同的估衣铺门前，全是卖各种鞭炮、花火、风筝、空竹、大小灯笼等年节应时商品。春节过后旧历三月，此处又改换作卖布老虎、布娃娃、大小纸葫芦、香、蜡、纸等四月北山庙会用的种种迷信品。在估衣胡同北头是老晋隆胡同（今曙光胡同）。“老晋隆”是一家由山西人开办的酱菜商店。在这条胡同里有一处道德会讲道所；一处基督教安息会（现均改做民宅）。

日俄战争前，日本帝国主义在吉林市的宝宣胡同一家客栈里设有吉林领事办事处，后迁至新开门外建立了吉林日本领事馆（现医学院）。

在牛马行通向源升胡同的入口处，有一家粮米铺，它的门前是一块空场，大约有五六十平方米。这场小空地真是热闹非凡。什么耍猴的，拉洋片的，吹糖人的，捍面人的，卖棉花糖的，架鹰的，卖蜡嘴的，点痞子的，剃头的，交卦问卜的……应有尽有。

下面再看牛马行正街的情况。牛马行正街是以菜楼为中心的南北走向的街道。菜楼北面有著名的清真饭馆“新江楼”（现玉茗斋）、清真饽饽馆；路东侧是一排卖牛、羊肉的单轮跨车；路西是卖干鲜水果的小摊床。在马路两侧的空闲地上，一些妇女带着针线筐箩，专门为人们缝补衣服、袜子、纳袜底、钉纽扣等零活，当时，人们都管这些妇女叫“缝穷”的。这些“缝穷”的妇女，遍布在牛马行所有能容下她们的地方和角落。

菜楼的四周，围着一圈回族人开的烧麦馆和馅饼铺，约有几十家。牛马行的风味小吃，如锅贴儿、涮羊肉是颇有名气的。

菜楼里面有肉铺、菜床子、干鲜杂货小商号等十几家。最著名的有常家肉铺、刘家床子、程家床子等，还有一家日本人开的菜床子。

菜楼的南门口是工夫市，在那里聚集一些手拿斧、锯、刨子的木匠；有手拿瓦刀肩挎工具袋的瓦匠；有肩扛板斧的劈柴禾的和做零活的小工以及到农村收割铲镪的短工。它的东侧是一溜小棚，卖苞米糍子大豆粥、高粱米小豆粥和大饼、煎饼、豆腐脑，也有卖老豆腐的摊棚。这些小棚子到了日落西山无人问津时，拔锅就走，锅膛里还有余火，这正是那些无家可归的劳动苦力栖息过夜的好地方。它的南面是一家挨一家的铁匠炉、马

掌铺。街旁是柴禾市，这里卖的净是铁轮大车装着的树头、板柴和木料，冬天大车改为马拉大爬犁。在牛马行的南头还有几家石灰、麻刀铺和几家膏药铺。

伪满时期的牛马行

伪满洲国成立后，牛马行的几家较大商家，在重税、勒索、销路不畅的情况下，纷纷倒闭。剩下几家有“门面”的店铺，也处于半倒闭状态。大量的仍然是小食品摊床。有卖切糕的跨车，卖煎饼的床子，卖老豆腐的挑子，卖大糕子的粥锅。再就是卖破烂的地摊。菜楼内几家副食商店，也是几月一换主人，很难维持长久。牛马行南头有几家铁匠炉，北头有几家白铁铺，也已濒临倒闭的边缘。

因牛马行是穷人集聚的地方，也是男劳力集中的地方，保甲长（町会长）、警察隔些天就要到这里抓劳工。一是白天堵住街道两旁和胡同口进行抓捕，然后送到牛马行南头“劳工协会”院内，看押几天，再像运牲畜一样，装上火车运往远处。抓去劳工十之八九因饥饿劳累病伤死在外面；二是得罪了保甲长的，保甲长带人登门去抓；三是到各小旅店去抓。半夜时，派人把旅店的门窗堵住，然后把拥挤在炕上的人捆起来带走。

伪满洲国成立后，在牛马行吸食毒品的人日益增多。抽“白面”的，把卷烟一头掏空了，装上“白面”，然后仰面把烟头冲上，划根火柴点着，深深地吸进几口。打吗啡的人，用破旧小瓶把吗啡用水溶化好，再用一个小注射器吸进吗啡水，两手替换着扎（注射）在左右臂上。因为不消毒，天长日久，两臂腐烂化脓。警察明知这是吸毒行为，但也装作看不见。原因是一则从这些人身上榨不出一滴水来；二则贩卖毒品者，早已把他们“喂饱了”。

牛马行的暗娼有两种，一种叫“大炕”，就是往家招揽嫖客。另一种叫“野鸡”，他们可以随客到旅馆、宿舍过夜。伪满时期，曾一度把暗娼赶到黄土岗（炮台山下）一带，但因她们把卖身之钱拿出大部分“孝敬”给官员和警察，所以牛马行的暗娼又遍地皆是了。

伪满的警察对待老百姓是极其凶残的。他们享有很大“特权”：吃饭、买物、坐车、看戏、剃头、洗澡，一概不花钱。牛马行警察派出所就是一座阎王殿。抓去的人经过它的折腾后，致残致死者不计其数。伪满末期，牛马行派出所一个叫高庆玉的警长，外号叫高大巴掌，他一人就有九条血债。冬天他到饭馆非要辣椒馅饺子不可，吃完抬屁股就走。牛马行北头有个姓李的老太太生病了，他儿子特意下乡买点小米，被高看见了，把小米没收，又活活把老太太的儿子给踢死。有个煎饼铺的主人因给高送贿不及时，高去把老太太磨了一宿的一大盆煎饼沫子（稀面子）给摔了，老太太一气身亡。一家饭馆仓库的角落里有几粒发霉多年的大米，被高发现后硬说他们私藏大米，是“国事犯”（对经济犯的威吓）、“经济犯”要逮送警察局，饭馆掌柜只好凑了几百元钱连同一桌酒席给他送去，高才罢休。牛马行北头有个叫祝万良的老人，由外地买来两匹更生布，不巧被牛马行派出所的警察看见了，他们立即把老人抓送警察局，重打以外，又灌了辣椒水。直到破了产，这位老人才被释放出来。

牛马行是各种人集聚的地方，所以日本宪兵队和伪满警察署的特务也不时到此处来抓获“反满抗日”分子。牛马行路东有个日本宪兵队的特务叫蔡英超的，他曾在牛马行抓去我党一名地下工作人员，因没证据，最后才不得不把他释放出来。吉林解放后，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被人民政府逮捕处决了。

到牛马行来的人大多数是穷人，有出卖劳力的劳工，有等

待雇佣的木瓦工人，有小商小贩，有各种手艺工匠，有“缝穷”的，有进城的农民，有抽“白面”的无职业游民以及许多乞丐，偶而也有穷学生。有人形容牛马行每天有四种声音响震全街：“清晨运尸声满街，白天叫卖声震天，天黑‘争坑’声不断，夜半呻吟声凄惨。”

每天天一亮，就由清扫队从阴沟里或锅底坑内用大钩子把夜里死去的“路倒”钩出来，装在垃圾车上拉走。夏天少一些，冬天就多了。

白天，小商贩、摊床、饭馆、估衣铺的伙计们，放大嗓门喊卖货品。什么“热乎切糕”、“喷香的大粽子粥”、“老豆腐热乎”、“进来吃吧！烙饼烧麦！”此起彼落，叫卖声、喧闹声，声浪震耳。

冬天傍晚后，一些小吃摊拔锅而走，一个个乞丐赶快钻进灶坑内，坑口盖上破草帘子，利用余热作为一宿安身之处。但人多灶坑少，经常因争锅灶坑而吵骂打架，甚至打得头破血流。

半夜，一些身患重病或吸毒的“蹲坑人”彻夜呻吟、呼叫，夜深人静，那种凄惨悲痛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吉林市的老人们，常说一句诙谐话：“干什么那么忙，是要到牛马行抢切糕去呀！”，“牛马行抢切糕”这是伪满时期牛马行人们生活的一页真实写照。许多乞丐实在饿得无法时，看见进城的农民买了切糕拿在手中正要吃，他们上前把切糕抢在手，向上吐上几口唾沫，然后再还给他。这样一来就迫使买切糕的不得不将切糕送给他们充饥。

伪满在牛马行“缝穷”的妇女更多起来。夏天太阳晒，冬天寒风吹，一天挣几分钱只能半糊口，原先除了老年妇女外，还有些年轻妇女参加这个行列中来。警察、特务看见那个年轻妇女稍有姿色，便借口到他家去缝补衣服，把妇女领到他家中进

行奸污。有的一去不见回来，后来缝穷的妇女中，再也见不到年轻的了。虽然这样，为生活所迫缝穷的队伍还是越来越大。

（摘自吉林市《船营文史资料》第一辑）

匪 患

黑山著名匪首“老二哥”的罪行

郝让先

“老二哥”结伙为匪

黑山县著名匪首“老二哥”，姓李名魁武，字正义，家籍辽宁省黑山县西北30公里的三台屯。父务农，生子3个，老二哥排行居中，所以得出这样绰号。老二哥生于光绪末年（1911年），少年时即桀骜不驯，戏玩时常常抢夺邻儿的器物，且每每打骂欺侮同里少年。其父母亦不知管束，放任自流。因而从小就养成了地痞行为和流氓无赖的坏习气。三台屯一带，正处于黑山县边缘，北毗阜新，南接北镇，是个“三不管”的三角地区。三台屯和白厂门以西的西山沟地方，是医巫闾山的北尾。山岳重叠，沟叉纵横。老二哥幼年的环境如此，家庭教育又如此。他到20岁后，目睹那些辽西著名胡匪如野狼、青山、双红、二升子、毛锦州、毛义州等人，大马金刀，杀人放火，任意抢民女，掠夺财物等等暴行滋长了他当胡子的思想。没过二年便同沈老疙瘩、占山好等明来暗去地出外抢劫。有时卡大钱（指在大通道上拦劫）。有时砸明火（指在夜间抢劫住家的财物）干上了土匪的勾当。又过几年，自己也拉拢几名底柱子（胡子所说

的隐语，是对自己亲近而贴底人的称呼），组成22名小辮子土匪，老二哥的匪号也就开始传出去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听从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主义，放弃东北。竟将所有东北军陆续撤出关外。当时日本军队已占领沈阳、吉林、黑龙江等地，辽西各县一时形成无政府状态。

那时各县虽然组织了维持会，但只能维持县城街面，至于城外各村屯，尤其是边陲地方，大批胡子就左一起右一起蜂拥而起。这时老二哥已为匪数年，且底柱子很多。同时他们听说山海关外有辽西义勇军在活动。他们自己并没有爱国思想，只是抱着趁火打劫的思想，冒充起义军，树起高大红旗，到处裹了不少百姓。为首的是占山好，其次是老二哥李魁武，草上飞郭九贤，春字沈老疙疸等。连同老百姓号称千人上下，正式胡匪骑马在前打头，末后跟的就是手拿棍棒，或赤手空拳的百姓。有些还是胡匪的亲戚和家族，有驴驮子、大马车，这都是准备打进屯子后，拉东西用的。他们拉着大队浩浩荡荡地从三台、黄马窝铺经过石家沟、南三家子等处扑到陈八道壕。适时日寇的骑兵已经进驻到黑山城内。旋又遣步兵乘火车向北伸展，双方相遇，并未冲突。因为老二哥这伙胡子，他们并不是安心抗击外敌，而是借打日本鬼子为名，实行其抢劫横技，故而一听日寇到来，即行卷旗回窜三台、花楼、四堡子一带黑北两县交界地方去了。日本鬼子下车后，听说陈八道壕来过义勇军，就把房子烧了数十家。

二台子受挂

同年冬季，辽西抗日救国义勇军代表同战士约10人，从北平奉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命令，经山海关、兴城去北镇

路过四堡子、三台子、白厂门、二台……然后直奔彰武和通江一带，去发动有武器的蒙汉民众起来抗日。事有凑巧，在三台子就宿中，竟和匪首草上飞郭九贤、老二哥李魁武接上了头。经过谈话申明救国大义，二匪首表面上赞成当义勇军，但心里总是想借抗日义勇军的名义，破村入屯后捞点东西。他们两人就这样又树起义勇军的大红旗来。这时白厂门东一带如八道壕、赵屯、头台、老河深、李屯、罗台、大夏、二台等，均有地主和豪绅们组织起来的联庄会，以公廉屯大地主杜化桥为首，下分步兵团练及骑兵团练两种，声势浩大，武器及弹药亦极充足。这些人有军阀们的家族，由沈阳或长春源源地带来枪械，外加黑山的警察队数十名。他们大小枪械都很齐全，且有数名干练的好打手。他们听说三台、四堡子一带，过来了义勇军的干部，又得知草上飞和老二哥都树起义勇军大旗，开始要干抗日的活动了，预料这头一仗准挤在二台子打起来。果然，当日傍晚，抗日救国军下书给二台屯的联庄会要从二台子借道通过。会首张仲三、队长牛万庆，立即声明不准通过，如上来，就打打看。信使走后，他们调来罗台、头台、老河深、赵屯……步骑团练约200名，同本屯8大户炮手以及牛万庆的警察队等，立即分兵把口，配发子弹，作阻击的准备。义聚号杀猪宰羊，搬出大米白面，犒赏所有参战的人员。最后把屯内青壮年编为工事、运输、抢救、医护等四组。隔一天后，当太阳偏西的时候，从二台的西面南面就上来了义勇军，双方战斗就此开始了。义勇军首先从二台的西面大沟中，且战且进地靠近义聚号的磨胡同。采取灵活战术，夺下来几处掩体，而且占据了一幢小院和一条矮土墙。这就给南面老二哥缙子欲攻取的目标造成有利形势。使老二哥大都很容易地攻下二台子屯的西南街各家（即西树沟南树沟的一些贫苦人家）。可恨老二哥这伙人们，心眼里惦着抢夺财

物，在匪徒们身后，跟着十几辆大车，有的还牵着驴驮子，这些匪徒开始抢掠起来，翻衣找被，翻箱倒柜。有的点火烧房，烧柴草堆。火光冲天，照得满街通亮。子哭娘嚎，叫苦连天。我义勇军战士们不能容忍这些匪徒们的虐民行为，但事态难期两全，但最终他们只好绕着北上阜新，与匪徒分道扬镳。

这些冒牌义勇军的匪徒，人数虽多，终是乌合之众，和警察队接近后，老二哥绪子的一部，被牛万庆警察队所包围。草上飞的那一帮，也没攻进义聚号大院（当时地主联庄会的大本营），反倒被打死七八个人，尸体勉强从大墙底下拖回来，装在大车上拉走。

仗打了一夜，天快亮时，老二哥和草上飞才会了面。知道这样干下去，很难取胜，急忙下令撤退，慌忙中，老二哥部下的十几名受伤的匪徒，竟遗弃在西南街的3间房内。天亮了，牛万庆便把这些匪徒一一枪毙在屯外的草甸上。

“老二哥”投降日寇

1936年前后，警务局来个曲翻译名泽泊，日本话说得很出色，有交际手腕，在各指导官面前很受信任。有一次他为办理缴枪事情到了三台，经人介绍，与老二哥相见。谈到县局对土匪的剿抚政策，曲便劝老二哥乘此时机，放下枪杆，赶紧改邪归正，受抚投降，同时立功赎罪，永保平安，并可为你担保一切。老二哥闻此也正中心坎。以后果然交出3支大枪，匪枪1支，且说动十几名匪徒，也交出枪支弹药等。曲某回局向指导官陈述经过，指导官夸曲办事得体，遂将老二哥李魁武召到黑山设宴款待，且为其在西街租妥小院一所，令其迁家来住（为的是叫他找寻投降的匪类），从此老二哥在城里过上了安闲幸福的生活。同时警务局又由鸦片零卖所，给他起了一个大烟证，一个

吗啡证，允其公开吸食购买，且不收价款。他和妻子就这样在黑山住了四五年。

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寇投降了。老二哥又干起了土匪勾当。直到1952年，老二哥才被人民政府依法处决。

（摘自《黑山县文史资料》）

匪患——“六合”火烧后营沟

马文章 宋桂山口述 秦凤学整理

后营沟是义县大定堡满族乡前营沟村的一个自然屯。这个沟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不满1公里，在民国20年（1931年）间，仅有29户，170多口人。这里人们都靠开荒种地为生，是一个既偏僻又贫困的穷山沟。当时属于县第五区（大定堡）南树林子村公所管辖。

日本侵入东北占领义县后，地方盗贼蜂起，拦路抢劫的、绑票的、捐钱的、杀人放火的到处都有，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民不聊生。南树林子村公所和警察分所，为了维护地方治安，组织地方“团练会”（也叫“大团”），强迫民户买枪，参加“团练会”，以防土匪侵扰。可是民户身受多层压迫和剥削，经济十分困难，根本无力买枪，但是不买枪又搪不起村公所和警察分所的强迫命令，后营沟摊派的任务是平均两户买1支枪，大约15支左右。民户无奈只得到处求借备钱购枪。马丰年因为没钱，竟将女儿聘出，找个婆家，借用70块大洋买了一支狗牌撸子。有的户用地契做抵押借钱买枪，有的一家实在买不起就两家合伙买一支。经过半年多时间，全屯购进了大、小枪支共13支。因

为这个村枪备齐了，名声也就扬出去了。土匪掌握了情况，眼睛也就盯上了。

这年农历七月间，土匪在大定堡一带活动十分猖獗，土匪宋玉洲，绰号“大玉字”（七里河镇东石厂村人），勾引西边外匪首“六合”，约有马、步队伍五六十人，在山区活动起来，抢劫，捐钱，要枪，大吃大喝，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六合”知道后营沟有枪，就派薄荣耀（东石厂人）到后营沟找会首宋桂芳。薄对宋说：“‘六合’要捐你们屯两支枪，限你3天内交出，如不按时拿出，就要烧房子。”接着又说：“去年（1931年）‘六合’曾到你们屯东山，因为来的人少，你们枪多给打跑了。这回可不同上次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真的来了，你们可就没有好了。”会首宋桂芳说：“枪都是自家买的，这是全屯的事，我得和大家商量商量。”就这样把薄荣耀打发走了。宋找来有枪户研究交枪的事。有人主张不交枪，来了就打，认为可以打败“六合”。有人主张不交枪也不打，怕打起来受损失。总之都不愿轻易交出两支枪。由于众说不一，拖延了时间，3天限期到了，“六合”扬言：不交枪就抢！后营沟得知消息后，有枪的人，离开家门在暗地里照料庭院，没枪的人和一些老人、妇女、孩子，怕抢怕打都纷纷逃往外屯亲友家避难，其中去余积镇千军寨村和南孟家屯的较多。家里有驴有马的户把牲口也牵走了。有些困难户和走投无路的人，认为家徒四壁，土匪不要穷人命，就抱着豁出去的想法留在家中。

“六合”真的带着匪徒五十几人来到后营沟了。他们一看各家都没有人，一打听，各家都跑了。“六合”一怒之下，下令匪徒烧房子。接着找来没有逃跑的人，给杀猪宰羊做饭，给割豆子喂马。土匪都住下了。“六合”又叫嚷：“不交枪不怕，没人也不怕，咱们就在这里呆下去，咋的全屯的东西也够咱用的

了。”屯里有财势的人，看到土匪真的住下了，唯恐继续烧杀，就托薄荣耀再给说合一下，交给“六合”两支枪，把事了了。“六合”得到一支套筒枪和一支湖北造后，这才顺着台阶走了。

土匪走后，人们看到12户8个院子共41间房子被烧毁了，有的房下还在冒着烟。被烧得最惨的有马文章、张文祥和马文富3户，他们是新盖的房子，屋里的柜、箱、家具、衣服、被褥等全被烧毁。马春芝家养的二十几只羊被烧死在羊圈里，这次土匪杀了两头猪，三十几只羊吃了。张老新老伴在西山地里拔草，土匪以为来人要打他们，就开枪打伤了老太太。群众眼看被烧、被抢、被害的惨状，有的嚎啕大哭，有的破口大骂，也有的摩拳擦掌。

仲秋季节，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被烧毁房子的人家只好搭起了临时窝棚，或者只住在厢房棚子里，糊弄着生活，准备迎接严冬。

对这次遭灾，大家怨恨纷纷，其说不一。有的人怨日本人侵入中国，破坏了社会秩序；有人怨村公所派枪引起了大祸；有人说这都是警察分所的过失，他们口喊打土匪，可真的土匪来了他们倒不打；也有的人责怪村里的人不齐心，或者打，或者交枪，没有准主意。到底谁说的对？可能大家说的都对。

（摘自《义县文史资料》第五辑）

土匪和日租借地

张庆麟

在“九·一八”事变前，伊通北山皮的土匪为何猖獗一时，

气焰那么嚣张，就连驻防在县城的三十三团官兵也奈何不得？要想解开这个谜团还得从北山皮匪帮同公主岭日租借地的关系上去追根溯源。我家有几千垧土地，每年收缴的地租多数都卖到公主岭一些粮栈，家中的一些日用百货也到公主岭去购买，所以我经常奔于伊通和公主岭之间，结识了公主岭方面的一些绅商和头面人物，从中了解到北山皮匪帮同日租借之间的一些内幕。

公主岭河北靠铁路附近有块日本租借地，它同日本在东北其它日租借地一样，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由沙俄无条件地将长春至旅大间的南满铁路及其支线转让给日本的。此后，日本将租借地变成成为侵略中国东北的据点，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

在河北有个机关车库，旁边有所房子，是专门接待土匪的地方。负责联系接待的是怀德县大土匪头子宗厚。宗厚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他同日租借地有密切联系，南满线的火车他随便坐，是三等免票。他帮助日本人贩卖军火，长春、伊通、怀德、四平、昌图、磐石等地的土匪用的部分枪支弹药，就是由他从日租借地买去后再转手卖给土匪的。日本人不仅从中牟取暴利，更重要的是怂恿土匪为非作歹，扰乱中国社会治安，使中国动乱不安，以便达到他们火中取栗侵略中国的可耻目的。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虽然宗厚是个匪首，又为日本人效力，可却是我父亲张俊德的把兄弟。我父亲为何同他结盟，这里还有一段隐情。我父亲来往于伊通和公主岭之间经常坐小车子。别的客栈小车子时常遭到土匪的抢劫，唯有义成栈的小车子没人敢劫，因为义成栈张掌柜，河北东关大车店掌柜党庆云和宗厚是盟兄弟。所以土匪对义成栈的小车子不敢轻举妄动。我父亲到公主岭经常

住在和盛通粮栈，住在旅店里不安全。粮栈经理张老德告诫我父亲说，你是伊通县大地主，赫赫有名，光当土财主不行，黑道上的也得交往，不然人家把你绑去，就得倾家荡产。我父亲听了他的劝告，经他牵线，同宗厚结为盟兄弟。每当我父亲去公主岭时都给宗厚带去一些贵重礼物和上好的土特产品。到公主岭后还在河南兴发源宴请宗厚。凡是宗厚及其朋友到兴发源吃饭时，都将饭帐记在我父亲名下，“三节”时由我们管家去结帐。从他们二人结盟后，我父亲从未遭到抢劫。

宗厚把土匪介绍到租借地后，土匪就算进了保险坑，哪怕是官方通缉的重犯，一旦进入河北日租借，中国政府也无权搜查追捕。1930年“恩厚”蜡子在莫里石棺山打死了三十三团二营六连的孟连长和刘连副，在北山皮呆不下去了。“恩厚”等匪首就逃到了公主岭，在河北日租借地隐蔽起来。就是一般的匪徒在割倒地后，也腰缠万贯去那里“刮风”。他们一到了日租借地就如同虎归山林一样，纵跳自如。他们嫖娼妓、吸鸦片、赌大钱，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租借地的妓院、大烟馆、赌场等设施归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经营管理。匪首匪徒到这里寻欢作乐，不能用中国货币，必须将中国货币兑换成日本银行发行的日本金票，一元五角现洋能换一元金票。只要有了金票，在租界地才能畅通无阻。要到日本妓院住一宿得花上60元金票。要是嫖有名的娼妓，价格更为昂贵。这些土匪在租借地挥霍一冬春，带去那些不义之财，几乎被吮吸得一文不名，才灰溜溜地返回北山皮。草木萌生，树木关门时，这些匪首匪徒又重操旧业，大肆抢掠。待到青稞子一倒，他们又带着金银财物回到租借地“刮风”。一冬春，照样把财物挥霍得一千二净。这样年复一年地恶性循环愈演愈烈，使中国的大量财物滚滚流入日本人手里。

不仅如此，日本人还通过娼妓监视一些匪首的行径，以达到控制的目的。1931年哗变的五八连和“赵全胜”等缙子破县城之后，为何降到公主岭？这是宗厚、党庆云和马春田策划的。马春田是奉天海城人，在公主岭日租黑帽子衙门当巡捕，曾在日本爱知县力桥市60联队学习过，从日本回来很受日本人信任。“九·一八”事变后当上了怀德县伪自治委员会委员长。他在公主岭招降“赵全胜”等北山皮缙子后，就安排吉庆堂的娼妓闻卿同“赵全胜”的三哥“靠山好”赵文生交往。闻卿是公主岭的名妓，曾走红一时，虽然年过30，但姿色不衰，风韵犹存。“靠山好”本是有妻室之人，自从与闻卿相识后，恨相见得迟，被迷惑得魂消魄散，夜夜宿在烟花柳巷，如胶似漆。闻卿遵照马春田的吩咐，跟“靠山好”从良结为夫妻。成为马春田安在“赵全胜”、“靠山好”等人身旁的一个耳目。

“赵全胜”、“靠山好”等匪首1932年春从公主岭拉出来后，1932年冬降到伊通时，闻卿也随“靠山好”来到伊通，把“赵全胜”等人的行动及时向马春田汇报。“靠山好”还蒙在鼓里，深信闻卿能同他白头偕老，把为匪时抢劫的一些金银首饰都交给闻卿收藏。“靠山好”被“南侠”击毙后，闻卿摆脱了“赵全胜”及其妻子的监视，携带着一些贵重财物逃得踪影皆无。

1932年北山皮土匪破县城后，马春田要“赵全胜”帮助他打南山皮土匪打出县城，再降到伊通。开始时“赵全胜”拒绝了，怕上次降到公主岭事件重演。马春田见“赵全胜”不肯就范，就通过他的盟兄党庆云把“赵全胜”的岳父孙殿财（孙四爷）请到公主岭来说情。孙殿财对“赵全胜”说：“鸣九，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把南山皮土匪打出县城，便是立了一功，为你投降到县城铺平了道路。不然公主岭你还来不来？你有几个脑袋？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租借地还能卖给枪支弹药叫你们继

续为匪吗？”“赵全胜”也深知日本人是马春田的靠山，得罪了日本人和马春田就是死路一条。他终于按马春田安排，把南山皮土匪赶出了县城。所以1932年破县城时，才演出了戴红胳膊箍的北山皮土匪追杀戴白胳膊箍的南山皮土匪的闹剧。

(王喜荣 整理)

身陷匪穴三百天

王志超

我的原籍是辽宁省海城县王家石堡子。自幼随父母迁居吉林省通化南花甸子村。父亲王洪勤曾于民国年间，充任过吉林的省议员，弃官后，回乡从事经商，与朋友合资经营“三盛记”商号。哥哥宗信，毕业于旧式师范学校，在日本鬼子统治时期，曾一度做过甲长，被罢职后，在家务农，又充当一段教员。以后，协同父亲经商。经济情况略有盈余，尚能维持7口之家的生活。在“九·一八”事变时，我和弟弟正在小学读书。那时，我什么都不懂，寒假中，只听爸爸说“鬼子要进村了。”我就东躲西藏的，很害怕。那年月兵荒马乱，爸爸也常告诉我们，这阵子，胡子闹得挺凶，别往远处乱跑。因此，我每天总是提心吊胆，害怕鬼子来，又怕胡子绑票。爸爸和哥哥们，每天都很警惕，并备有火枪，一旦有胡子来，发现就打。就在1935年腊月（那年我12岁）的一天，全家刚吃过晚饭，6点多钟，躺在炕上要睡觉，只听院外狗一阵阵咬；不大一会儿，冷不防，几个身穿便衣的人闯了进来，手持短枪，贼眉鼠眼，直奔父亲，逼

着说：“快走！”哥哥们在里屋。就在这时，一个大高个，罗锅腰，左脸上长块黑痣的人，一把抓住了我背起来就往外跑。把我吓得浑身直抖，心里扑腾扑腾直跳，我想，这黑灯瞎火地往哪里背呢？绕过人家走出二十几里地，才看清楚他们是9个人都带的短枪，绑来我和父亲，其他还有2人，一共4个人票。在雪地里走到下半夜才住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他们告诉农家的人不准外出，怕跑了风声。白天，他们隐蔽不动，夜里行动，为了赶快地跑，抓的马爬犁，在雪地里飞奔，一连走了十几天，到了挠头（老穴），把我们带进了票房（秧子房）。一进阴森森的地窖，我就不知东西南北了。当即被吓傻了！这下子可完了，什么年月才能出去呀！我一看，绑来的多数是青壮年，老年人少数，小孩就我们3个人，总共是37个人票，押在这里作为人质。过了几天，知道了绑我们的胡子头叫“中山好”。这个人，大秃头，说话磕巴，腿瘸，山东人，50来岁，是匪帮的大柜，说了算，有生杀大权，说让谁死，谁就得死。这帮胡子有100余人，其中什么样人都有，是些乌合之众，一盘散沙，说吵就吵，吹胡瞪眼。在这时，我逐渐了解到：所谓胡子，是些人面兽心的豺狼！他们结为帮伙，其成员非常复杂，大都是从河北、山东、河南、江浙等地过来的地痞流氓、无业游民、兵痞、逃兵等等，都是为了抢钱财，占山为王。有的带进枪支、弹药，有的加入股，按枪支的多少，人马的多少，将抢来的物资以及人票的赎金等，按股分赃。谁来控制呢？是以四梁八柱统帅全辖子。“大柜”、“二柜”是总头目，掌握全局，其内部如有叛逆者有权决定生杀。“上项员”是管财务的；辖子活动时，由“叫将员”用推八门的方法，看方向，往吉利的方向活动。什么是八柱呢？“炮头”是领兵的，行动时在前，打仗时在后，负责指挥；“水香”是负责站岗放哨的，那时没有钟表；一柱香、一班岗；“总

催”专管行动时督促不准拖拉；“粮台”管伙食，如果出了挠头、天桥、龙爪沟的山外，住在老百姓家时，“粮台”亲自监督办伙，怕被毒死；“稽查”负责查有无私人勒索进腰包的；“字将”掌管文墨；“马号”管理抢来的马匹以及活动时打店等等找住的地方；“秧子房掌柜”，负责将抓来的人票看管、审讯、执行刑罚等等，是吃人的阎王。另外我又发现胡子之所以叫什么“飞”呀、什么“好”呀，如“中山好”、“草上飞”、“打天下”等等，不表真名实姓，以华丽的美名报以“山头”，就是为了掩盖他们为非作歹的罪恶。因为，就在那时，胡子发了财，探边了（不干了），谁也不知道其真名实姓。这些胡子常年出没在长白山脉南部老爷岭一带，迂回在天桥沟、龙爪沟、挠头、长白的十几道沟，外窜到蚂蚁河南部集安、通化边界，老穴在挠头。挠头，这里是原始大森林，人烟绝迹，面积约有几百里，参天古树，不见天日峰峦叠翠怪石林立。有的地形好象个炮台垛口；有的谷深数里又象似口袋，真是鬼见着都发愁！胡子就利用这种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做为栖身隐蔽的场所。“中山好”匪帮和它的“秧子房”就设在挠头的深谷里，是在一个险峻的石砬子底下挖成的地窖，用树皮覆盖在上面，难以发现。岗哨在制高点，居高临下，易于了望。“秧子房”里黑咕隆咚阴森森，潮气熏人，就叫人票坐在仅铺一层薄薄豆秸的地上，每个秧子都被绑得紧紧的，将总的绳缠在一起绑紧吊在高处，便于匪徒看管，不让吃饱，不让睡足，防止逃跑。每天两顿饭，一顿四两窝窝头或是大饼子，一块咸萝卜头，有时给点热菜，适当地给一壶开水喝。睡觉必须一颠一倒，不准说话，防止串供及其它密谋。每天早晨5点钟叫起来后，放风（出外大小便）。起来慢了，轻者脚踢，重者皮鞭抽，平时，一旦来了大、小便，也不让“放风”，他们说：“不是在你们家，那么随便。”所以有的人憋得括

着肚子直叫，大、小便拉、尿在裤子里。冬天，裤子冻得绷绷硬，又冷，把屁股磨破了也得硬挺地坐着；夏天，尿、尿在裤子里，时间久了，那股臊、臭难闻，特别是伏天，热得喘不过气来，渴得难受，也不给水，那种滋味抓心挠肝地难受！渴的没有办法，只好硬挤点尿，尿在衣服上，再拧出来，用舌头舔舔以解渴！简直是非人的生活。匪徒们叫秧子，白天一律靠墙根坐好，腰板还得挺直，不准打瞌睡。一旦有打瞌睡的被匪徒发现，轻者叫俩人对面打嘴巴子，重者，匪徒用香火专门烧鼻子尖、烧手、烧脸、烧眼手、烧乳房或者用皮鞭子抽。一次，一姓袁的老头打了瞌睡，匪徒们疯狂地折腾他，先来烧他胡子，还不算完，又用细马尾把两个大拇指勒上吊起来，勒得脖子高直叫，那豆粒大的汗珠从脸上直滚、眼泪簌簌的，还得挨揍。在那三九天，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窝窝头冻得像石子，也得啃，不吃就挨饿，人票遭的罪，谁也忍受不了。没有被子，原身睡在冰冷的地上，晚上冻得牙齦得得直响，几个人想往一起靠靠，那匪徒就是一阵脚踢、鞭打。有的人票脚上还穿的单鞋，脚被冻肿直淌血水，手冻得像馒头，谁管你死活。这样残酷虐待人票的目的是让你早赎或大价码赎。

二

这年冬天，就在挠头过的年。因为这里是胡子的老穴，在除夕晚上，匪徒们大吃二喝，然后在炕上闹腾起来，有的在抽大烟，有的推牌九、看纸牌、玩六点（骰子），他们利用明柴、火油灯，把住的周围弄得灯火通明，洋洋得意地过大年。可是，秧子们吃的是高粱米饭、炒萝卜条，吃完了都耷拉着脑袋。我这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看看父亲，父亲也看看我，心酸落泪，十分难过。我是个小孩被放在一头，苦闷地想起家来了！悲

痛、愤恨，心如刀绞。昔日过年，全家人在一起，欢天喜地，妈妈给包饼子，我和弟弟捉迷藏，可今天，我和爸爸在这深山老林落在这样的死人坑里，多咱能有头呢？童心难忍，泪如雨下。我竟成了小崽子的玩物，把我当成皮球似的踢过来、踢过去，他一高兴，我就遭殃，也不知道挨了他多少毒打。这小崽子虽是大柜、二柜的随从，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背着大烟枪、单枪、大烟土等等专门侍候掌柜（在他们匪帮里他比人家小一辈，管同伙人叫叔叔）。但，这个丧尽天良的崽子，对人票特别苛毒，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三十多人都被他给折腾遍了。把我恨得咬牙切齿，心想，有朝一日，把你逮住，一定砍下脑袋点天灯。特别是折腾父亲时，叫我陪绑。1936年2月，一天下午，秧子房掌柜把父亲捉走进行审讯，问父亲家有几支快枪，多少金镏子、大烟土、小洋钱，在哪里装着？说不出来就打。先用三角带抽，又用香火烧胡须，烧完以后，再烧鼻子尖，把脸部烧成麻脸了。还不放过，又叫坐“老虎凳”，让父亲屁股坐到凳上，两脚踩地，让两人把木杠子压在两条腿上，两端加压，压得嗷嗷直叫，尿、屎都压出来了。结果爸爸胡乱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然后又叫我跪在带刺的木轮上，扎得受不了，痛得昏过去了，我根本不知道有多少钱，施刑后，大柜、二匪徒告诉说：“向你们要一个老串（现小洋1万元）。外加‘小项’（小礼）、烟、酒、糖、茶等，叫花舌子给你家送信去了。”那时，花舌子是匪徒的亲信，专门说合事的人，是二胡子，和胡子一鼻孔出气，跑腿学舌从中刮油水。到人票家吃喝一顿，临走还得勒索点，是敲骨吸髓的毒蛇。几天后，匪徒们说：你们家知道了！人也太平。一片谎言。这时“中山好”结子带人票迂回在天桥沟、龙爪沟、蚂蚁河一带，到山外住在老百姓的家，胡作非为，强奸妇女，残害人民。若在山里时住在木把工棚里，如果山外没有军队动静，

他们白天任意活动，无论往哪走，若是走雪地时，几百人也必须踩着脚印走，特别是专门踩着草丛走。如果是小溪，一定沿着河边走，就是夜里行动尽可能要走成一行的脚印，防止被发现行动的踪迹和去向。每次行动有口令，什么“胜利”、“友好”、“战胜”、“和平”等一类的词，传口令，低声要快。“中山好”匪帮为了督促人票家快来上项（交款），把秧子带出来活动。在那时凡是胡子踏到的地方，不仅是百姓被糟塌得九死一生，即是自然环境也被匪徒们践踏得满目疮痍。

1936年3月，正是农民准备春耕时节，据知，“中山好”、“老太平”、“打天下”、“草上飞”、“九州”、“魁字”等几个绑子联合约500人，沿鸭绿江南下攻打江甸子。这天拂晓，把江甸子围得水泄不通，匪徒们枪声四起，村内只能稀稀拉拉地抵抗，大抬杆、鞭炮响了一阵，因无援兵，不到一个小时，村子被打开了。匪徒们边纵火，边抢。这时，有的农民准备下地干活，还有的在睡梦中，只见有的妇女的衣服半披半穿，披头散发，赤着脚，还有个妇女怀抱小孩，惊慌失措，孩子哭、妈妈叫，跑着跑着被打死，那小孩的脑浆都进出来了。绑的绑，抢的抢，两个多小时，村子被血洗一空。不知人死了多少，只在空气中散发出一股血腥味。绑来的人都拴成了串，抢的米、面、各种布物、皮衣、鞋子，还有马匹、枪支等装了五马车，随即匪徒们夺路北上，连宿隔夜三天多，逃进了天桥沟，压在老林高山上，将绑来的人进行过筛子，最后留下23个人，其余都在夜间带到山外把眼睛蒙上放到蚂蚁河一带，然后火速拉回到挠头。过了一段时间，记得这天是四月十九，秧子房掌柜的“南五省”，小矮个，四十几岁，黝黑的脸；小眼睛，镶的金牙，挺恶。他把父亲提走了，不一会又提我，来到天桥沟的南山坡木把工棚里，一个花舌子（姓于）听语声是当地人，四十来岁，留分发，还

领着哥哥进来了，背些东西。我一见到哥哥眼泪夺眶而出，止不住地流，妈妈怎么没来？心像掉进了油锅似的。天哪！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父母之爱更深，这生离死别多么难受！只见爸浑身颤抖，硬着头皮，说不出话来，但，匪徒们却不准我们对话。哥哥说：“家里实在拿不起，求亲戚，拜朋友，只凑现小洋2 000元，带点小礼。”没等哥哥说完，匪徒们暴跳如雷，有的说：“枪毙这个小鳖犊子。”有的说：“先留他几天。”匪徒们收下钱和大烟土（约50两）、烟卷、茶、冰糖等，告诉花舌子把哥哥带下山，回去赶紧办！随后，把我和父亲带回了挠头。一天，“南五省”把父亲提出去了，当时我心里纳闷：干什么去呢？一个多小时父亲回来了，我一看，掉了一个耳朵，血水染红了上衣，别提父亲的肉体被折磨得多么难受，脸色煞白，身子晃晃悠悠地坐在地上，气得眼珠发蓝、嘴发颤，浑身直抖。当时把我心痛得昏过去了！醒来后放声大哭，简直是要人命！哭得死去活来，尿都尿在裤子里，心里在咒骂：“这帮吃人的豺狼！将来把你们都乱刀剁了！”匪徒们不让哭，反正我豁出来了，在地上打着滚哭。哭得那人票们人人愤恨，个个流泪。过了几天，知道是崽子“双红”用剃头刀把父亲的耳朵割掉，连同鸡毛信捎回了家。那时我13岁，但胡子的滔天罪行，我看在眼里，一生难忘。爸爸精神错乱了，饭吃不下，骨瘦如柴，只有一口气支撑着身子。为了保住爸爸的命，忽然想起让爸爸回家，相互心领神会。一天，我和爸爸央求大柜、秧子房掌柜，我双腿跪地，苦苦哀求，先放回爸爸，只有爸爸回去才能办来钱，否则是办不到的，经几次哀求，匪徒们才把爸爸放了，并限定一个月必须将项上齐（把钱交够）。办不到就去烧。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才得以逃生。还有从柜仁那边绑的票姓李，50岁，因为家人长期没来，胡子恼火，把大拇指剁掉了一个，经花舌子带信捎走

的。后来李某被折腾死了。1936年4月的一天，又对姓张的人
票刑讯，因为向他家要三个老串（3万元），家里没来人，匪徒
们急眼了，把张某吊起来“上大挂”，用三角带抽，抽得遍体鳞
伤，屁股肿得像个鼓，不敢坐，硬逼着坐，不坐就打。第二天
还折腾，把衣服扒光，仰面朝天，手脚绑在板凳上，从鼻孔往
肚子里灌辣椒水（也有灌汽油、火油的），十几分钟，把肚子灌
得鼓鼓的，再用木棒挤肚子，水顺屁股、小便处冒出来，几次
折腾，人被灌死了。尸首压在倒木下，家里不知道，来交钱，看
不见人，一直花到现小洋2万来元，家里连尸首都找不到。胡子
绑来的人有富、有穷，但他们说：“错绑不能错放。”都得拿钱，
拿不来钱，人也没有了。我们3个小孩，那俩人都是15岁，姓
张的白天打瞌睡，匪徒们叫我们面对面打嘴巴子，怎么忍心打？
不打，他们就打我。后来，病死1人，走到长岗一带放了1个，
剩我自己，那时，我身背小绳给匪徒干点什么的。一次，小崽
子叫我给拿个“撒拉”，我以为是吃的菜茎拉，拿来了，却被他
连骂带脚踢地挨顿揍！后来才明白，“撒拉”是胡子的黑话，指
的是饭碗。

1936年5月，青纱帐起，匪帮窜到通化边界，捐村镇、打
大院，把秧子带到天桥沟、龙爪沟、长白的十几道沟，压在高
山密林里。那一冬不见太阳，不洗脸，不脱衣，大小便都在裤
子里，浑身生臭。身上绑的小绳把脖子都勒烂了，小绳也被血
水泡烂了。那头发辮成毡，虱子滚成球，夏天被太阳一晒，走
路时虱子从身上直掉！坐下来就用嘴咬虱子。在深山老林里，一
到晚上小咬成群、成团，咬得脸上大泡一排一排的，草爬子叮
进肉里，皮肤肿烂以后，钻心痒痛，流血流脓。若是夜里走路，
罪更难熬，吃不饱，睡不足，瘦得眼睛眶儿，行动打晃，一不小
心跌倒了，挨顿脚踢。爬起来，用绳拖着走，拽得半死不拉活，

死了扔在倒木底下。匪徒们用尽惨绝人寰的毒辣手段折磨人的肉体，令人深恶痛绝。在这里，我亲眼看到胡子就是掳、掠、烧、杀，到处抢劫，灭绝人性地残害人民。那时，民间有一段小唱：“只曾想当胡子占山为王，抢钱财绑人票发财还乡。没曾想做坏事丧尽天良，到头来落法网尸骨成浆。”

三

1936年9月，“中山好”、“打天下”、“九州”等匪帮联合向通化一带的热闹街、头道崴、二亩地村要大捐，约300余人压在二亩地沟里，派花舌子送信，接头地点在二亩地。第二天，几村的村长代表等五六人到指定地点，接受大捐的内容：长短枪50支，弹药5000发，军衣100套，大烟土200两，大米5000斤，白面200袋，鞋、帽等，现款1万元外加小项（小礼）。三天内不交齐，以火烧光。其中只有枪支、军衣不足，其余如数送到。于是，匪帮火速奔天桥沟、龙爪沟，沿途践踏百姓，强奸妇女，拐带妇女，如有不从当场枪毙。每到一处翻箱倒柜，鸡犬不留。这天是十月初二，住在高台子、大西岔一带，歇歇脚返回挠头。老百姓给杀的猪，匪徒们有的躺在炕上抽大烟，有的推牌九。晚5点来钟，准备开饭，正当饭菜端上了桌，只听外边叭！叭！两声枪响。这枪声是岗哨发现军队来犯的信号。我们人票不知怎么回事，但匪徒们说：“不好了！来跳子了！”（跳子指的是军队）秧子房掌柜“南五省”喊道：“‘长胜军’赶快往外提秧子！一个人牵一个秧子（人票），奔北沟！进老林子。”屋里乱成了团，这时对方的枪声激烈，炮头“占东北”说：“‘五州’带弟兄别往（别是死打）！我向北面迂回。”匪徒们边打边骂：“他妈的！邵本良这个王八蛋，真不开面！”匪徒要逃是有困难，从民宅到老林子，要经过一大段开阔地，这里尽是

横倒竖卧的烂倒木和被火烧过的黑树杈子，匪徒们就利用这些自然的地形地物，拼命地顽抗。但是，匪徒们的枪支破旧、弹药不足，没有战斗力，只好边抵抗、边逃命。对方的机枪声、炮声，步步紧逼，像炒豆似的。秧子被逼得紧跑，顺着倒木和树杈子作掩护，跑几步躲一躲，匪徒、秧子被打死了，女匪（白龙）被打死了，别人从她身上摘下枪就跑。秧子有中弹不能走的，被枪毙了。相持两个来小时，抵抗不了，往老林里撤。这时天色渐渐黑下来，人也都打散花了，我趁机拱进烂倒木的窟窿里趴下来，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等匪徒跑得没动静了，军队进了大西岔村子，枪声还在断续。只听狗越咬越远，我悄悄爬出来，又冷、又饿、又害怕，站起来晃悠悠，眼睛睁不开，全身无力。往四下一看，到处是一股火药味。怎么办？坐了一会儿，气喘吁吁地往山下爬，走几步，蹲一蹲，咬着牙往前走，到了山底坡下有几户人家，前去叫门，屋里点上灯，开门一看，见我是小孩，叫我进去。看我挺可怜的，让我上炕暖和暖和。说着说着，我想家哭起来了。就在这时，外面又有人叫门，这家大叔开门一看，又见一个一瘸一瘸的人，他说：“我的腿中弹打伤了，滚到沟底下跑出来了。”大叔大婶叫他上炕，并给他弄点饭吃。这人说：“是通化南英额布的人，姓张，21岁，被绑来一年多了。”说完就哭了。这家姓李，李家把他的伤口用块干净布缠好。第二天，告诉我奔花甸子的路，经过蚂蚁河、大荒沟，也可奔向英额布。走了两天终于找到了家。全家一见到我，都愣了！呆了！都说不出话了！那个高兴劲儿，眉开眼笑，乐得都合不拢嘴。爸爸乐得叫着我小名说：“宝财，你怎么回来的？”我把经过说了，在李家住一宿，感谢人家好心。说完，一头扎到妈妈的怀里放声大哭！妈妈抚着我：“感谢老天爷！人可盼回来了。”真是虎口里逃生！我抬头又看看爸爸被割掉的右耳，痛

哭失声地咒骂胡子，一旦抓着他们，全家异口同声地说：“要用铡刀铡！”一连几天，伯父家、姐姐家，东邻西舍都来看望，给全家贺喜！父亲的朋友也来了，三十几口人，妈妈高兴地亲自操办喜宴，专门给我包饺子，解解馋。妈妈还迷信地嘴里直叨咕“都是老天的保佑。”虽然没张灯结彩，真是喜气盈门！这可真是像过年似的，喜气通天，分外热闹。这时，父亲说，不幸被胡匪割掉一只耳朵，可幸全家得以团圆。

这是我童年时期，1935年腊月至1936年10月，被“中山好”匪帮绑去后的一段亲身遭遇。

（泽江市政协供稿）

帮 会

溥仪和红卍字总会

郝幼权

红卍字会在光绪年间，首创于山东济南，故济南红卍字会称“母院”。辛亥前后，全国各大城市建立分会。什么时候传到东北，没有资料可查。伪满“建国”后，号称“独立国”，各分会倡议成立“总会”。选定“新京”（长春）大同大街（今斯大林大街）和吉林大马路岔口，孝子坟西侧一块荒地，开始修建。

“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为总会会长，筹资皆系个人捐助。溥仪听信张海鹏宣扬红卍字会“老祖”降坛，可预知未来，信以为真，从“内帑”捐助10 000元（一说为10万元）。张海鹏、商

衍瀛（道号觉尘）、熙洽（道号道善）以及各分会上层人士，集资若干万元，建成中、西合璧式：正殿三层楼房（三层顶端又建一六角中国式亭子，名曰：望亭）。正殿东西两幢楼房，为统筭、庶务、会计、纂长、供俸等人办公起居地方。

正殿三间中间一室，供奉“青玄宫一玄真宗三元始纪儒释道耶回（五教教主横书，余皆竖书）至圣先天老祖”的神主。“老祖”殿左右室为“经院”（诵经之处）、“坛院”（“开坛”时在此）。正殿后有一楼，为孤儿院、养老院，名为“大雅庄”。

“总会”全称为：“世界红卍字会新京总会”。大门为中国庙宇式，建筑虽不庄严堂皇，亦颇雅静可观。

“总会”成立后，约在1939年左右，“总会”派神职人员六七人，纂长姚得超亲捧“老祖”神位至朝鲜汉城，筹建朝鲜总会。姚亲自告我当时朝鲜老年人，见中国人至汉城，潸然泪下，概悲亡国之痛，及对中国人之情感，以泪代言，使姚得超等人很为感动。

关东军司令部表面不干预红卍字会活动，如关东军司令部训诫日军职人员“参加进去更好”（见《伪满宫迁杂记》）。我在1941年看见“世界红卍字会奉天主会”刊物《道慈杂志》上，刊登两个日本人照片，一个叫“寻仁”，另一个叫“寻贤”（这是“道号”，原名姓忘记）。日本人“入修”今日分析他们绝不是为了信仰。红卍字会没有自己教义，是佛、道、儒思想理论大杂烩，最明显例子，号称“五教之主”的“老祖”连耶稣教反对偶像都搞不清；作为具有科学、近代知识的日本人，怎么能相信扶乩呢？

《我的前半生》中，溥仪说“老祖”给他赐道号“昊兴”，是确切的。他还有一个道号“一人”，或许他可能不知道。专门代“老祖”传训的纂长，赐溥仪道号“昊兴”，“书画坛”纂长给溥

仪画一张画，题款是“XX 绘赐一人”，大有不承认“吴兴”之意。想不到一个“老祖”竟互相打起来，实令人喷饭！张海鹏也许不敢把这画给溥仪？他怎么自圆其说呢？

现在市图书馆，就是“总会”旧址。西三道街“分会”早已拆盖成新楼。

(长春市民盟供稿)

记伪“道德会”

王耀华

伪满时期，熊岳城“道德会”设在现北关小学地址。“道德会”在敌伪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曾盛行一时。他们利用封建迷信，进行讲演、讲习，借以愚弄广大妇女群众，传播奴化教育。

熊岳城道德会的理事长是当时本地有“名望”的东茂洋行殷宝廷担任。

伪“道德会”的由来

伪“道德会”的前身是“万国道德会”。1918年，山东历城县人江钟秀、其子江希张创办了“万国道德会”。提倡尊孔读经，维护封建道德，1921年，呈准北京政府内务部立案，在泰安召开成立大会，推举孔德成为会长，康有有为副会长，江钟秀为监理。总会设在济南，并在全国各地设分会。1925年，江钟秀死后，其子江希张继任监理。同年秋，利用孔子誕生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修正章程，确定宗旨为“改造社会，缔造大同，促世界进化，谋人群幸福，实行利民生，启民智，教民德之计

划”。1929年全国代表大会于北京举行，选举杜延年为理事长，总会设于北京。

杜延年是黑龙江安达县人，以所谓“慈善家”著称。他为了发展会务，特回东北进行“访贤”活动。那时朝阳有个“善人”叫王凤仪，主张性理之说，在地方有“声望”。杜延年邀他入会。两派气味相投，于是江、王合流，即以王派所办的义务女学，扩充为“万国道德会”。日本帝国主义者方倾销其“王道乐土”的青药，深恐东北人民不受麻醉，而道德会的封建迷信内容极合于他们的要求，所以大力扶植，作为传播奴化教育的工具。

1892年甲午战争前后，朝阳有个杨柏时常宣讲“善书”，王凤仪听他说教，有所感动。从杨柏所讲的“善书”中，琢磨出一套理论，他有时白给人家看病，利用看病的机会，宣传自己的思想。因此，他的名字在群众中传播开了，大家称他为“王善人”。后来，他周游各地，一面医病，一面说教，兴办义务女学，名声越来越大。王凤仪1929年加入“万国道德会”势力倍增，1931年日寇占领东北，“万国道德会”与总会隔绝，自树一帜，王凤仪就成为东北“万国道德会”总会首领。1933年，“万国道德会”改名为“满洲帝国道德会”，熊岳是道德会支会。

伪“道德会”组成和发展

王凤仪在熊岳城推广会务的妙诀，是向社会上最薄弱的环节进军。在旧社会，女子是被压迫中的最深者，也是社会上最薄弱的一环，最容易受欺骗、受麻醉。王凤仪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心理，首先向广大妇女进军。他们用以劝说引诱各家妇女入学。熊岳城道德会就以王凤仪这一套理论，在女学中宣讲道德会的3种经：一是姑娘经，说姑娘性如绵，意如根，身有补助力，

以“提满家”为己任，是一家的贵星。二是媳妇经，说媳妇性如水，意如根，以“托满家”为己任，是一家的喜星。三是老太太经，说老太太性如灰，意如根，巍巍不动，以“兜满家”为己任，是一家的福星。

人们最初不愿让妇女入道德会，以后看到宣传的都是贤妻良母论，适合大男子需要，也就不加干涉了。

作为伪“道德会”的两大组成部分，一个是江希张“万国道德会”的组织形式，一个是王凤仪的思想学说内容。

1929年，当江、王两派在东北合流的时候，王派所办的义务女学，东派的“万国道德会”都有发展，互相依赖、支持，彼此都得到好处，成为一个广泛的统一的组织。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向殖民地的方向逆转，人民群众耳目闭塞，这就为万国道德会这种落后腐败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敌伪统治时期，道德会在东北自树一帜，大大发展起来。

1933年，伪满新京（长春）成立总会，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成立3个分会，实行四级制：总会为第一级。辽、吉、黑三省各成立总分会为第二级。各市、县设分会为第三级。各乡、镇设支会为第四级。各级分、支会俱以理事长为事务中心，并聘请地方上有“声望”的二三人为正副会长，以资号召。理事长之下，设总务、教化、福利、企划、德业等五部分，分别掌管道德会各项事宜。各级活动事项，极为广泛，有讲习班、讲演社、游行讲演团等。

东北道德会脱离万国道德会，独树一帜之后，已经是羽毛丰满了。王凤仪顾忌人民的指责，不敢明目张胆地悬挂太阳旗，为日本人作喇叭，只得暗中与日本人拉拢，凭借帝国主义的掩护，向东北各地推销“膏药”。同样，日本人亦不愿公开出头

主持会务。于是藏在幕后，暗中策动，并利用王凤仪的愚民思想学说，来麻醉东北人民。

伪满初期，日本人在东北的统治权尚未巩固，对于一个组织庞大，消灭人民斗志的“道德会”来说，不能不进行拉拢、支持和利用。又何况王凤仪的学说和道德会的宗旨恰恰符合于“王道乐土”的欺骗宣传的需要。所以，伪满初年，道德会的势力蒸蒸日上。

终身会员要守5戒条，10信条。

5戒条是：不良嗜好、特殊秉性、虚妄言语、矫伪行为、违背信仰；10信条是：节饮食、慎起居、励精勤、尚节俭、尽职能、笃论常、守法律、兴公益、尊圣哲、助会务。

熊岳城道德会的活动内容甚多，经常召开讲演大会。其他经常性的活动还有“妇女识字班”、“游行讲演团”、“妇女讲习班”等等。当时，伪政府需要宣传什么，就把任务交给道德会。道德会即派宣传队外出讲演，如“征兵”、“出荷”等。宣传队无论宣传什么，都必须贯穿“建国精神”、“国民训”、“回奎训民诏书”3项。如有违反这种精神者，就以“反满抗日”论罪。

伪满前期，道德会进行一段时间。但随着王凤仪义务女学的废止，熊岳道德会就开始踏上了没落的道路。后期虽挣扎一时，但由于首脑死了，没有作出成绩，国民党统治时期，道德会已是苟延残喘。各地分会、支会虽有点活动，但新主子又摇摇欲坠，因此，他们妄想挽回厄运，终于徒劳。

（摘自《营口文史资料》）

磐石县道德会、万字会

贾占一 金连山 回忆整理

道德会的总会在沈阳，分会在吉林。1933年经王画铺大掌柜的王德山在磐石首先成立道德会。会址在县城东南角拐弯地方王画铺处。王家没要租金，以此作为施舍。当时入会和听讲人不多。1935年会址迁到小南门外东胡同里路北，是租的房屋。在这里时间不长，又迁到北门里路西，即现第四小学大门北边临街5间瓦房。房子是靠会员施舍买的。会长是当时开铁床子的侯国臣。掌管日常总务的是李俊。

每天会务活动主要以讲演方式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等内容。对妇女讲三从四德，对群众讲三纲五常。妇女三从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三纲内容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让子亡子不亡为不孝。提倡男尊女卑，夫唱妇随。说什么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羞，夫打妻不羞。大讲五伦八德。当时入会的有100余人。多数是吃斋念佛的，即所谓修好积德的人。从经济生活上看都是有钱有势有点官气的人家，入会目的为的是沽名钓誉。

为使宣讲后继有人，还招收二三十名学员，大部分是十六岁以上的小姑娘。不收学费、书本费，还供饭吃。一般是早讲性，晚讲会，人多时讲道。不张贴图像，不烧香，不叩头。拜江希张，号称神童。供奉王善人，名叫王凤仪。每天苦口婆心地说教，劝人改恶行善，听说听道，老老实实地当顺民，如有反抗，即谓大逆不道。一句话，搞“愚民政策”。其经费来源，

主要靠会员施舍。为了扩大活动范围，后又在烟筒山、黑石、呼兰等地也成立了分会。

磐石县万字会初设在北门里路东（现法院处），后迁到大南门里路西胡同里的路南，即现县政协楼下处。于1934年到1935年经东丰县人苏相土监修，建成一座简易的两层小木楼。以后经办人有段仁帮、王德国等人。磐石县万字会成立后，段仁帮为会长，王德国为副会长，辛警之为院监，负责总务。还有一名女会长，是当时税捐局董科长的母亲。地基是入会人捐献的。修建钱全系本镇的绅商富户施舍的。当时入会的约30余人。万字会的宗旨是五教合一，即儒教、佛教、道教、耶稣基督教、回教。室内供奉在正位的是至圣先天老祖，两边有孔子、孟子、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老君、关公、耶稣、穆罕默德、王母娘娘、岳飞……均用铜牌书写他们的名字。室内设有塑像画像。凡入会的人要虔诚信仰，有严格的礼节。每日焚檀香，点豆油灯或蜡烛，靠扶乩占卜问疑等方式进行迷惑人的活动。室内正当中摆一张桌子，上设沙盘，名叫乩盘。有两人（叫椽方）共持一木竿，木竿中都下垂小竿名叫乩笔。二人各把一端在沙盘上写字，名叫“司宣”，把写的字念出来。另有数人用笔纸抄写，名叫“司录”，掌握跪拜的人叫“司礼”。就这样解答各种问疑。万字会的经济来源主要以老祖扶乩方法，就是叫哪个会员出多少钱物就得献出来，不能稍有违误。另一种方法是，会员的祖先名字能在老祖跟前设一牌位，那是很光彩很幸运的事了。但必须付出一笔巨款方能办到。为了求得显赫，所有入会的人梦寐以求之。万字会这个地方，没钱没势的人入不了会。凡是入会的人，都是当地上层官商富户人物。所以这里也就成了这些人搞交易，互相勾结、互为利用的地方。不过有时也搞一些沽名钓誉的举动。例如1932年设粥场，施舍大锅粥。又如有贫困

人家死了人无力埋葬，有时万字会施舍棺木。凡施舍者都主张不求人知但求天佑。万字会讲的是“坚、诚、恒”三个字，也讲“身心一齐放下”。即放开“货、利、名、位”，才能逃出大劫。万字会被当时伪警察、特务、汉奸和日寇利用，搞些不可告人的勾当。

1945 秋，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垮台，磐石县道德会和万字会也就烟消云散了。